

南 華 大 學
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當代台灣報導文學的興起與發展

指導教授：陳章錫博士
研究生：謝 明 芳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六月二十日

南 華 大 學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文學系碩士班

當代台灣報導文學的興起與發展

研究生：謝 明 芳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張 錫 輝

蕭 義 玲

陳 章 錫

指導教授：陳 章 錫

所 長：陳 章 錫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九十二 年 六 月 二十 日

誌 謝

歷經多年的職場征戰之後，能夠有機會再回校園重拾書本，是件令人喜悅的事，尤其是自己向來喜愛的文學，但是如何能在工作與興趣間取得平衡，對我的確是一項考驗。十年來的媒體生涯，讓我較一般人更深刻地感受到社會變遷的快速與自我提升的重要性。在工作、學業、興趣與研究範圍兼顧的平衡原則下，我選擇了報導文學做為論文研究的素材。

對文學的啟蒙來自於父親，在我上小學的時候，一字一句教我唸著李煜的虞美人。懵懂的我尚不解其義，卻開始愛上了詩詞歌賦中豐富而又內蘊的情感。而兩年的研究所生涯，更讓我開啟了一扇學習的新視窗，師長們的博學與風範，令人如沐春風；同學間真摯的情誼，更是生命中十分珍貴的資產。

論文的完成，並非意謂著學習的終點，而是另一個階段的起點，我如此期許著。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雖然有過低潮，也曾遇到難以突破的瓶頸，但在即將付梓的這一刻，所有的辛苦都化為烏有，回首前塵，只有無盡的感激。

首先要感謝所內諸位老師的指導與鼓勵；特別是張錫輝與蕭義玲兩位口考老師，以其專業豐富的學養，對此論文的架構與方向上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令我受益匪淺；最重要的是，我的指導教授陳師章錫，由衷謝謝他對我這任性又驚鈍的學生，多所包容，並對我的論文詳加審閱。

值得一提的是同窗好友郭明珠、張艾斐、戴士媛、林宜正、吳榮鐘等，在我感到徬徨時適時的加油與打氣；另外，更要謝謝三位工作夥伴黃綠珊、謝雅娟、黃淑芬，在公務上給我許多的協助與支援。外子江俊亮則是我這兩年研究所生涯中，最大的精神後盾，沒有他的全力支持與無盡的包容，恐怕這條求學的道路會艱辛許多。

陳之藩先生說：要感謝的人太多了，那就謝天吧！我感謝天，不只因為要謝的人太多，而是真心謝謝上天對我這憨人的厚愛，因為閩南諺語說「天公疼憨人」。希望遠在另一個世界的父母也能與我分享這份學業豐收的喜悅，還有一直陪伴我、疼愛我的兩位哥哥與兩位嫂嫂。

點點滴滴的感激與感動是要放在心裡細細品味的。我，滿懷感恩！

論文名稱：當代台灣報導文學的興起與發展

學位類別： 碩 士 語文別： 中 文 學號： 90222506

提要開放使用： 頁數： 150

研究生姓名： 謝明芳 指導教授姓名： 陳章錫教授

關鍵字：報導文學 ； 台灣文學

：報告文學 ； 現代散文

論文提要

本論文旨在探討當代台灣報導文學之發展流變，及其興衰過程，並展望未來的發展趨勢，同時也探究報導文學在不同學術領域中的角色定位。

報導文學為近代文壇所發展出之新興文體，其發展淵源與台灣媒體及台灣文學息息相關，故本論文擬訂之方向係以台灣文學發展的脈絡為研究根基，依據時代背景的變遷，做為台灣報導文學發展歷程的縱向基礎，並以新聞學與文學兩種不同領域的範圍，做為橫向的研究面向，針對下列方向加以分析探討：

- (1) 台灣報導文學在文壇的流變過程。
- (2) 台灣報導文學在現代文學的定位。
- (3) 台灣報導文學在傳播學上所扮演的角色。
- (4) 現階段台灣報導文學的危機與重生。

本論文共分為六章，章節安排如次：第一章為緒論：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以及文獻回顧與探討。第二章為報導文學之源起，分三部份探討：其一為中國古典文學的開啟，其二為西方文論的發端，其三為現代報刊的推動。第三章為報導文學的角色定位，內容包括報導文學的定義與特徵，以及其在文學與新聞學上的定位。第四章為報導文學之分期概況，分日治時期以前、台灣光復後及解嚴以後等三時期探討，並分析七十年代鄉土文學

論戰對報導文學之影響層面。第五章為報導文學的發展狀況，內容分析報導文學從輝煌時期的風光到因過多弊病所衍生出的式微危機，乃至如何化危機為轉機重新出發。第六章為結論。

當代台灣報導文學的興起與發展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 | | | |
|-----|---------|-----|
| 第一節 | 研究動機與目的 | 0 1 |
| 第二節 | 研究範圍與方法 | 0 5 |
| 第三節 | 文獻回顧與探討 | 0 8 |

第二章 報導文學之源起 1 1

- | | | |
|-----|-----------|-----|
| 第一節 | 中國古典文學的開啟 | 1 2 |
| 第二節 | 外來文學的移植 | 2 3 |
| 第三節 | 現代報刊的推動 | 2 8 |

第三章 報導文學的角色定位 3 3

- | | | |
|-----|------------|-----|
| 第一節 | 報導文學的定義與特徵 | 3 3 |
| 第二節 | 報導文學的新聞定位 | 5 0 |
| 第三節 | 報導文學的文學定位 | 6 0 |

第四章 報導文學的分期	70
第一節 日治時代之報導文學	71
第二節 報導文學與鄉土文學論戰	80
第三節 解嚴後的報導文學	90
第五章 報導文學的發展	97
第一節 報導文學的輝煌時期	97
第二節 報導文學的弊病與危機	107
第三節 報導文學的重生	115
第六章 結論	127
參考論著	134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文學領域浩瀚無窮，在古典與現代間各有特色。報導文學一直被視為非主流文類，但在發展過程中與傳播媒體的演進歷程有著密切的關係。雖然，報導文學長期處於邊緣的狀態，但其在現代文壇所引發的風潮，卻是令人無法忽視。近年來，報導文學這項文體已逐漸受到重視，對此投入的關注焦點也日益增多，筆者因任職於媒體機構，對於新聞報導與報導文學早已存在著濃厚興趣，尤其是七十年代台灣報導文學快速竄起之後的流變，以及報導文學在文壇上所引發的文學現象，更是值得考察的重點。因此，在選題上係以此為依歸，擬對當前台灣報導文學現象做一釐析。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對文體的分類，固然有其特殊的意義與歷史定位，但這也讓中國的文體內容顯得包羅萬象。而報導文學在文學史上，受限於時代背景的因素，同時也缺乏強而有力的傳播媒介，因此，一直被視為新興的文學體式。它的書寫型態介於新聞與文學之間，並以散文的形式呈現，故而在傳統的文學創作中，反見其與其它文類不同的特出之處。

西方文學史的對文體的分類方式是形式與內容並重，大致可分為：詩歌、小說與戲劇三大類。一般而言，文學的基本分類是：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等，或者再加上文學批評。¹報導（告）文學因其表現手法常以記敘文

¹ 參見張健，《文學概論》，台北：五南圖書，1998年12月，頁112。

或抒情文方式呈現，或可將之歸為散文類，但報導文學的表現形式，有別於傳統散文，它所著眼的重點在於事件的描述與反應現實狀況，這與傳統的散文寫作是有所不同的。

文學是人生經驗的書寫，也是時代演變的反映，各種文學體裁都是在人類生活的發展過程中，不斷累積與轉化而來的。也就是說，任何一種文學體式，都可以在社會的變遷與文學演進中找到依據。因此，文學與時代可謂息息相關。報導文學的出現，正是與社會脈動有著相當程度的關聯性。

報導文學的風光歲月，起始於一九七五年高信疆先生在其主編的《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推出「現實的邊緣」專欄，在此之前，對此文類均以「報告文學」稱之，對於「報導文學」與「報告文學」的名詞差異，容後再敘。²但在近代的台灣文壇中，不可否認「報導文學」所帶來的旋風確實佔有一席之地。然而，此文類並非傳統散文體，它與傳統散文的區別在於「真實」與「想像」、「虛構」與「非虛構」，如果以報導文學的特質論，那麼，它所具有的特徵即為「真實」、「非虛構」。³

新聞傳播的基本準則中，「真實」是一項最重要的因素，但要如何真實重現，並且能夠兼具文學的美感，這恐怕在分秒必爭的新聞從業人員身上較難掌握得到。事實上，在報導文學如此特殊的文體中，可以發現作品的特色在於利用生動的筆法來陳述真實的事件；這也正反應出報導文學別

² 詳見第三章第一節，頁 34、35。

³ 鄭明嫻在《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10月）中認為：所謂的真實，應包含「文學的真實」與「歷史的真實」。前者指的是透過書寫者的反思，進而提出的詮釋與批判所形成特有之價值體系；後者指的則是作者本身所掌握的資料與個人體驗的真實性。

筆者以為報導文學雖然應兼容二者，但在創作的過程中，歷史的真實性應高於文學的真實性，因為必須在真實事件發生的前提下，才能根據該事件進行主客觀的書寫與描述，在敘寫的過程中則應兼顧文學的美感以及感興體悟，如此一來，真實的重要性才能突顯出來。本論文所探討之「真實」，主要論點係以「歷史的真實」為主，也就是作者本身必須確切掌握資料與個人體驗的真實性，此論點的著眼之處在於新聞學中的「真實性原則」，也就是真實事件的存在與發生。

於傳統新聞寫作的最大特點。伴隨著二十世紀傳播事業的快速發展，反應出民眾普遍而強烈的求知慾，因此對傳播的要求往往是既快速又準確，但在要求快速的同時，卻也容易造成太過強調速度以致忽略了文學性，報導文學的出現正可以彌補部份因速食資訊所遺漏的深度關懷層面。

在一片講究速度與真相的聲浪中，新聞報導寫作往往只做到傳播的功能，在事件的剖析面上經常會有不夠深入、沒有做好深度與廣度的追蹤處理；對於部份值得深入探討的主題礙於版面篇幅的限制，則又顯得無法著力。也因此，報導文學的發展在新聞傳播上還是有足以發揮的空間。就一個閱聽人（Audience）的角度而言，我們固然有知的權利，但更重要的是，必須明瞭事實的真相以及不同面向的探索，千萬不可淪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懵懂。從單純的新聞報導到報導文學當中的轉折過程與以及報導文學在現代文壇中所扮演的角色，均是值得探討的主題。

二、研究目的

報導文學的出現對新聞界及文學界均造成衝擊，除了其本身特定的寫作形式之外，還要加上新聞界與文學界的立足點相異所引發不同看法的爭議。

儘管文學與傳播之間的分際仍在性質、指向與內容中有所區隔，但文學與傳播間卻又是相互依存的，報導文學兼容著新聞性與文學性的特殊型態，為傳統散文的寫作方式敲開另一扇窗；相對於小說、詩歌等文類有其固定的書寫模式，報導文學所呈現的正是一種介於新聞與文學間的書寫形式。至於台灣報導文學的發展與過程與社會運動的關聯也是影響其取材的重要因素。

雖然，報導文學在台灣已有二十多年的發展歷程，但仍然被視為一種「邊緣文類」，無法晉身於文學的主流類型。⁴面對如此具有市場價值卻又

⁴ 參考自楊素芬，《臺灣報導文學概論》一書，楊樹清序，台北：稻田出版社，2001年9月，頁12。鄭明嫻亦在《現代散文構成論》一書中，認為報導文

無法取得文學定位的特殊文體而言，有必要對其源流以及發展狀況做一概括性的介紹，同時針對報導文學橫跨新聞與文學兩大領域的特點，為其在新聞學與文學兩個學術場域的定位問題加以闡釋。

對於報導文學未來的發展，有部份學者認為《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兩大報所主辦的文學獎，在相繼取消了「報導文學」的獎項之後，會對台灣報導文學的發展產生負面的影響，但是，是否真是如此？尚難論斷。不可否認，兩大報系取消該獎項，的確造成一些衝擊，但是，經過時間的淬煉，報導文學正以不同面貌展現，這也正是歷經沒落與衰微之後浴火重生的新時代報導文學。

藉由報紙副刊發表的報導文學，在報禁解除之後，面對電子媒體與網路崛起的競爭優勢，該以何種型態訴諸讀者？而新興電子媒體在告別扒糞式的新聞報導後，如何向報導文學借火，展開新型態的深度新聞報導，藉以回歸新聞的本質？缺少了兩大報文學獎的發表舞台，台灣的報導文學該何去何從？這些都是有待一一釐清的問題。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台灣報導文學的發展流變，並藉由現階段報導文學的傳播途徑分析其未來的發展方向；期許能為此文類的演進過程與發展前景歸納出可供依循之脈絡，也藉此提出台灣報導文學的文學地位，為彌補台灣文學史上稍有不足的缺憾。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訂名為《當代台灣報導文學的興起與發展》，係將研究範圍界定於台灣本土。由於報導文學的非主流定位，因此台灣的研究者多半著重於新聞與文學的爭議，以及對此一文類的理論依據加以探討，反而容易忽略了對作品主體的認知與價值分析。在「2002年兩岸報導(告)文學的發展與未來研討會」中，⁵兩岸研究者對報導文學的方法論亦多所討論，雖是如此，仍然沒有定論。

就兩岸的報導文學發展現況來看，隔著台灣海峽的彼岸，在政治生態改變之後，寫作的型態與取材的標準亦有所改變，文體的轉變都是隨著時代不同而有所更迭；時至今日，報告文學在海峽彼岸並非完全處於非主流狀態。有文壇上不少優秀的創作者、以及各大報告文學獎項中的得獎者，組成了「中國報告文學學會」，該學會會員中更不乏記者、教授等人士(如：涂懷章，中國報告學會理事，湖北大學中文系文藝教研室主任、教授；長江，原名常江，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常務理事，現任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節目主持人、記者)。

相較於大陸方面報導文學的蓬勃發展，台灣方面對報導文學的研究，就顯得比較薄弱。除了兩大報(《中國時報》與《聯合報》)所主辦的文學獎之外，雖然部份地區性所舉辦的文學獎，⁶亦設有報導文學獎項，但在條件上可能有所限制，例如必須將範圍設定於該地區，或與該區域有相關性為限，這個地域性條款所可能衍生的缺點，恐怕是讓作品的表現上較為

⁵ 該會議於2002年11月8日在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10樓國際會議廳舉行，係由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所主辦，並邀請(大陸)中國作家學會與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來台共襄盛舉。

⁶ 各縣市文化局會視其經費預算舉辦地區性文學獎徵文，例如：嘉義市的「桃城文學獎」、屏東的「大武山文學獎」等等。

欠缺宏觀的眼光，但另一個層面則是可以充份展現在地的特色。

再則，不少大學院校已陸續增設報導文學的課程，且多由中國文學系（所）所開設，⁷而在新聞或傳播系所對報導文學課程則顯得較不重視，目前所知有南華大學傳播管理學系開設兩門報導文學課程，但由兩位不同教師安排的授課內容，確也是具有可議之處，其一是以報刊的編輯為主，其二則是以新聞文學中的新聞寫作為主，二者無論就內容或取向而研均無法構成「報導文學」的研究面向；另有銘傳大學大眾傳播學系開設「報導文學」課程，然而其科目之英文名稱為「Journalistic Literature」，正確譯名應為新聞文學，且其授課內容亦是以新聞寫作為主。如此看來，台灣的學術界對報導文學的著眼點仍以文學的角度觀之，其新聞學上的定位反而顯得無足輕重。

雖然，報導（告）文學在對岸的發展較台灣為之完整，但礙於資料蒐集與分析上的限制，故無法將研究的觸角遍及兩岸之比較，是為一大缺憾。惟在「2002年兩岸報導（告）文學的發展與未來研討會」中，與會人士提出「台灣應創辦類似報導文學學會之專門團體，以利創作者與學術界相互交流」的建言，此一提議獲得不少掌聲。有朝一日成立之後，相信台灣的報導文學研究將會邁向一個新的紀元，對推動兩岸間報導文學的交流也會有更大的助益，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二、研究方法

台灣的報導文學雖然有過風光的歲月，但是在主客觀環境因素的影響下，仍有高低起伏；本論文將以台灣文學發展的脈絡為研究根基，依據時代背景的變遷，做為台灣報導文學的發展歷程的縱向基礎，並以新聞與文學不同領域的範圍，做為橫向的研究面向。

⁷ 東海大學開設《報導文學選讀及習作》，靜宜大學開設《報導文學》，東華大學開設《報導文學專題》、台北市立師院應用語言文學系開設《報導文學專題研究》等。

報導文學的社會性與文學性有別於其他文類，而且又與傳播媒體關係匪淺，因此在論述報導文學的社會性特質時，以文學社會學的角度切入，可以清楚釐清此文類的社會功能性，再輔以歷史資料分析與歸納，針對歷來報導文學的發展現象加以論述。

就文學社會學的角度來觀察，文學與社會的關係一直是密不可分的。劉勰認為文學發展中的種種變化，除了取決於作者本身的才性之外，最重要的仍是受外在環境所影響。因此，在闡述報導文學的演進過程中，就必須從社會的變遷與歷史的背景來加以觀照，對照作者 作品 社會關係，三者之間的相關性，透過社會生活與文學創作間的關係，進而明白報導文學的特殊定位。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報導文學雖然被歸類為非主流的次文類，但其所造成的旋風仍對七年代的台灣文壇掀起一股不小的風潮，面對這股新潮流的文學思潮，不少研究者開始投注心力對報導文學做比較深度的探討，也因此產生了不少有關報導文學的論著，並陸續舉辦學術研討會。茲分述如下：

（一）學術論文部份：

- （1）中央大學研究生楊素芬所著之碩士論文《台灣報導文學研究》（1999年），是台灣第一本本土的報導文學研究之學術論文，楊氏針對台灣報導文學的源流、寫作型態與發展現象，做了概括性的介紹，並載錄了「報導文學大事年表」以及「報導文學得獎名單及作品之資料彙編」等珍貴資料，對後來的研究者相當具有幫助。
- （2）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林秀梅之碩士論文《台灣原住民報導文學作品研究》（2000年），研究面向著重在有關原住民的報導文學作品上。

（二）專書部份

- （1）由陳銘礪主編，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的《現實的探索》一書，內容收錄三十餘篇有關報導文學論述的作品，這本報導文學的討論集對報導文學的研究視野具有開啟的作用。
- （2）最近期則有向陽、須文蔚主編的《現代文學教程 報導文學讀本》，在導論中對現代報導文學的概況稍作說明，其餘部份則是選錄歷年來優秀的報導文學作品，同時文後提出本文之評析以及延伸閱讀的建議。這本《報導文學讀本》不是傳統的學術性論述，而是以一種導讀式的風格讓讀者投入其中，此書的編輯體例，對初次接觸報導文學的閱讀者來說，是具有啟發性的實質作用。

- (3) 其他如尹雪曼、鄭明嫻、林耀德與高信疆、蔣勳等人也發表過有關報導文學方面的相關文章，分別刊載於各文學雜誌上。⁸

(三) 有關報導文學之學術研討會

- (1) 最早有《大華晚報》主辦的「報導文學座談會」(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台北中國電視公司會議廳舉行)，會中針對報導文學的現況與未來展開熱烈討論，並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印《文藝座談實錄》。
- (2) 近期則有連續兩年(2001年與2002年)由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所主辦的「兩岸報導(告)文學的發展與未來研討會」。其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所主辦的兩岸報導文學研討會，首度將討論的觸角深入海峽對岸，藉由海峽兩岸間的研究者與創作者共同與會，促進兩岸之間對報導文學作品以及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的交流。

(四) 報導文學的理論專書方面

- (1) 台灣目前還沒有相關書籍，僅集中在小篇幅的論述，或單篇論文探討。
- (2) 大陸方面有不少相關論著，其中包括對報導文學的演進歷程的著作，有李炳銀的《當代報告文學流變論》，以及尹均生、楊如鵬著《報告文學縱橫談》；另外，在理論批評的部份則有周政保著《非虛構敘述型態 - 九十年代報告文學批評》、丁曉原著《20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理論批評史》等。

- (3) 丁氏所著《20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理論批評史》內容涵蓋甚

⁸ 如尹雪曼在《中華文藝復興月刊》22期發表「報導文學與報告文學」一文；林耀德「臺灣報導文學的成長與危機」，載於《文訊》雜誌第29期。

廣，尤其對報告文學的理論提出不少精闢的見解，包括報告文學理論的建構與理論批評的特徵等，其中也對台灣的報導文學研究狀況做了說明，不過其中對台灣方面的論述，由於受限於篇幅，因此恐怕無法兼顧到全面性而失之偏頗。至於文學理論的論點，則是可以提供台灣學界參考，畢竟台灣一再強調報導文學缺乏強而有力的理論基礎，這本理論批評史正好可以彌補台灣在相關理論的不足之處。

綜觀報導文學研究的相關文獻，可以發現台灣方面的研究論著的確較大陸方面來得貧乏，對此既像新聞，又似文學的文類定位仍處於一種模糊不清的狀態，因此有必要對報導文學的認識做出說明，以釐清「報導文學」與「散文」的疑義。本論文將嘗試從歷年來的文獻資料，加以分析歸納，並透過不同的角度闡釋報導文學的敘事藝術與定位問題，也對報導文學的未來發展方向提出說明並做成結論，期能對台灣的報導文學研究開啟新的視窗。

第二章 報導文學之源起

從文學的時代性來看文類的發展，不難發現文體的轉變與社會的變遷、政經生態的改變息息相關。「報導文學」這一個新興文學體式的出現在七十年代所引發的風潮不容小覷，但其發展淵源則是有著各種不同的說法。茅盾曾說：

每一時代產生了它特有的文學。「報告」是我們這個匆忙而多變化的時代所產生的特性的文學樣式。讀者大眾急不可耐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日所起的變化，作家迫切地要求將社會上最新發生的現象（而這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給讀者大家看，刊物要有敏銳的時代感，——這都是「報告」所產生而且風靡的根因。¹

這個看法點出了「時效性」是報導文學在現代所以會崛起及風靡讀者的根本原因。至於報導文學的起源，可以從「文學的面向」解析，也可以根據「新聞報導的演進過程」加以探討，本章將嘗試從文學史的角度來說明報導文學的源起，並由中國古典文論以及西方文學來釐清其源流，再從報刊的推動影響分析現代報導文學的起始。²

¹ 見《中國現代散文理論》，收錄茅盾著《關於報告文學》，台北：蘭亭書店，1986年10月，頁257。

² 本章之探討面向，係參考高信疆《永恆與博大》及楊素芬所撰《台灣報導文學概論》等書，加以歸納而成，分別從中國古典文論、西方外來文學及現代報刊推動等三方面加以論述。楊素芬之著作即是從中國、西方與現代報刊等角度來闡釋，筆者認為其論述觀點相當具有參考價值，故在本論文寫作時，亦採用該論述面向。

第一節 中國古典文學的開啟

在不同的起源說當中，有部份報導文學的推動者，試圖從中國文學史的發展脈絡尋找其根源。最早的甚至上溯到以《詩經》、《史記》做報導文學的濫觴，提出此項見解的先驅應該可以說是曾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的高信疆先生。³

一、《詩經》之采詩與獻詩

高信疆在其發表的〈永恒與博大——報導文學的歷史線索〉⁴一文中，首先提出：「一部《詩經》正是報導文學在中國的濫觴」這樣的判斷。而此一說法正好映照了荊溪人在〈泛論「報導文學」〉一文中所述：

「報導文學」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文學，當我們的祖先沒有文采如結繩記事，烽火為號，史官的記載，和公私文書札，莫不有「報導文學」的價值。⁵

報導文學的起源眾說紛紜，若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報導文學，上述說法是可以成立的。考察報導的原意在於傳遞訊息，溝通交流，早在原始初民尚無文字記載的時代，所仰賴的溝通方式就是口耳相傳，這也是日後口傳文學的起源，同樣地，我們或可將口傳文學視為報導文學的一支，其所對應的意義在於「報導」的特性。魯迅曾說：

³ 參考自須文蔚，〈報導文學在台灣，1949—1994〉，《新聞學研究》，1995年7月，51期。

⁴ 見陳銘礪編《現實的探索》，收錄高信疆，〈永恒與博大〉，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69年出版，頁26-47。

⁵ 同上註，頁1。

文學的存在條件首先要會寫字，那麼，不識字的文盲群裡，當然不會有文學家了。然而作家卻有的。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到現在到處還有民謠、民歌、漁歌等，這就是不識字的詩人的作品；也傳述著童話和故事，這就是不識字的小說家的作品；他們，就都是不識字的作家。⁶

可見口傳文學當中的記述與傳播功能，其實正是報導文學的最初的起源。如果從文本來探究，則不能不從《詩經》加以解讀。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內容包羅萬象，其中不乏政治、社會、宗教、民生、經濟、婚姻、愛情等題材，它也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第一部偉大的作品集，這是從文學的角度來分析，也是眾所公認的。然而高信疆提出《詩經》是中國報導文學的濫觴，是從傳播的角度加以觀照，將《詩經》視為一傳播媒介、也是一溝通的橋樑，這對向來大都將《詩經》從經學文學面向研究的學界而言，不啻開啟了一扇新視窗。

《詩經》在形成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傳播現象即是「采詩」與「獻詩」。「采詩」指的是經由各地蒐集而來的民歌，這當中最重要的關鍵就在於蒐集，而這也正是「采」字的特點。許慎《說文解字》云：「采，從爪從木，捋取也。詩又多言采。」⁷，采的原意即在於取，也就是此處所說的蒐集之意。班固《漢書 藝文志》云：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⁸

⁶ 魯迅，《門外文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頁75、76。

⁷ 見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85年9月，頁27。

⁸ 班固，《漢書》，台北市：鼎文書局，1979年11月，頁1708。

採詩的主要目的在於搜集彙整，以獻君主，王者之所以觀風俗、知得失，也都是經由民間採集而來的民歌中，探究其意。《漢書 食貨志》說：

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樂，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⁹

因此，不難看出所謂的「采詩」正是《詩經》中最具報導典型的例證。事實上在《詩經》集結的時代，並無所謂純文學作品的觀念，其流傳的方式正是一種基本的傳播概念，高信疆並提出「小雅、變風、變雅中的社會詩，更是處處洋溢著現實的實態、民眾的聲音，鮮活而生動。」來加以佐證「採詩」相對於《詩經》的傳播性，也再次強調了內容的真實性與非虛構性，這也正是報導文學最為重要的特點。

不過，有關「采詩」的資料，《左傳》的記載是比較早的。《左傳》襄公十四年曾引用《夏書》云：

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¹⁰

至於「獻詩」的意義則在於經由各地蒐集彙整而來的民歌，交由專人統一整理。《說文解字》一書中對「獻」字的解說是：「肥者以獻，凡祭宗廟之禮犬曰羹獻，按羹之言良也」可見獻字的本意在於為了宗廟祭祀之用的禮節¹¹，也由此可以明瞭在「采詩」與「獻詩」的過程中，

⁹ 同上註，頁 1123。

¹⁰ 語出左丘明著，晉 杜玉集解《左傳會箋》，台北：明達出版，1986 年 10 月，頁 58。

¹¹ 同註 7，頁 237。

除了其真實性與非虛構之外，更重要的是可讀性以及重要性，也就是所謂的「肥者以獻」。

在沒有文字的原始時代中，口頭傳播成為當時最重要的訊息傳遞方式之一。在古代文獻中對獻詩則有記載，如《毛詩·小雅·節南山之什·巷伯》中曰：「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¹²《毛詩·大雅·蕩之什·烝民》亦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都是人臣作詩以獻天子的明證。《國語·周語》描述：

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蒙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¹³

這也都是獻詩的明證，獻詩是古代君主為考察時政，乃下令各級官員進獻詩章，其所傳達的意義在於進諫規勸，不僅可以讓當政者明瞭民情，更可藉由此項傳播功能做為擬訂政策的方針。

《論語·季氏》曰：「不學《詩》，無以言」，強調的是通過學習《詩經》不僅可以豐富語言的表達能力，更可以利用「賦詩言志」的溝通技巧，可見《詩經》不單只是純文學的作品，它還提供了一部不朽經典所具有的傳播功能與文化特質，如大雅裏的《生民》、《公劉》、《綿綿瓜瓞》等部份篇章，內容固然滿是神話傳說，另一方面卻也將初民開墾的形象做了極為詳盡的記載，而這正是報導的本質。

對於高信疆所提出的「《詩經》是報導文學在中國的濫觴」的說法，大陸學者亦表示了類似的意見，劉白羽曾說：「報告文學、特寫，不過是後來加的名稱。至於這種文學樣式，自古以來就在大量發展著，諸如《左

¹² 參見周錫複選注《詩經選》台北：源流文化，1982年10月，頁237。

¹³ 語出左丘明撰，韋昭注《國語》，台北：漢京文化，1983年12月，頁9。

傳》、《國語》、《戰國策》、《史記》。」¹⁴

相對於《詩經》是屬於詩歌體裁的文學，後者則是從歷史散文的體裁立論，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總之，兩岸學者對報導文學的認知，均是從其產生的社會背景與新聞傳播的特性出發。事實上，從《詩經》的特點觀之，此一經典巨著的確具備報導文學中「非虛構」且兼具「真實」的傳播功能。不過，這也僅是從採訪與真實的角度來做探討，而其實，在《詩經》形成的過程中仍有許多素材，諸如愛情、婚戀方面等題材，並非全然具備報導文學的特質，這方面恐怕是被忽略的。這可以說高信疆先生只是提供我們有關報導文學起源之一個值得思考的觀點，至於是否正確，其實必須要有充份的論證才可以。因本篇章僅針對《詩經》的傳播功能與報導的特質分析，故不對其他選材作品多所著墨。

二、《史記》中的採訪與報導

當文學的發展趨於多元與豐富時，呈現於外的功能與形式則會有更多的不同面向。《史記》的文學地位是無庸置疑的，高信疆先生嘗試提出《史記》的報導文學性，甚至以「中國第一位報導文學家」來形容司馬遷，此一觀點頗有新意。

因為在「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時代中，「記」字即為記載、登錄之意，而所記之目的為何？最主要目的仍在於傳揚於後世。如果我們從傳播的角度來看所謂的「記」，那麼，《史記》的確有其獨特的報導性存在。這或可從報導文學的重要條件 - 「採訪」與「報導」這兩個面向來探討。

首先在「採訪」方面：司馬遷對資料的搜集與應用，的確是有其過人之處，眾所週知，司馬遷對於搜集來的典籍均有詳細的推敲與考據，再加以應於其作品中，這可從「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百年之間，天

¹⁴ 見丁曉原，《20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理論批評史》，安徽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頁2。

下遺文古事，糜不畢集」¹⁵等處得到印證。

而且，在情感的投注上，司馬遷試圖將自己融入報導對象的生活領域中，親身體會被報導者的思想、生活情態等等，這些也都是報導文學工作者值得效法的態度。畢竟採訪者應該具有實事求是的精神，還要有一顆包容廣大的心，才能將採訪見聞，透過帶著情感的筆鋒加以敘述。¹⁶

其次，若從「報導」方面探討，可以發現《史記》除了具有豐富多樣的資料外，司馬遷並嘗試運用較為通俗與大眾化的文字加以闡述，這也使得《史記》充滿了開創性與可讀性。若從新聞的角度加以分析，報導的最終目的在於溝通，並能公告周知，假若在傳遞訊息的過程中採用了艱深晦澀的語言或文字，那麼，對一般大眾而言，其接受度勢必會降低，也失去了溝通交流的意義。

除了高信疆之外，張系國也曾在第一屆時報報導文學獎決賽會議提出：「我想，《史記》的 遊俠列傳 ，就是很好的報導文學作品。因為太史公對他所蒐集到的材料做了恰當的剪裁，在他蒐集的許多人中只取了幾人，這其中有太史公自己的意見，也能看出他心目中的遊俠定義，這麼好的東西以今天的眼光看，是很優秀的報導文學。」¹⁷可見被推崇為中國第一位報導文學家的司馬遷，其過人之處即是在善於蒐集資料，並經過求證之後妥適地運用，我們若以現代眼光觀之，事實上這也正是報導文學作者所應具備的基本要件。

基於報導文學的真實性與非虛構性這兩項重要特點，報導文學作者無法虛構事件，但卻可以選擇事件，也就是說，在題材的選取上可以主觀認定具有報導價值的部份。當然，這又涉及了「主觀」的意識認定。因為報導文學與新聞報導的最大區別即在於主、客觀之別。新聞報導的要素為客

¹⁵ 見陳銘礪編《現實的探索》，收錄高信疆著 永恆與博大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69年出版，頁26-47。

¹⁶ 此論點係參考自高信疆於 永恆與博大 一文中所論述。

¹⁷ 見高上秦主編《時報報導文學獎》，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2年，頁13。

觀事實的陳述，不可夾議夾敘，亦不容報導者加入個人情緒抒發；然而，報導文學的表現形式經常是帶有抒情描寫的筆法，同時夾帶著作者個人情感的投射。

雖說報導文學不可虛構，但並不意謂只要言之有據，就可以被稱為報導文學，還要針對內容的價值性與表現手法是否高明來加以判定。舉例來看，世家為專門記載王侯存亡的事蹟，但孔子並不曾封侯，依例則應歸位到列傳才是，但因司馬遷認定孔子典範足以垂教化於後世，論功績可與公侯相提並論，故而將其列入世家中¹⁸；又如：後宮嬪妃對國家興亡影響頗大，如呂后者流，廣封外戚為王，進而干預朝政，導致外戚之權位盛甚於王侯，因此司馬遷特別開闢外戚世家一卷¹⁹。從以上二例，吾人可以看出太史公並不以高低論人，也不以成敗敘事，同時又具洞察真相的智慧，這才是《史記》高明之處。

綜觀《史記》一書，內容貫穿千古，並開「紀傳體」史書之體例，顯出作者的獨到見解。因此曾有學者認為《史記》或可稱為報導文學的初論，這不僅涵蓋了《史記》的社會性功能，同時也證明了它所具備的「真實」、「非虛構」、「主觀」等報導文學的特點，當然《史記》不僅可稱為一部報導文學的作品，其本身根本就是一部經典之作。

三、其他作品

誠如上述，大抵而言，中國古代雖無「報導文學」之名，卻可謂有著「報導文學」之實。一般來說，只要具有「非虛構」與「實際採訪」特點的文學作品，皆可將其視為報導文學的源流。

曾有學者主張報導文學範圍不應侷限於某些特定題材，若以廣義之報導文學而論，那麼「傳記」與「遊記」應該也可歸類在報導文學作品之中。

¹⁸ 參考自詩影所作《史記》是報導文學的初論，《文藝月刊》，1989年8月，第169期。

¹⁹ 同上註。

不過，也有不少持反對意見者，他們認為所謂的傳記文學與遊記類作品，在選材上惟恐不夠嚴謹，表現手法也待商榷，因此並不主張將這類作品列入報導文學範疇中。

筆者以為《史記》除了是一部優秀的報導文學鉅著之外，更兼有遊記的特性，在《史記》中不乏太史公遊歷之見聞，在自序中有云：

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²⁰

由上述記載便可發現太史公足跡遍布半個中國，《史記》內容之記載多有其周遊各地所見，如《河渠書》所錄：

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滄，上姑蘇望五湖，東闢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²¹

又如《封禪書》曰：

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伺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²²

²⁰ 司馬遷，《史記》，台北市：鼎文書局，1979年11月，頁1。

²¹ 同前註，頁1415。

²² 同上註，頁1404。

對於這些司馬遷的旅遊閱歷，固然可以證明《史記》並非憑空創造，但從另一面向亦可將其視為「遊記」的範圍，也就是現代所謂之「旅遊文學」。

旅遊除了是遊山玩水，可以怡情養性之外，也能深入民間生活，體察每一個地方不同的風土民情。遊記是以記遊寫景為主的散文類型，而在中國的遊記文學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徐霞客遊記》。這部四十萬餘言的鉅著中，記載了徐氏遊歷的見聞，足跡遍及江蘇、安徽、浙江、山東、河北、河南、山西、陝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廣西、貴州、雲南等地，除了記錄遊歷所見所聞之外，徐氏也利用旅遊之便，詳細觀察了石灰岩地貌的情形，因此這不是文人惆悵的浪漫情懷，也不是自我放逐的流浪行為。徐宏祖秉持前所未有的樂觀態度，遊遍中國壯麗山川，他更以豐富人生的角度，用旅遊充實著生命。透過地理的、人文的遊記，引動生命底層的熱情。如此的表現方式，充份顯現出報導文學豐富的創作意涵，而這也正是報導文學的實證態度。

鄭明嫻即認為：

報導文學是一種目的文學，因此報導文學雖然常有報告者縱橫的行止，但報告者的遊歷只是一種為驗證而預設目的的手段，而遊記乃以遊歷本身的感興體悟為主旨，因此依作者在文章中所表現的目的，也可較為清晰地釐清「有遊記情節的報導文學」和「具備報導功能的遊記」間的異同。²³

依鄭先生的分析標準，此書自屬遊記無疑，不過《徐霞客遊記》雖以文言文寫成，但在敘寫過程採日記體，對結構的順序井井有條，而在語言文字的運用雖不刻意雕琢，卻見其雅麗，如此經典，雖然名為遊記，卻不能忽視其中報導文學的重要特質。

²³ 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頁223、224。

楊名時在《徐霞客遊記》序中寫道：

念其平生，胼胝竭蹶，歷數萬里，衝風雨觸寒暑者垂三十年，其所自記遊蹟，計日按程，鑿鑿有稽，文詞繁委，要為道所親歷，不失質實詳密之體，而形容物態，摹繪情景時，復雅麗自賞，足移人情，既可自怡悅，復堪供持贈者也。²⁴

文中即認為此書具備報導文學的寫實性功能，也具備文學的感染力。當然，若僅依作者之旅遊記實即稱之為報導文學，實屬牽強，這當中必須考慮內容的可讀性與寫作的表現手法是否兼具藝術性與文學性。

在中國不少遊記作品具備了上述特質，諸如柳宗元之《永州八記》、劉鶚的《老殘遊記》等，或許可算是報導文學作品。但是在柳文較重文學性及個人情操與身世之感於景物之中；而劉氏之小說仍不免虛構誇飾及富含諷世之意，又非報導文學之一項可以牢籠之。其次，傳記文學雖是記錄個人真實歷史的散文，但因兼具有文學性與報導性，在特質上仍可算是廣義的報導文學之一，不過多數傳記作品雖然文字技巧運用得宜同時亦重寫實，卻往往基於必須兼顧「引人入勝」的先決條件，在內容上經常流於狹隘又千篇一律，與真實之間仍有差距。因此，傳記文學能否列入報導文學的一支，仍需多方考證。

²⁴ 見（明）徐宏祖著《徐霞客遊記》，台北：民主出版社，1983年。

第二節 外來文學的移植

任何一種文體的源流都有其歷史意義，報導文學之正式出現於中國，約在二十世紀之初。但立波認為在西方的文學史中對報導文學的起源可追溯至海涅（Heinrich Heine）的《旅行記》。²⁵海涅的《旅行記》共分三卷，分別於一八二六年、一八二七年以及一八二九年完成，當中內容多半記錄了其遊歷的見聞，型態與《徐霞客遊記》類似，如《哈爾茨山遊記》、《北海記遊》等，若以現代眼光看來，或可將其視為旅遊文學之一。

鄭明嫻則認為報導文學在西方的發展，可分為兩大源流，一是社會主義報導文學，一是美式報導文學，前者以社會主義理念規範下的寫實主義為基礎，視報導文學為一種鬥爭工具，後者則係由自由經濟與民主政治環境下，因新聞寫作發達而衍生出來的一種文體。²⁶

報導文學在中國的崛起，屬於上述兩大源流中的前者，這與當時時代背景有著密切相關，在三、四年代中正值內憂外患之政治變動，當時的文藝青年對於能夠描寫當下情景與感受的文體情有獨鍾，再加上許多觀念的引進源自德國、蘇俄等社會主義國家，並由左翼文藝運動人士大力倡導，因此在整個走向上偏向社會主義報導文學。茅盾曾提到說雜文與速寫都是變動得很快的社會中文化鬥爭的利器，而後起的報告文學更是具有這種作用。²⁷

袁殊認為報導(告)文學之名實為外來語，三十年代稱為「報告文學」，報告文學是從「Reportage」翻譯而來，而「Reportage」則是從「Report」

²⁵ 立波在《談談報告文學》中云：報告文學（Reportage）是近代文學的一種新的形式。它的發跡，有人追溯到散文的發生，更回顧到德國詩人海涅的《旅行記》上去。詳見《中國現代散文理論》，台北：蘭亭書店，1986年出版，頁250。

²⁶ 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大安出版社，頁256。

²⁷ 詳見《中國現當代散文理論》，收錄茅盾，《關於報告文學》，台北：蘭亭書店，1986年10月出版。

（報導）一字衍生而出的新名詞²⁸。由此可見報告文學與報導有密切關係，「Report」一字正是新聞記者發佈採訪所得的消息，從「Reportage」可以看出文學與新聞的整合，不僅是在字義上，也是在實質的作品中。袁殊又說：

報告文學，如其名所示的是把靈心安置在事實的報告上；但不如照像那樣寫真樣的，機械的攝寫事實，它必須具備著一定目的與傾向的，然後把事象通過印象加以批判的寫出，這目的，是社會主義的目的。²⁹

「新聞寫作」的特點在於強調事實的陳述與客觀的描寫，而報導的目的不只在於透過傳播的功能傳遞訊息，賦予大眾知的權利，此外還必須有批判性，因此袁殊的論點除了闡明報告文學初入中國時的社會主義色彩，也不難看出結合新聞的批判性與寫實性。

趙遐秋先生曾指出：「報告文學」一詞間接來自日本人的介紹：

追溯報告文學一詞的起源，要從一九三二年二月所出版的《拓荒者》開始，其中刊登了一篇由馮憲章所譯、日本作家川口浩所撰「德國的新興文學」，文中提及基希從他長年的記者生涯中，創造出一種新的文學形式，就是所謂「列波爾達知埃」，這裡所提的「列波爾達知埃」是德語「Reportage」的音譯³⁰。

²⁸ 見《中國現代散文理論》，收錄袁殊，「報告文學論」，台北：蘭亭書店，1986年出版，頁241。

²⁹ 同上註。

³⁰ 趙遐秋，《中國現代報告文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頁23、24。

而胡仲持對報告文學的釋義，也正可對川口浩的論點有更具體詳盡的說明，他說：

報告文學這一名詞是德語 reportage 的譯名。在第一次世界之後，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國的知識份子群眾受了蘇聯大革命的影響，掀起社會革命的思想的高潮。當時德國左翼的報紙雜誌出現了一些用文學筆調赤裸裸地報導現實生活的作品，大家便把這種新興的文學體式叫做 reportage（報告文學），和一般出於虛構的所謂「小說」並列起來。這個新名詞在法語和英語裡似乎也有了一個相應的同義字，就是 reportage。³¹

在胡仲持的說明中，清楚地交待報告文學的由來，是德國因蘇聯革命的影響，而掀起社會革命的思想，導致報刊重視報導來自生活中的真實事件，不過並未提到要用文學的筆調描繪出，他強調報告文學的真實性，有別於小說的虛構性，因此從另一個面向來看，報告文學也是一種寫實主義的表現手法。

只是如前文所述，日本作家川口浩所言，在西方真正將報告文學這種文學體式運用得宜，並以大量且具特點的作品奠立報告文學的地位者，要屬捷克報導文學家基希（E.E. Kisch）。這位一八八五年四月生于布拉格，長時間擔任記者工作的作者，一生中採訪和旅行過許多地方，除了創作抒情詩與小說外，主要著作仍是在報告文學，作品包括《布拉格街頭拾零》、《祕密的中國》、《怒吼的新聞記者》、《墨西哥漫遊》等。要言之，基希認為，根據事實所寫的報告文學是一種「特殊的文學樣式」，而且能「達到獨立的藝術作品的境地」³²。

³¹ 參見《中國現代散文理論》，收錄胡仲持著《論報告文學》，台北：蘭亭書店，1986年出版，頁322。

³² 見李炳銀，《當代報告文學流變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

李炳銀即認為：基希之所以能在三、四 年代備受推崇，除了本身的經歷與作品外，更重要的是他認為「為了作品的藝術性而從事的各種努力之際，必須顯示出真實性 完全是真實的東西這一點不可。」「對於不失藝術的樣式和規模，而同時又能正確地顯示真實這件事，較之諸君所想像的是一種更困難的工作。」在這些意見中，基希清楚地點明報告文學的特徵，並且強調真實與藝術並存的原則。³³

對於基希在報告文學的地位，立波認為一直到基希的作品出來以後，報告文學才成為一種不能被人輕視的獨特形式，立波說：

基希 (E.E.Kish) 的報告，常常以一個事件或一群人物的整個，作為寫作的對象。他把事件的當前最重要的姿態，它的發生和發展的歷史，它的特徵，它的各種光景 (Aspects) 的對照，它所表露所含有的矛盾，以及它的發展前途和社會意義，都加以明快的記述；要是描寫一個階層，或是一群特定的人物的時候，他要把他們的生活和職業的特徵，他們過去的歷史，他們的前途，以及他們現在的境況，內在的團結和衝突都批判的記述著 基希的報告都根據正確的社會事實和史實，他旅行到事件發生的地方，深入他所要寫的人群的生活中心，他用自己的觀察分析得來的事實的細節，再採用許多可貴的文件 (document) 或歌謠等織成一篇完美的報告。³⁴

基希在報告文學上所以能夠成功的秘訣，從上文中可見他是重視事件或人群在時空中的真實處境，及分析生活中心和事實細節，再持用可靠文字的佐證。吾人由立波的觀點再反觀基希本身對報告文學所闡述的論點，

。

³³ 同上註。

³⁴ 見《中國現代散文理論》，收錄立波所著 談談報告文學 ，台北：蘭亭書店，1986年出版，頁251。

可以發現基希在報告文學特性的掌握上，不論是客觀事實的資料探討、或者表現手法的藝術性，都有其過人之處。

上節所述是源自德國社會主義報導文學，至於報告文學在美國的發展，高信疆認為是源自於新聞界的「耙糞運動」，這項專門揭發、暴露、要求改革的活動，讓美國人正視他們所處的環境與周遭的各項議題。³⁵事實上從所謂的耙糞到省思，是需要經過長時間的陣痛期，走過那段晦澀的時間，激發出報導文學在美國的燦爛火花，許多作者嘗試將生活經驗，不論是辛酸地、美好地，都訴諸文字呈現於外。例如約翰·根室的《內幕》系列，³⁶以及柯尼林斯·賴恩的《最長的一日》等。³⁷這些作品中反應的不只是真實的記錄，也不單是內幕的挖掘，背後所傳遞的意義在於對真實事件的正視與問題的深入探討。

不可否認，臺灣現代的報導文學在源流方面，經由報刊推動大部份是繼承自美國的新聞與文學結合的「新新聞寫作」(Newjournalistic Writing)方式³⁸。文學與報導原是相互依存的，經由二者的結合才能讓報導有文學的藝術因子，而讓文學擁有新聞的非虛構真實性。

³⁵ 見陳銘礪編《現實的探索》，收錄高信疆著《永恆與博大》，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69年出版，頁26-47。

³⁶ 約翰·根室的《內幕》系列以敘寫政治上的內幕為主，作者花費相當多時間訪問各地居民及政要等，據作者自稱，他曾先後訪問過九百人。透過訪問與記錄彙整，先後完成七部內幕書籍。

³⁷ 本書以記錄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登陸諾曼第戰役。此書雖為戰史的記載，但作者在情感的處理以及敘事的手法，都有別於一般的新聞報導，他以真實為主，感性為輔，做為創作的基礎。

³⁸ 徐佳士教授認為「新新聞寫作」應稱為「新的新聞寫作或報導方式」，主要是在寫作技巧上運用生動活潑的小說筆法以及想像力與創造力，吸引讀者的注意力。

第三節 現代報刊的推動

報刊的發展狀況與時代的變遷是密不可分的，依附報刊而生的報導文學同樣與時代有無法切割的臍帶關係，任何一種文學體式的發展與革新，都不可能是在一個自我封閉的環境中實現與完成。因此，我們可以說每一個時代產生了屬於它的特性的文學體式。

自從現代報刊誕生以來，文學創作與新聞便呈現一種密切結合的趨勢，創作者藉由媒體發表作品，使得文學創作不再是單一的個人創作行為，透過傳播媒介讓讀者與作者間形成一種互動關係。經由這樣的互動，促進了報導文學的形成與發展。

臺灣的報導文學在七〇年代的文壇引發一陣熱潮，居功厥偉的人物可算是高信疆先生，在其任職《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主編期間，推出報導文學的專欄（現實的邊緣），為引領風騷的報導文學極盛期揭開了序幕。

然而，報導文學此一文體的出現並非始於《中國時報》，早在抗戰之前就已經存在。而我國最早的報告文學作品，是在北洋政府時期，於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北洋政府因故與學生發生衝突，引發一連串的激烈反應，朱自清與徐祖正便分別撰寫了《執政府大屠殺記》和《哀悼與紀念》兩篇報告文學作品。朱自清所撰之文發表於何處並不詳，後見於《朱自清文集》；但徐祖正的《哀悼與紀念》則刊載於民國十五年四月所出版的《語絲》第七十五期。³⁹

「報告文學」的作品集在中國最早出現於阿英的著作，背景是從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到「一二八事變」，歷經諸多戰役，也造成慘重的傷亡，當時許多記者與作家便以類似報導文學的表現手法詳加描寫，透過媒體傳送。阿英從其中收錄二十八篇文章，編成我國第一部報導文學的專輯，名之為《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並在書中闡述編輯此書的意義⁴⁰，

³⁹ 詳見尹雪曼，《報導文學與報告文學》，收入《中華文化復興月刊》，22：4，1989年4月，頁47。

⁴⁰ 阿英所編之《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係由上海南強出版社在1932年4月出版

由於阿英的創舉也為日後的報導文學打開了創作的腳步。

在台灣方面，荊溪人先生在 泛論「報導文學」 一文中，將報導文學的演進分為四個時期：文牘時期（一八五八年）、記事時期（一八五八—一九一七）、描寫時期（一九一七—一九四五）、新聞文學時期（一九四五—）⁴¹。綜觀此四個階段的分期都是建築於傳播媒體的發展架構之上，在文牘時期並沒有成熟的報刊，所謂報導文學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至於記事時期，因報紙已粗具形式，故作品與報導文學之特徵是並存的，不過在各方面仍是未臻完備。一直到五四運動時期以後，我國報刊的發展已日趨蓬勃，報導文學的寫作才正式走向一個較為完整與進步的階段。

從報業的演進過程探究報導文學的發軔，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應追溯自梁啟超，一九八六年在上海主編《時務報》，一九八九年戊戌政變失敗後逃往日本，同年十一月創辦《清議報》，後來又創辦《新民叢報》和《新小說》。梁氏不僅重視新聞，也十分注重文學內涵，他在《清議報》所發表《戊戌政變記》內容詳盡記錄了戊戌變法的來龍去脈，更引起中外輿論的注意。

不可否認，《戊戌政變記》的真實性與藝術性都值得肯定；同時，梁啟超適時運用傳播媒介作為宣傳工具，為《戊戌政變記》的報導文學性起了加分的作用。不過，當時語言的應用雖然白話與文言夾雜，但是，梁啟超以其特殊的文字感染力為當時的新文學掀起了一陣不容忽視的風潮，梁氏心血令人嘉許，尤其是對白話文學的推動更是不遺餘力，這也使民國初年的文學運動，伴隨著報刊的成長而不斷蓬勃發展。

再看大陸學者的觀點，同樣視現代報刊的蓬勃發展為報導文學的重要推手，他們認為五四時期的文化變遷與發展，在客觀上為報導文學提供了

，編纂此書意義有二，其一為紀念這此偉大的事變，使讀者能進一步了解這此事變的經過與活動；其二為使讀者能因此把握報告文學這一文體，加以學習。

⁴¹ 同註 27。

必要的條件。一來因五四運動期間出現大量報刊，為報導文學的發展提供物質條件，二來則是因五四時期的許多政治活動及社會變動，為報導文學提供了客觀的外在環境條件，如《一周中北京公民大活動》，即針對五四運動做了極完善且詳盡的報導⁴²。

兩岸政權分立後，報導文學在大陸亦曾沉寂一段時間，一直到四人幫垮台之後，報導文學才隨著其他文類慢慢復甦。在發展過程中，它也側重社會變遷的歷程刻劃，大約從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的十餘年間，才陸續發表出許多作品，也出現不少報導文學的創作者。隨著大陸開放改革的腳步，報刊的限制較以往大為寬鬆，原先在題材與類型上引起爭議的作品，也不再受到太多的箝制。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間為例，共有六十五種報紙、九十餘家文學刊物，可以說平均每天都有一篇報導文學作品發表⁴³。

在臺灣方面，一九六六年國軍文藝金像獎，首先設立報導文學獎，其後高信疆在其主編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中開闢「現實的邊緣」專欄，這是第一個全面將報導文學廣泛介紹給社會大眾的媒體，並進而在短短數年間將其推展為風光一時的特殊文類。其後陸續又有《臺灣時報》副刊，以「愛與文學」為題發表一些報導文學作品，另外《臺灣新聞報》、《聯合報》、《臺灣日報》等副刊，也都相繼發表了大量屬於報導文學的作品。報刊的大力支援，讓報導文學的發展達到了極致，並成為當時最受人矚目的文體。

除了報紙以外，許多雜誌對報導的推動更是不遺餘力，如《戶外生活》雜誌、《大同半月刊》、《皇冠雜誌》等，因此，報導文學經由許多傳播媒體的推波助瀾，在短短數年間不僅在文壇上蔚為風潮，並形成臺灣報導文學的興盛期。亞弦認為報導文學之所以漸受重視，主要是因為社會多元性變化的結果，伴隨工業急速發展而來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無法取得

⁴²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剛剛爆發，《每周評論》就發表了長篇通訊《一周中北京公民大活動》，內容針對五四運動做了真實、詳細且具文學性的報導。

⁴³ 詳見余樹森、陳旭光合著《中國當代散文報告文學發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頁185。

協調，使某些作者覺得傳統寫作方式無法滿足現況，這才造就了報導文學的風行⁴⁴。這樣的論點正是報導文學與媒體結合的最佳說明，也反應出報導文學所具備之獨特的時代性。

由於報導文學作品豐富與多樣地出現，出版界也順勢出版了不少報導文學的作品集，在選集方面有高上秦所編《時報報導文學獎》、周寧編《飛揚的一代》、陳銘礪編《大地阡陌路》等。至於個人作品集部份則有心岱的《大地反撲》、古蒙仁的《黑色部落》、《失去的地平線》、李利國的《紅毛城遺事》、翁台生的《麻瘋病院的世界》、陳銘礪的《賣血人》、馬以工的《尋找老台灣》、眭澹平的《金嬌婆玩股票》等，可以說不勝枚舉。

總之，臺灣的報導文學在報刊的推動下的確風光一時，連帶也培養出不少優秀的報導文學創作者，如陳銘礪、古蒙仁、李利國、心岱、林清玄等人，這些創作者大多是由記者出身，在問題點的觀察與分析比較敏銳與犀利，同時因為接觸社會的層面較廣，在內容與取材上也較為豐富。同樣地，近年來比較出色的報導文學創作者如楊樹清、眭澹平、以及黃春明等人，也都曾歷經記者的採訪基礎訓練。

這樣看來，報刊的開放不單只是提供報導文學作品的發表園地，從另一個角度看來，也是為培養報導文學人才的搖籃。

回顧臺灣的報導文學在選材的類型上，由於深受美國新新聞寫作的影響，曾經專注於批評社會現實黑暗面，當時的確引起不少讀者的共鳴。然而，純然因批評所產生的作品畢竟不能長久，歷經作者與讀者的反思，近年來不論是題材的選取，與作品所呈現的風格，已然從批判走向關懷的溫馨路線。

曾傾力推出一系列報導文學作品的盤庚出版社發行人楊春龍，他對報導文學的觀點，替報刊與報導文學二者間作了很好的註腳。

⁴⁴ 詳見陳銘礪編《現實的探索》，收錄林進坤所著之《報導文學的昨日、今日、明日》，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69年出版。

報導文學即是透過一種媒體，使兩個世界達成溝通。這兩個世界可能是人與人之間，可能是人與物之間，可能是人與地方之間，可能是人與思想之間，或者是思想與思想之間，生活層面與生活層面之間。總之，藉著一種文學技巧的方式，來報導一個世界對另一個世界的關懷⁴⁵。

台灣的報導文學，從以往美式報導文學之專挖瘡疤耙糞式的報導，走向強調社會光明面的積極型態。報導文學透過報刊的傳播，反應了社會現況，也促進了一個新的讀者群產生，這些作品的特性與表現技巧，結合社會背景，有別於傳統新聞報導式的僵化寫作，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更容易觸發讀者內心深處對人性價值的肯定與對社會的認同感。

現代報刊對報導文學的推動確實功不可沒，在那樣一個風起雲湧的七十年代中，媒體除了提供版面發表作品外，相對於作者而言，媒體所扮演的角色，對社會的關懷層面與社會責任也可說是向前邁進一大步，而讀者透過閱讀也有著新的領會，更能滿足精神生活，對媒體、作者、讀者這三方面來說都是有所助益的。

⁴⁵ 見陳銘礪編《現實的探索》，收錄柳暗著「為歷史見證 - 楊春龍的「報導文學作品系列」」，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69年出版。

第三章 報導文學的角色定位

在文學的領域中，詩歌就像激情的浪花，小說是完整的建築，散文好比即興式的素描，而報導文學就如同一幅山水畫，要領略和理解其內蘊，必須綜覽全局，還要有整體的認識與判斷，才能見其真義。本章試就報導文學的特徵以及在新聞與文學兩種不同領域中的角色定位做一釐析。

第一節 報導文學的定義與特徵

要具體的為報導文學下定義實非易事，有人認為那是散文的一支，也有人認為它屬於新聞文學的一種，看法歧異卻又各有立論。報導文學原本應該涵蓋於散文的領域中，但其特殊寫作型態以及它的文學特性使得報導文學散發出有別於傳統散文的風貌，本節將從報導文學的定義與特徵分析說明。

一、 報導文學的定義

報導文學，原稱報告文學（Reportage），是以力求客觀報導性文字，針對特定時空下的歷史問題、社會結構，乃至人種與生態環境的發展、變異、衝突的過程，搜集與體驗各種見聞與紙上資料，而加以記錄報導的散文體裁，這是鄭明嫻對報導文學定義的說明。¹

報導（告）文學之名實為外來語，是從「Reportage」翻譯而來，而「Reportage」則是從「Report」（報導）一字衍生而出的新名詞，中國一

¹ 詳見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10月，頁254。

直以來沒有所謂「報告文學」這個名詞，在九一八事變之後第二年才開始引用此一名詞。當時的政經環境極不穩定，為了彌補有關新聞報導不足之處，才發展出以「報告」性質的文體，而阿英所編之《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其作品內容大多是是因應新聞報導未盡完善之處，進而深入補充說明者，期使讀者能夠更加明白與接受此一特殊文體。至此「報告文學」這個專有的文體名稱才算確定。而「報導文學」這個專詞是在一九七〇年代由高信疆所提出，他認為有必要與前期之報告文學有所區別，於是一開始便以「報導文學」稱之。

報導文學與報告文學究竟有何差異呢？尹雪曼在《報導文學與報告文學》一文中提到：

報導文學與報告文學是有差異的。從報導文學的「導」字，與報告文學的「告」字來看，首先我們可以看出的一項差異，就是「導」字比「告」字深入。所以報導文學比報告文學要有內涵。如果說報告文學是平面的，那麼，報導文學則是立體的。²

筆者以為這個說法是從字面上的解釋做為其論述的依據，稍嫌牽強，就廣義的角度來看，可將「報導文學」與「報告文學」視為同一文類的稱呼，不必拘泥於字面上差異，若要詳加論據二者間的異同，恐怕仍須在寫作型態、本質等方面，做進一步的考證。³

時間與空間不同，也是產生報導文學與報告文學二者間不同稱呼的因素。現階段台灣對此一文類均稱為「報導文學」，而在海峽對岸則稱之為「報告文學」，在「2002年兩岸報導（告）文學的發展與未來研討會」中，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訪問團團長張勝友在會中曾提出：「這樣

² 尹雪曼，〈報導文學與報告文學〉，《中華文化復興月刊》，22：4，1989年4月，頁46。

³ 此論點楊素芬在其所著《台灣報導文學概論》一書中亦持類似的看法。

的文體應該統稱為『報告文學』」，不過，如此的呼籲並不具有任何實質的意義。筆者以為，時至今日，兩岸的文化畢竟有所差異，所謂的「報導文學」與「報告文學」其實只是兩岸間的用語不同，所指均是同一文類，倒不必刻意在名稱上做文章，否則只是重回尹雪曼的論點，對提升兩岸作品的交流並無助益。

報導文學一直被視為特殊的文體，介於新聞與小說之間，多以散文形式呈現。報導文學究竟是報導還是文學？這是一個爭議已久的問題，有部份人士試圖從何謂報導？何謂文學？何謂報導文學等三方面做解析，但這種強行將其分開敘述的觀點恐怕有欠周詳，報導文學本身就是記敘類文體，它是融和了新聞性與文學性，以生動的筆觸描寫，反應時代精神與歷史本質的一種寫作型態，如果強以報導與文學二分法，做為解析的立論，也就無發突顯出報導文學的特性。

荊溪人先生在 泛論「報導文學」 一文中提出：報導文學的意義，是將文學的範圍限於報導之內，因之與新聞寫作有密切而不可分的關係。⁴荊溪人認為報導文學來自於新聞報導的傳承，從「深度報導」與「調查報導」延伸而來。的確如此，現今所談的報導文學大抵不脫報導的範疇，但它所引用的表現手法，卻非一般傳統刻板的新聞寫作方式，作者的筆觸往往增加了感性的成份，主觀的敘述亦加重不少。

李利國曾用「行動的文學」、「實踐的文學」來闡釋報導文學的行動特色，甚至認為報導文學是一種學習的過程、是一種教育的過程，是文學型態與新聞型態的綜合型式。⁵而林日陽（作家古蒙仁，現任雲林縣文化局長）在 2002 年 9 月 3 日舉辦的「雲林文藝營」中⁶，對與會人員講述報導文學的寫作技巧時，強調一般文學是用「手」寫的，而報導文學則是用「腳」

⁴ 見陳銘礪編《現實的探索》，收錄荊溪人著 泛論「報導文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0年4月，頁1。

⁵ 見李利國， 從擁抱自己的土地開始 - 高信疆先生談報導文學，前揭書，頁130。

⁶ 由雲林縣政府文化局主辦，假雲林劍湖山大飯店舉行。

寫出來的，也是對李利國的說法有所呼應。在各種不同的定義說法中，高信疆以最簡明扼要的敘述，為報導文學的定義做了最好的註解：

以文學的筆、新聞的眼，來從事人生探訪與現實報導的生動寫作方法。⁷

高信疆的說法，不僅涵蓋報導文學的表現手法，更提出了其獨特的性質。也就是說報導文學透過新聞報導與文學結合的散文型式，及時反映現實事件與問題，這種特殊手法的文體，讓文學創作愈發豐富與活潑，也讓新聞報導更加柔軟，閱聽者的接受度也更為提高與廣泛。

大陸學者李炳銀也在其論著中，為報導文學下了一個定義，他的說法正呼應了高信疆的論點：

真正的報告文學，是指那些及時對社會生活中富有思想、情感、文化內容並為人們普遍關注的社會現象、重大事件、特殊人物作真實藝術報告的散體文章。⁸

由此兩岸學者所持相同論點看來，報導文學定義的重點仍在於以文學筆調來反映社會現實狀況，且不同於一般散文的文學體式。

二、 報導文學的特性

探究報導文學的定義，必須觀察的層面在於報導文學所具備的獨特性

⁷ 見高信疆，〈永恆與博大 - 報導文學的歷史線索〉，前揭書，頁 26。

⁸ 見李炳銀，〈當代報告文學流變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 年，頁 67、68。

質。概括來說，報導文學的特點在於真實非虛構以及主觀勝於客觀這兩項原則，茲就其特色析述如下：

（一）真實與想像

真實性，可說是記敘文在內容上的一個基本特徵。記敘類文體的真實，其實就是一種社會真實，它所反映的都是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事件。「真實」，就是報導文學的生命元素。

報導文學一直被視為介於新聞與小說中的特殊文體，因為它具有新聞寫實的特性，與一般散文、小說等文體相較，它具備了更直接、更快速與更真實地反映社會現況與時代背景得特殊功能性。報導文學的真實性，源自於新聞報導中的基本要求；「報導」所應具備的基本條件是：必須有事實的存在，決不可無中生有。大抵而言，報導是知性的、客觀的、與事實的，這必須追溯到新聞寫作的訓練過程。

在新聞從業人員的養成教育中，新聞寫作是極為重要的一環。寫作的基礎概念在於「客觀報導」與「陳述事實」。尤其在用字遣詞上更是要求做到簡潔精確，同時要摒棄個人的見解和情緒，以期達到完全公正客觀的原則。在新聞專業對真實報導基本原則的要求之下，反應在報導文學作品中，就是「真實」。報導的目的在於溝通，如果能夠巧妙運用藝術的手法，透過大眾普遍可知的文字，傳遞報導的意涵，便可算是一篇理想的報導文學作品。

黃鋼在《報告文學的時代特徵及其必須嚴守真實的黨性原則》中指出：「報告文學與生俱來的主要特色之一就是它的真實性，它之所以誕生的社會意義，也在於它是提出了真實的戰鬥生活的內容」。⁹報導文學重視事實的特點，使它有別於一般小說與散文。小說的故事鋪陳，可以是街談巷議，也可以天馬行空，而散文與詩歌，在揮灑的空間也不若報導文學那般侷限。報導文學的「報導性」也就是根據真實事件加以闡述，如果僅是

⁹ 引自朱艷英主編《文章寫作學-文體理論知識部份》，高雄：麗文文化，1994年11月，頁50。

捕風捉影，那與小說也似乎並無太大差異。報導文學的真實性一再被強調，要回歸到它的時代性。文學反映了時代的變遷，尤以報導文學為最；一般的文學作品或許可以不必考慮社會性，而報導文學與社會脈動息息相關，因此在傳遞訊息的同時，就不能有虛構的成份，否則就流於傳統記敘散文。

荊溪人先生認為報導文學是新聞報導的延伸，可以彌補新聞的不足之處，再加以詳細分析與深入論述，此一論點正與報導文學的真實性相呼應。不過，林清玄先生在《竹筍與報導文學》¹⁰一文中，提出一個令人不敢恭維的論點，他首先指出「既是報導，必然含帶著事實的根據」，但隨後卻又提到「事實的時地人事物並沒有絕對的價值，人物姓名不必全真，只要反映出一個問題、一個意象、一種理念的癥結所在」。這種自相矛盾的論述，立即被加以反擊，¹¹如果誠然如林先生所言，報導文學中屬於「報導的真實性」不是必要條件，報導文學也毋須獨立成為新的文類。

文學形象的表現大多離不開想像，但報導文學的寫作由於著重於事實描寫，其所選取的題材對象必須是實在的人、事、時、地、物，所以並不需要想像；相對地，小說卻不一定是實際存在的事件和人物，它可以是與現實毫無關的素材，或者有人質疑寫實小說的取材來自現實社會，在虛構的成份上應該大為減低，但是，小說家終究還是側重在個人的想像，作品內容仍難以擺脫虛構之嫌；另外，散文由於涉獵層面也十分廣泛，因此，它也可能是一種抽象的書寫手法，托物言志、借景抒情，這也與報導文學所要求的真實描述有所抵觸。

報導文學作者必須排斥虛構內容的想象，這是立足於「報導」的角度之上，但若以文學的角度觀之，有利作品謀篇布局的想象，又是

¹⁰ 見林清玄，《竹筍與報導文學》，前揭書，頁95-100。

¹¹ 白冷在民67.9.4台灣日報副刊發表的《報導文學是竹筍嗎？》一文中，對林清玄的論調表示不以為然，他認為林先生以不真的人物和不真的事件，穿上報導文學美麗的外衣，設若如此，是為不誠。

十分必須的。因此，報導文學作者在寫作時應有想像的意識，正確地使用想像，善於運用想像作為形象化服務。¹²

在一片講求真實的呼聲中，大陸學者丁曉原率先提出適度的想象有助作品的形象化。此論點與林清玄早先提出的「事實的時地人事物並沒有絕對的價值，人物姓名不必全真，只要反映出一個問題、一個意象、一種理念的癥結所在」，並不相同。林清玄說的是反應問題的方式並非全然取決於人、事、時、地、物的真實，這是違背報導的真實原則，如此觀念下，作品內容往往會夾雜太多作者的思維，以致產生作假的情形。丁氏強調的是在篇章布局的想象空間，這種做法是有助提升作品的張力，卻不影響作品本身的真實程度，不可否認，報導文學亦需要剪裁，才能有更生動逼真的文字敘述形之於外，同時對整個作品的鋪陳更具影響力，就此層面來看，讀者比較容易被接受的。

報導的主要性質是將生活中所發生的某一個事件，迅速且確實地報導給讀者，題材是已發生的事件，所以它具有濃厚的新聞性，但它終究與新聞不同，因為它必須充份的形象化，形象化是文學的外在標記，所以透過對環境與人物的生動描寫，才能讓讀者感同身受，也才會表現出報導文學的內在特徵 - 感染性。¹³

報導文學必須忠實地反映現實生活，這種真實性，並非新聞通訊中的簡明事件陳述，也非文學作品裡所概括創造而來的「事實」，它是藉由翔實的筆觸，以藝術手法描繪，還原事件原貌，這也使得報導文學能夠貼近時代的脈搏，適時加以批判與探討，這些正是報導文學的美感特質 - 真實

¹² 見丁曉原著《20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理論批評史》，安徽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頁31。

¹³ 羅蓀在《談報告文學》一文中曾指出：報導文學必須具備著強烈的感染性，由於作者的豐富社會情感的傳染，使讀者和作品一同喜怒，一同哀樂。惟其能激起讀者的同情，才能發揮了報告文學的暴露的，煽動的目的。本文收錄於《中國現代散文理論》，台北：蘭亭書店，1986年10月。

性與批判性。

丁曉原在《20 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理論批評史》中，對報導文學真實性提出如此說法：

報告文學的真實是一個三維結構，其中包括定位真實（特定時空背景下的具體人事）、全息真實（內含全部材料及其細節是實有的）和本質真實（顯示對象的內在特徵）。¹⁴

由此看來，報導文學的真實性必須由此三方面組成，倘若有任何一點失真，將會造成報導文學的結構鬆散，也將失去必備的可信度。

從抗戰時期阿英的《上海事變到報告文學》，到最近楊樹清的《衝破海峽中線》，歷經時間與空間的轉變，不變的共同點是「真實事件的存在與發生」，小說的情節大都是虛構，只是作者儘量描寫的合情合理使人置信，二者之間，還是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在真實與想像，虛構與非虛構的分界中，大陸學者涂懷章做了一個好的註解：

巴爾扎克稱小說為「莊嚴的謊話」，我謂報告文學是「藝術的真話」。

¹⁵

（二）主觀與客觀

報導文學的敘事型態與新聞報導的描述手法，在主客觀之間的認知與分野，有著極大差異。新聞採訪的過程，重在對事件做客觀的描述，寫作

¹⁴ 見丁曉原著《20 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理論批評史》，安徽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2 月，頁 25。

¹⁵ 參見涂懷章，〈對報告文學真實性原則的再認識〉，載於《兩岸報導（告）文學的發展與未來研討會》大會手冊暨引言稿，2002 年 11 月，頁 62。

者並不加入自己的意見，避免淪入主觀的評論者，而報導文學則是在客觀事件的描繪上，加入了作者本身介入程度的主觀敘述。

敘事立場的主客觀，是直接反應於作品之中的。在新聞報導的寫作守則裡，首重客觀原則，當然，客觀並不代表被動，客觀所具備的前提是立場的獨立超然，報導者不能自己先入為主，在作品上亦不能有夾議夾敘的情形產生，傳播媒體一直要求必須嚴格遵守公正客觀的立場，必須遵守新聞報導不能夠發表個人的意見。但是，在某些事實的描寫上，為使讀者能有更多元的角度與宏觀的視野深入探討，改以不同面貌呈現，也是報導文學得以發展的因素。

現今所談的報導文學仍脫離不了報導的範疇，但它引用的表現手法卻非一般刻板的新聞寫作方式，作者慣用的寫作筆觸是感性的成份增多了，主觀的敘述亦加重不少，同時格局擴大了，可以有更廣闊的空間延伸。報導文學適度彌補了新聞報導的不足之處，在對事件的批判上與作者本身切身投入問題中，這些都讓報導文學的敘事觀點加入了更多的作者的主觀意識。

不少報導文學作者對現實社會生活的介入，不單侷限於一種媒介式的溝通，也不單是一種全然的批判心態，而是對社會人生與生命的一種積極熱情參與。儘管作品中包含了喜怒哀樂，但是這些情緒的流露，對作者而言，並不是一種局外人似的超脫，相反地，它正是作者們情感的反映。報導文學對社會人生現象的寫實描述，並非如同相機般機械式的描摹，它適度加進了作者主觀的感情成份，進而使客觀存在的事件變得更活潑與生動。

客觀與主觀一直是對立的兩個面向，過份強調報導文學的主觀性，是否表示其客觀性就已不存在？事實上在主客觀的認定標準之間，還是有著模糊地帶，但不論主觀或客觀標準，在時空上都是必須考量到社會的公益性。筆者以為報導文學中的主客觀其實是共同存在而且互相依存的，作者本身必須透過客觀存在的事實，然後進行主觀的觀察描寫與論述，才能產生一部良好的報導文學作品，如果過份強調主客觀因素，恐怕會使報導文

學的發展受到束縛。

文學的性質有別於報導在於它經常是感性的、主觀的與想像的；報導卻必須是理性的、客觀的與事實的。報導文學如何在的新聞與文學中取得平衡，進而獨立成為一種文學體式，這不只關係到作品本身呈現於外的風貌，還要追溯到作者本身不但要具備有豐富的藝術修養，還要具備新聞記者的敏感度與機動性。

尹雪曼在 報導文學與報告文學 一文中指出：

報告文學可以稱之為 reportage；報導文學，則應該是 feature。

因為我們主張的，或理想中的報導文學，文學性要強過新聞性，而主觀性也決不低於客觀性。¹⁶

報導文學與新聞報導畢竟有所不同，報導文學是依據現實事件所作出的報導式文學作品，它本身就已經具備了足夠的新聞性，而新聞報導僅是單純地陳述事實，因此在表現手法上，報導文學作品是需要更多的藝術性，也就是說，在敘事的技巧上，文學的筆觸中的主觀成份，會大於新聞報導客觀的平鋪直敘。

從文學發展的歷程審視，可以發現報導文學的母體是新聞，因此，在探討報導文學的特質時，就必須透過其新聞性加以觀照。報導文學的新聞性可從兩個層面來分析，其一是「時效性」；其二是「真實性」。所謂的「時效性」，係源自於新聞學中的迅速傳遞有效訊息的概念，這種觀念應用於報導文學的作品中，也就是適時地反映社會問題，並且深入剖析與探討。其次「真實性」原則，這不僅是新聞學上所要求的基本條件，也是報導文學的必要條件。報導文學的真實原則，讓它與其他不同的文學樣式逐漸有了區隔，反倒是與新聞中的實事求是、切合社會脈動的特質較為貼近

¹⁶ 見尹雪曼， 報導文學與報告文學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22：4，頁46。

些。

曾有學者提出「報導文學作者應有善思的哲學思維」的論點。¹⁷這個觀點對現代報導文學是具有啟發性的意義，報導文學作者之所以應該具備哲學思維，是因為他要在多變的環境中，做出正確的判斷，而這種判斷力必須是全方位的，不受外力所影響，才能在主客觀之間取得相對的平衡。誠如羅蓀在《談報告文學》一文中所述「它必須具備正確的政治認識，才能把握每個個別事件與現實社會整個發展中的關聯，才能夠正確的表現每個個別事件的中心意識」。¹⁸

報導文學既為文學，就不能忽略文學性的問題。所謂的文學性其實可算是一種抽象而模糊的概念，簡單來說，就是要求報導文學的創作者必須要有豐富的文學素養，也就是說作者本身應有主體的形象化意識，同時透過文字以藝術手法表達。

一部好的報導文學作品在文學性的表現上，應超越新聞通訊，卻與小說有所區隔。它必須具備小說中所具有的藝術條件，如人物刻劃、環境與氣氛的描寫等，但是卻不能如同小說一般，為了強調藝術手法而過份渲染與虛構情節，儘管如此，在某些層面上，報導文學仍有向小說與散文借火的情形。報導文學雖然取材自新聞事件，但它大量使用了感性的文字，以小說的架構作故事性的敘述，輔以散文的感性的筆觸加以書寫，這也讓它的文學性成份提高許多。

報導文學長久以來，始終被視為一種新聞性體裁的文體，這讓報導文學的文學性相對減弱了，不過，這樣的情況正逐漸在改變當中。當此文體被賦與更多的文學寫作的技巧時，也就轉變成為一種帶有抒情手法的敘事性文體。文學手法的描摹比起傳統新聞寫作方式，是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報導文學雖然具有新聞的特性，但它的彈性空間也就在於文學中的感性成份，能夠適度表現在作品中。

¹⁷ 同前註 12，頁 28。

¹⁸ 有關此論述詳細內容，可參見《中國現代散文理論》，所收錄羅蓀著《談報

從報導文學的主客觀條件與文體特徵反思，或者可以發現唯有真實性與藝術性的和諧，主、客觀的分野不再被過份限制，報導文學才能脫離新聞報導的範圍，也與小說、詩歌、散文等有所區別，進而成為一個完整獨立的文學體式。

三、報導文學的敘事藝術

從敘事學的角度來分析報導文學，可以發現創作者本身是通過了敘事視角，將情感與內在的生命情境投射於作品之中，也由於這樣的表達方式，讓報導文學有了更豐富的意涵與張力。以往的報導文學常以第一人稱「我」做為敘述的主體，但是在多樣化的視角觀點下，現階段的作品已經有了全新的思維方式，顯現於文本中的敘述手法，經常是不同人稱的交叉重疊運用。¹⁹這種敘事方式可以將人物形象更加立體化，讓作品可具感染力與可讀性。

報導文學的寫實風格是對社會人生現象的一種描述，這也意謂著報導文學是一種開放性的文學，因為其強烈又鮮明的時代色彩在作品中一一呈現，作者透過作品展現出本身對生活的投入，使得讀者能夠在閱讀之餘，也融入了報導文學作品內容之中的情境。寫實是報導文學的一個主要特性，它既要忠實而樸素的記錄所描述的人事物，就得從它的敘述語言與表現手法以及不同文體的思維等方面來加以論述：

（一）語言的使用

由於報導文學著重於現實事件的描寫，在文字的應用上也偏向樸實與白話，這與其他文類在修辭章句上雕琢，有著明顯差異。報導文學的目的在於對事件的原貌忠實呈現，它所採用的敘事模式可分為：

告文學，台北：蘭亭書店，1986年10月，頁283。

¹⁹ 人稱交叉運用的作品不少，諸如官鴻志的《不孝兒英伸》、柏楊的《穿山甲人》等，可參見向陽、須文蔚主編之《台灣現代文學教程 報導文學讀本》，台北：二魚文化，2002年8月。

(1) 以第一人稱來敘述表現事件的發展經過。²⁰ (2) 主觀的敘述方式，以作者本身的思維以及現實素材相結合。²¹ (3) 以第三人稱方式敘述。²²

文學作品的人物視角是記敘類文體所經常採用的敘述視角。這種敘述手法在於敘述者本身往往就是作品中的主角，作者在深入了解事件的經過內容後，用主人翁的眼光加以分析、描述，甚至以第一人稱的方式來闡述。不過，在寫作的過程中，一篇文章，往往並不以單一視角方式做敘述，它可能在其中夾雜了多種的敘述角度，藉以突顯作品的張力。

報導文學應該是大眾文學，因此在敘事要講平實，用語要求素樸，口語化的意味較濃，但卻不淪入空洞花俏，華而不實的弊端，它應該具有一種質實通脫的美感。蔣勳在《土地是我們的 - 序馬以工新書尋找老台灣》一文中提到：報導文學要言之有物，它的敘述方法，文字上的技巧，比較質樸簡易，這種文學形式的發展，平衡了部份刻意強調「文學」技巧的畸型現象。²³從上述論點不難發現，在報導文學的語言文字的應用上，應該力求簡樸；在敘述方式上，也要擺脫矯柔造作的風格，才能使報導文學創作回歸到真實且質樸的道路上。

(二) 寫作的技巧

報導文學在語言與文字的運用上力求樸實，但在寫作的筆法中，卻不能因為受限在真實與質樸的原則下，而淪為一種流水賬式的記錄性文章。不過，若是硬性規定報導文學必須採取固定的寫作形式，是

²⁰ 此種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我」既是描述者，又是內容中的主人翁。

²¹ 此類敘述觀點重在強調作者主觀的情感表達。

²² 此種敘述，作者居於旁觀者的立場加以描寫，僅是單純記錄事件的始末。

²³ 詳見馬以工，《尋找老台灣》，蔣勳，《土地是我們的 - 序馬以工新書尋找老台灣》，台北：時報文化，1979年12月。蔣勳所謂的畸型現象係指矯柔造作與個人感官氾濫的散文形式，他認為散文內容的貧乏與形式的俗濫，讓文學創作者喪失了思辨的能力，也讓情感相對萎縮。

有困難度且不可能實施的。

文章的結構取決於其表達手法，記敘文主要用於記空間的靜態景物，敘時間的動態事件。²⁴報導文學既有記敘文的特點又兼具新聞的特色，因此，在寫作技巧上仍有努力的空間。不少報導文學創作者會受限於新聞報導的觀念，在文中就只做了直接的描述；但是這樣的平鋪直敘只是讓報導文學作品空有報導性，卻無文學性可言。

報導文學在書寫的的技巧上，情節的安排與細節的描寫兩方面，是除了用字遣詞以外相當重要的項目。首先，在情節的鋪陳方面，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必須架構在篇章的安排，一部好的作品，要能引人入勝，就必須要有完整的結構性與嚴謹的佈局，透過情節的表現與材料的剪裁，進行刻劃；其次是細節的描寫，報導文學終究不是空洞說教式的文體，而是在作品中展現藝術形象的生動，報導文學對細節的刻劃，不論是人、事、物的內在情感或基本型態，都適度反映了對象特質，而這種特質正是報導文學所必備的元素，透過細節的描述，配合篇章的佈局，才能使報導文學的作品更具藝術的感染力。

（三）越界的思維

在真實原則的要求下，報導文學常以記敘文體面貌顯現，但是否因為受限其中，就讓報導文學失去向其他文類借火的權利？當報導文學的新聞性與文學性得以釐清後，如何能夠讓報導文學吸取其他文類的寫作技巧與表現手法，讓作品在結構表現上有更寬廣的空間，這是新時代報導文學應具備的思維方向。

報導文學在文體的架構上，有逐漸向小說、戲劇等靠攏的趨勢，小說的情節虛構的成份居多，卻有完整的故事；戲劇雖然也帶有濃厚的虛構意味，卻深具藝術性；而報導文學在選材上與章節的鋪陳已有小說的影子，它吸收了小說的生動描寫技巧，也吸取了戲劇中的藝術

²⁴ 參見朱艷英主編《文章寫作學-文體理論知識部份》，高雄：麗文文化，1994年11月，頁53。

對話，甚至有詩歌裡的蒙太奇跳躍式手法，這些都讓新時代報導文學擁有了多重的藝術形式，不再是單一的敘述口吻。

一篇好的新聞報導與文學作品在寫作上具有許多相同的特色，二者都強調用字須精鍊、語意要流暢清晰、段落要分明等，當然新聞寫作終究與文學創作有所差異，其中最大的差別也就在於新聞性與真實性這兩項新聞寫作的基本功，但是，報導文學由於結合了報導與文學的特點，因此新聞性與真實性也就成為向新聞學借鏡的參考指標。

報導文學的涵蓋層面，雖然以現實社會為主，但它的表現形式卻結合了新聞學與小說、散文、詩歌、甚至是戲劇的手法，這對向來將報導文學界定在記敘類文體的研究面向而言，是一個值得思考的空間。

（四）美感的特質

黃春明先生在「2002年兩岸報導（告）文學的發展與未來研討會」中，發表了專題演講「淺談臺灣報導（告）文學的本質」，在這場長達四十分鐘的演講中，黃先生不僅暢談了其採訪寫作的心路歷程；另外，還特別強調了報導文學的美感即是「真實」與「批判」。

黃先生的論點是從寫作的態度來加以說明。但是，報導文學既為一種特殊文體，則必有其特殊的美感特質，而這些特質絕非僅以真實性與批判性就能一言蔽之。在探討此等文體的美感時，我們必須回歸到創作的原點。

在創作的過程中，作者切身投入問題的程度影響了整個寫作的風格與情感表達的方式。白先勇在「驀然回首」一文中，提到：「作品的文字技巧及形式結構是否成功的表達出作品的內容題材」，²⁵以此為小說批評的第一項標準。這個論點不只適用於小說的品評，報導文學的審美特質亦相去不遠。

²⁵ 詳見白先勇，《驀然回首》，台北：爾雅出版，1980年。

對於作品中的表現形式與寫作技巧的關注，是檢視報導文學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寫作技巧的應用是使作品得以引人入勝的要素，這當中包括了向其他文體借火的書寫方式以外，還必須加入深刻的寓意，以及對社會階層、自然環境的指涉，並以此為寫作的基本架構，透過不同層面的剖析，作品的成熟度與豐富性也才能顯現出來。

除了批判性之外，報導文學對社會所投注的關懷也是不容忽視的焦點。雖然，在此文類發展的過程中，曾經有部份作品帶著批判意味，但是，在時間與空間的轉變之後，報導文學在題材與書寫風格上，已然轉向具社會認同的關懷面向，而關懷性所涵蓋的範圍則顯然較批判性來得宏觀許多。

其次，在討論表現形式上，則可以從情感的投入來加以觀照，報導文學的特殊書寫形式，在於主觀經驗的抒情文體與客觀事件的敘事文體融合為一。²⁶作者透過本身的書寫來反映對事件整體性的探討，這種表現手法取代了對現實的直接敘述，反而讓作品更顯細膩與自然，對創作者與讀者來說，都是一種新的領會。報導文學的美感也不再是單純地以真實為依歸，而是應該走向更開拓的視野，融入更多的文學因子，才能創作出更多具有豐富面貌與生命意涵的作品。

²⁶ 參考自柯慶明，《中國文學的美感》，台北：麥田出版，2000年1月，頁52。

第二節 報導文學的新聞定位

報導文學一直被視為新聞報導的再延伸，對傳統的新聞報導有何衝擊？在新聞傳播的功能上又具有什麼樣的定位？都是值得探究的方向。

一、新聞報導的進程與報導文學

新聞寫作與一般文學寫作有何異同？基本而言，不論何種寫作都要求用字必須簡潔精確、語意清晰流暢、段落分明以及儘量避免空洞用詞等要點；但是新聞寫作與傳統文學寫作最大的不同點在於：新聞性、真實性、客觀性、公平性與完整性等。報導文學有別於一般傳統寫作的特點正是新聞性與真實性，這兩項重要因素也正是新聞寫作的基本要件，再加上報導文學的選材多半係由新聞事件延伸，報導文學與新聞的淵源自是不可輕忽。

新聞寫作所涵蓋的層面遍及社會各階層，它所報導的內容是以社會現象為主，因此探究報導文學新聞性，必須從新聞學的演進過程做一瞭解。美國的新聞學對台灣的新聞傳播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這一個方向可以追溯至美國的反越戰興起與新新聞的崛起。

一九六〇年代的越戰，在美國本土引起支持與反對這種正反兩極的勢力對決，不少青年因為不願參戰，乃投入反戰的行列，利用發行刊物宣揚反戰理念，這些刊物因其立場鮮明，在反戰的行列中的確造成風行，這也開啟了美國新聞史上的「地下刊物」時期。²⁷不過，這一個階段刊物的發表人，由於多未接受專業的新聞寫作訓練，純為抒發情緒所為的作品，因此，在寫作方式上也就有別於正規的新聞寫作。這樣的情況，與我國報導文學最初的情形十分類似，未受限在一定的框架之中，反而有著不同的表達方式。

²⁷ 詳見彭家發、馮建三、蘇蘅、金溥聰編著《新聞學》，台北：國立空中大學印行，1998年9月，頁501。

傳播媒體的求新求變，不只在傳播的方式上，在寫作手法亦然，透過地下刊物的發行後，讓傳統的新聞報導有了不同的發展方向，漸漸在版面上有了新的題材，不再侷限於固定模式的新聞報導，也就出現所謂的「非虛構（nonfiction）小說」，²⁸這類題材的作品，在細節的描寫上較一般新聞來的細膩，在剖析事件的角度上，也會比新聞寫作有更大的發揮空間，此種形式的小說，如果能夠忠於事實不再加油添醋，也可以算是新聞報導的延伸，當然，這類文體由於寫作手法並不受限於刻板的新聞寫作模式，也較為大眾所接受。

在非虛構小說興起之後，國內的新聞學者在報刊上針對此類文體做了大幅的介紹，並稱之為「新新聞學」。²⁹「新新聞學」這個名詞被徐佳士教授批評其譯名不妥，他認為應稱為「新的新聞寫作或報導方式」，或者簡稱為「新新聞」³⁰。徐教授的意見的確為此一新的名詞下了相當精闢的註腳，也經由這個新的新聞寫作方式，可以嗅出報導文學在新聞寫作中的味道，也可以看出報導文學發展的雛型。

報導文學的歷史淵源可以上溯至詩經，但從新聞學的角度探究，或可從新聞的演進歷程一窺究竟。荊溪人先生在「泛論「報導文學」」一文中將新聞報導分為五類，首先是「新聞報導」（News Reporting），也就是傳統的新聞寫作型態，是一種最原始的寫作方式，僅限於記者採訪所見聞；其二是「綜合報導」（Collective Reporting），這類報導指的是將相類似的新聞，予以改寫，進而成為一則內容充實且易於讀者閱讀的報導；其三是「解釋報導」（Interpretative Reporting），此類報導係以分析背景為主，以詳盡的背景介紹充填新聞內容，盛行於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其四是「深入報導」（Depth Reporting），此類報導的崛起成因在於傳播媒體的

²⁸ 「非虛構小說」係指以現實為素材，利用長篇小說的形式描寫現實事件，如小說家卡波提（Truman Capote）所著《冷血》（In Cold Blood），內容描述堪薩斯富豪一家四口慘遭謀殺的滅門血案。

²⁹ 同前註 27，頁 502。

³⁰ 詳見陳銘礪編《現實的探索》，收錄高信疆著「永恆與博大」，台北：東大圖書，1980年出版，頁 45。

競爭，為爭取更多的閱聽人青睞，因此衍生出針對新聞事件做更深入的探索，以期能夠開拓更大的閱聽族群；最後則是「調查報導」（Investigative Reporting），這類的報導方式往往比深入報導更著重於內幕的追蹤，但也可能因為過於盲目追求內幕，而引起不必要的糾紛，甚至違害人權。³¹

從「解釋報導」必須詳盡搜集資料，再進行分析與判斷，到「深入報導」中強調內容的深入探訪與與分析，同時兼顧新聞的自律性原則，不做揭瘡疤式的無謂報導，這是新聞寫作最理想的表現方式，反映在報導文學作品上，也可以發現報導文學所要求的原則正與之相吻合。報導文學的寫作方式由於並不受到刻板新聞寫作的限制，因此在形式上有著更多元的書寫型態，這也比較貼近所謂的新新聞寫作。

報導文學向新聞界借火的不只是寫作的題材與資料的搜尋，還要加上「社會責任」與「讀者的認同」等特點。新聞報導反映社會事件，背後的意義也在於肩負著棄惡揚善的社會責任，報導文學亦然，在選材上不僅切合社會脈動，適時反應不同的聲音與意見，甚至對未臻完善的新聞事件做更進一步的剖析，並且經由作品的呈現得到讀者的認同，進而達到社會責任的使命感，如此報導文學的新聞功能性也才算有所發揮，也才能將其視為新聞的延伸。

雖然，報導文學向新聞借火的情形不可否認，但另一個思考的層面在於「新新聞」的寫作方式，由於它擺脫傳統新聞寫作的束縛，所以引發外界的質疑。一九九三年，香港自由黨主席李鵬飛公開指責香港中文大學新聞暨傳播系及浸信會書院傳理系，將「新新聞主義」這種「用小說情節取代新聞的報導」灌輸給學生是不妥的。隨後任教於中文大學的李少南博士發表「新新聞」不是小說，以正視聽，其後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彭家發教授亦發表「要正確認識「新新聞」」加以聲援。³²引發不同論點的爭

³¹ 有關新聞報導的分類，請參見陳銘礪編《現實的探索》，收錄荊溪人所著「泛論「報導文學」」，台北：東大圖書，1980年出版，頁7-13。

³² 詳見彭家發、馮建三、蘇蘅、金溥聰編著，《新聞學》，台北：國立空中大

議，在於對「新新聞」的認識有限，如果在新聞寫作的真實原則下運用生動的筆法加以敘述，「新新聞」的寫作方式仍有存在的必要性。

事實上，台灣的報導文學深受美國「新新聞」的影響，在寫作的方式與取材上都有不同於傳統新聞寫作的表現。新聞寫作要求記者必須做一個忠實的記錄者，對事實的陳述要有客觀的層次，不可涉入主觀的意識型態，這也就成為新聞學上對報導絕對要求客觀的原則。到了所謂「解釋報導」的時期，由於側重於背景資料的搜集、整理與分析，透過這樣的型態讓新聞事件可以觸類旁通，也使得主觀的意識放大了，再加上功能性的描寫增強，感性也加多，在空間上也有了更大的佈局，文學的功能在此得到發揮的空間。³³

雖然，「解釋報導」為報導文學開啟了一扇新頁，但真正影響所及，還是在於「深度報導」的理論。解釋報導對新聞事件的闡述，已較傳統新聞單調內容為之提升，但因其僅將著眼點放在加重事件的背景描述，藉以達到提高讀者的興趣，在深度與廣度上仍有不足之處。「深度報導」的長處在於網羅了新聞報導與解釋報導的優點，並且吻合了新聞的客觀與真實的原則，並且不違背社會責任和道德標準的條件下，堪稱為近年來新聞寫作中最完美的報導方式。³⁴深入報導的特質在於直指問題的核心，並考慮到讀者所關心的層面，讓記者在發掘問題的同時，也能培養本身對事物的多重視角。在深入報導這些特點下，更可以發現報導文學的形象隱含其中。

繼「深度報導」之後，又有了所謂「調查報導」的興起，這是由美聯社首倡其義的。³⁵雖然調查報導的興起最晚，但對新聞界的影響卻是最大的，以現今的媒體而言，為了爭取閱聽人的注意，紛紛使出渾身解數對新聞事件做了更深入的調查與採訪，調查報導嚴格說來可以將其視為深度報

學印行，1998年9月，頁505。

³³ 詳見陳銘礪編《現實的探索》，收錄高信疆著 永恆與博大，台北：東大圖書，1980年出版，頁44。

³⁴ 同前註，前揭書，頁12。

³⁵ 同前註，頁45。

導的一支，但它卻更具主動性與積極性，也更有計劃與目的，因此調查報導的性質與報導文學其實已是十分相近了。惟調查採訪在寫作的手法上較具批判性與攻擊性，所以稍有不慎即可能對新聞事件中的人物產生傷害。以現階段台灣的「吳舜文新聞獎」與「曾虛白先生新聞獎」中的獎項，亦不乏以調查報導得獎的例子。³⁶

調查報導在新聞界所造成的旋風，讓諸多媒體投身於其中，不只是平面媒體，不少電子媒體也陸續在新聞時段中推出所謂的調查與關懷報導系列。³⁷但是，另有許多不肖媒體假調查採訪之名，行揭人隱私與瘡疤之實，造成當事人的困擾，也讓調查報導蒙上了不白之冤，這對新聞界所造成的衝擊是相當大的。³⁸報導文學固然在性質上與調查報導十分接近，但仍應避免淪入惡質的報導方式。

「新新聞學」的寫作手法並不受限在傳統新聞寫作，它採用了不同的形式展現，包含了第三人稱的敘述、時空跳接的蒙太奇手法以及對人、事、物的細部描寫等，它的文學屬性其實應該是凌駕於新聞性之上的。台灣的報導文學在發展的過程中，藉由報刊的推動蔚為風潮，但探究其寫作的原理與新聞報導的演進過程，二者間的關係仍是互相牽動的。

報導文學與新聞學的淵源不只在於寫作的型態上，在傳播的過程中報刊也成為不可或缺的媒介，但是透過副刊所形成的文學傳播現象，在五十年代是沒有伸展空間的，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政府對媒介言論出版自由百般設限，因此造成了當時文學傳播現象的荒蕪，葉石濤曾如此形容：

五 年 代 的 文 學 ， 幾 乎 由 大 陸 來 台 第 一 代 作 家 所 把 持 他 們 的 文

³⁶ 以「找回河川之愛系列」榮獲第二十二屆「曾虛白先生新聞獎」公共服務獎項的《中國時報》為例，報導內容也是歷經多番的調查採訪始得。

³⁷ 如 TVBS-N 於 2001 年所推出的「大河戀」系列單元、SETN 於 2003 年推出「愛在福爾摩沙」單元等。

³⁸ 如《壹周刊》部份內容針對特定對象（政治人物或影視名人）做了報導，對當事人造成許多不必要的困擾。

學來自（國破家亡的）憤怒和仇恨，所以五十年代文學所開的花朵是白色而荒涼的；缺乏批判性和雄厚的人道主義關懷，使得他們的文學墮為政府的附庸，最後導致這些反共文學變成令人生厭的、劃一思想的，口號八股文學。³⁹

葉石濤所述，不單是反應當代的文學現象，也可以看出當時的副刊型態必須因應政府政策所需，在作品的風格上沒有自己的特色，反而容易淪為政府的傳聲筒。

六年代的台灣報紙副刊仍然無法擺脫政治霸權，不過，許多文學創作已轉向文學雜誌，如一九六〇年創刊的《現代文學》、一九六一年創刊的《藍星》詩刊、一九六四年創刊的《台灣文藝》、《笠》詩刊，以及一九六六年創刊的《文學季刊》與一九六七年所創刊的《純文學》等，這也讓台灣的報導文學在五、六年代呈現出一段空窗時期。六年的文學傳播已由傳統的報紙副刊轉向文學性雜誌，這對七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以及文學風格的丕變，都有相當的影響力，聯合報主筆蔡詩萍對此現象有如此描述：

在六年代，整個副刊學的支配型典範，仍以官方的文藝政策居優勢，但反支配的理論卻悄悄各自築起障地，除《現代文學》獨領風騷外一九六四年創刊的《台灣文藝》和《笠》詩刊，以及一九六六年十月創刊的《文學季刊》都隱然埋下日後文學論戰和文學抗爭的歷史引線。⁴⁰

台灣的報導文學在七年代藉由報紙副刊的強勢運作下，開啟了輝煌

³⁹ 見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96年5月，頁88。

⁴⁰ 見林耀德、孟樊編《世紀末偏航 - 八十年台灣文學論》，收錄蔡詩萍著《一個反支配論述的形成》，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0年12月，頁462。

的時期，文學傳播功能背後所隱含的意義在於政治環境的改變與社會經濟大幅改善，這也顯出社會日趨多元的現象。《中國時報》推出「現實的邊緣」專欄後，顛覆了傳統文學副刊的刻板形象，它採用了一種既文藝又新聞的寫作風格出現，在當時的確令人耳目一新。⁴¹

副刊既為大眾傳播媒介，在理論上也就必須遵守新聞學上的守則，尤以「守門人」(gate keeper)理論為要。⁴²雖然報紙副刊走出舊式的文藝格局之後，逐漸邁向了文化的天地，但是它所肩負的社會責任仍不可輕忽，這也正是「守門人」的原則。報導文學依循著新聞寫作的概念與模式，在取材上也遵守的不逾矩的守門標準，這樣的認知讓台灣的報導文學創作者在書寫的過程裡以及取材上，並非「為所可為」，而是能夠符合編輯取向與讀者知的需要，且更能掌握社會的脈動與兼顧社會責任。

二、報導文學的新聞定位

報導文學該如何界定其新聞定位？或者可以說報導文學是新聞深度報導的再延伸。

從《人間副刊》的編輯取向來看，它將「計劃編輯」的功能發揮的淋漓盡致，同時運用「議題設定」的模式開闢專欄，讓版面上有了新的視覺觀感。⁴³報導文學的走向即是受到如此編輯方向所影響，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報導文學創作者在選材上，早已預先設定某一議題，然後再深入探討分析與撰寫。從作品構思到成品出爐，在在都有著新聞報導的影子（主題的選擇、構思、採訪、分析、歸納、撰寫），最重要的是在採訪的步驟中，

⁴¹ 高信疆自言所謂副刊的刻板印象是「既與新聞無關，又與人生無涉，更談不上激動人心、傳承歷史、創造文化等等的題旨」。引自《愛書人雜誌》，一個概念（副刊編輯）的兩面觀，1979年12月1日。

⁴² 「守門人」理論指的是「誰最有權力控制新聞？」這個最具主控權的人員，必須在選擇稿件時，做出適當且具有可讀性的判斷，尤如足球場上的守門人一樣。

⁴³ 參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文學與傳播的關係》，收錄向陽所著「副刊學的理論建構基礎」，台北：臺灣學生書局印行，1995年6月，頁208。

必須經過嚴格的過濾與考證，然後才能進行分析歸納的工作，這些都是「深度報導」的基本條件。

但是，在完成選材、構思、採訪、分析與歸納等步驟後，撰寫的手法就必須有所區隔了，報導文學的寫作手法比新聞報導的寫作方式加入更多的感性與主觀看法的敘述，所以它會比深度報導更具吸引力，也更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其中還有一項重要的因素，是報導文學沒有新聞報導的時效性限制，所以會有較充裕的時間發掘更令人動容的內幕。

報導文學可以修正新聞報導的時效性。它希望透過文學，使作品不僅存在於短暫的新聞中，也具有不因時間流逝而喪失藝術性的永恆價值。因此，他們本身雖然採用新聞寫作的方式，但仍強調選擇、剪裁尤其強調文藝的手法。⁴⁴「新聞報導與寫作強調時效性，在分秒必爭的快速原則下，新聞報導所傳遞的訊息僅是單一事件的陳述，對許多問題的深入探索，往往需要更多的時間加以歸納與分析，尤其在重大新聞事件或具爭議性的話題上，更是如此。為了讓新聞事件能夠以較完整且多元的面貌呈現，並且不再時效性的框架上設限，報導文學的存在與價值就可以彰顯出來了。

雖然，報導文學雖然可以適時修正新聞報導的時效性，同時將新聞事件做深度的剖析與探索，但並非適用於所有新聞事件，這便關係到「選材」的問題了。所謂的「選材」，重在其事件內容是否具有社會公益性質或其是否具有社會責任意識，並非對記者採訪所得照單全收，如此觀念也正是符合《詩經》中「采詩」與「獻詩」的基本要件，是否具有可讀性；而此一觀念也正印證了新聞衡量的客觀標準所要求的「顯著性」與「重要性」。

⁴⁵

經過這些程序後所產生的作品，還必須要能夠以一種優美的筆法敘

⁴⁴ 鄭明嫻 新新聞與現代散文的交軌，收入《現代散文現象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10月，頁139。

⁴⁵ 參考自詳見彭家發、馮建三、蘇蘅、金溥聰編著《新聞學》，台北：國立空中大學印行，1998年9月，頁478。「顯著性」與「重要性」指的是新聞的衝擊力，是否具有涉及廣度和連帶影響的層面。

述，用一種文學的手法寫作，以此為基調才能寫成一篇良好的報導文學作品，也才能夠吸引讀者的目光，這樣的表現方式也可是一種「讀者導向理論」，因為創作者要考慮的不只是個人的感受層面，還要融入社會大眾所關心的角度與關注的焦點。誠如周行在《新形式 - 報告文學的問題》一文中所述：

為了結果真真能盡一種巨大的作用，在許多個別的事實中報告那一些，這就需要選擇，在同一事件中報告那幾點而把其他那幾點放棄，這也需要剪裁，同時更重要的，怎樣把選定的材料生動逼真地報告出來，則也需要以文藝的（形象化的）手法去寫作。不如此，則寫作結果依然只是一篇紀事新聞，而不是一篇感動人的報告文學作品。由此可見，報告文學不僅要正確的記錄，報告事實，而且還要文藝地去報告它。⁴⁶

周行的見解，清楚說明了報導文學與新聞學間的相關性，也再次闡明了前述選材與寫作的方向和重要性，這對報導文學的創作者而言，是一個寫作方向的指引，也是對報導文學的新聞定位做了一個說明。

報導文學雖然被視為深度報導的再延伸，但對部份傳播學者來說，報導文學在新聞學上的身份仍處於一種妾身未明的狀態。以南華大學傳播管理學系為例，其中所開設兩門「報導文學」的課程，內容都在放在報刊的編輯與新聞寫作的方向，這種將報導文學視為新聞編採的課程安排，其實是抹煞了報導文學所蘊含的深層意義，也未能透過報導文學的生命意涵讓學習者用心體會新聞事件、重新認識新聞，是為一大缺憾。

倘若，傳播學界能夠運用觀察新聞的犀利眼光，再輔以文學感性優美的筆調寫作，那麼，報導文學將不再是紙上談兵，而是一種可以真正落實

⁴⁶ 見《中國現代散文理論》所收錄之周行，《新形式 - 報告文學的問題》，台北：蘭亭書店，1986年10月，頁274、275。

於新聞學的寫作方式，報導文學的新聞定位才能夠突顯出來；透過報導文學的寫作與觀察分析模式，是可以讓新聞人以全新的角度解析新聞，讓讀者也能重新看待新聞，讓新聞傳播的過程不再只是冰冷僵化的制式風格，而能夠重新展現全新風貌，開啟另一種「新新聞」的表現。

第三節 報導文學的文學定位

文學的定義泛指廣義的學問與學術，這包含了一般著作與文學作品，⁴⁷隨著時代的變遷，文學樣式亦有所不同，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等都是因應著不同時空背景下的文學產物，報導文學的產生也有著獨特的時空因素。由於報導文學的新聞性與文學性兼容，其所具有的文學性特徵與文學定位則是值得探討的重點。

一、 報導文學的文學特徵

報導文學被視為一種「介於新聞報導與文學作品之間」的特殊文學體裁，在新聞與文學的爭議中，報導文學之所以謂之文學，也就在於其文學性的功能，因此，在探討報導文學的文學定位之前，不妨先對其文學性做一釐析。

做為一種文學樣式，報導文學與小說、詩歌等終究是有所不同，它特別具有了切合社會脈動與貼近讀者閱讀需求的功能性，雖然在其寫作的思維模式曾向小說甚或詩歌借火，但這種社會的功能性卻非其他文類所能比擬的。對社會與人生進行真實的描寫，是報導文學與小說、詩歌等文學形式一種本質上的區別，而這種區別也就成為報導文學的特點，這也讓報導文學在文學特徵上展露了其「真實性」的獨到之處。

文學性其實是一個較為模糊難解的觀念，但總體而言，報導文學作者在創作時被要求應具有豐厚的文學素養，而所謂的文學素養則來自於對題材的認知與情感的描摹如何以藝術的手法投注於作品之中。對此觀念，學者丁曉原曾說明：「報告文學作者在創作時應有自覺的形象化意識、注情意識與藝術借鑒的意識」。⁴⁸雖然報導文學的真實性原則制約了文學的藝術性，但其二者卻又是兼容並蓄的，一般認為若僅強調真實與準確性，可

⁴⁷ 張健，《文學概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年12月。

⁴⁸ 見丁曉原著《20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理論批評史》，安徽大學出版社，1999年

以由新聞報導觀之即可，相對地，如果單一強化文學的藝術，那在小說或詩歌中將會發現更多精彩的作品，因此，報導文學的真實性其實也正是其文學藝術性中相當重要的特質。至於其二者間的關係，李炳銀下了很好的註解：

報告文學藝術化的過程和目的，實際上就是使真實更充份地顯現出來並說明更多的問題。在這理，真實本身就是藝術性的基礎和終點，是文學藝術性最重要的支點。⁴⁹

報導文學除了真實的藝術外，還有一個值得觀察的重點，就是大陸學者丁曉原所提出的「形象化意識」。形象化可說是文學的基本特徵與要求，因此，報導文學作者在描寫時往往要求與其他文類同樣具有形象化。形象化的建立來自於如何在選定的材料中加以歸納分析，進行一種生動活潑的書寫，再加以適度的裁剪，而以文藝的手法呈現。為了完整且突顯作品的形象，有研究者主張應該拋棄早期作品中那種簡單敘事的做法，反而應以表現人物的活動做為作品的主體。丁氏認為「寫作時應該要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人物活動的場景與氛圍」，也就是報導文學若要具有鮮明的形象性，作者就必須通過「活的內容」的敘寫，真實而活潑地表現出對象的性格。

⁵⁰

丁曉原所強調的形象化意識或有其可取之處，但其所述「應拋棄早期簡單敘事寫法，轉而著重於人物活動的場景與氛圍」，此一論點則有商榷的空間；不少人會因為形象化的問題而將人物的刻劃加以放大，文學作品的描寫和人物形象的刻畫，本非題外之意，但若僅依形象化觀點而將對其

12月，頁30。

⁴⁹ 見李炳銀著《當代報告文學流變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頁24。

⁵⁰ 同註46。

視為絕對化，並據此對作品做出評估，恐怕有失公允。對小說而言，人物形象的描寫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詩歌與散文則非如此，它們的藝術表現方式並非完全取決於人物的典型，報告文學亦然。報導文學本身所擁有的特殊性，不能用人物描寫狀況來判斷它的藝術成就。不過丁氏在後來的論述中將形象化的問題切入篇章佈局的安排，倒是讓人物刻劃的重要性比例降低不少，也才回歸到以報導文學作品為主體的原則。

報導文學是一種開放性的文學體式，正因其特有的開放性融和了不同文學體式的特點，諸如具備了小說所具有的特點（人物刻劃、環境描寫）或是詩歌當中常見的蒙太奇跳接手法等，這樣的開放特點讓作品顯現出較大的靈活性。不過，除去了人物的描繪與環境的敘述外，報導文學還特別注意到了細節的運用；細節的運用在於如何能更貼近閱讀者，同時也關係到篇章結構的安排，所以在整體來看，如何能夠以具體的技巧與寫作手法創作，對報導文學作品應該是有正面的加分效果。

報導文學的目的，最終不是要去創建一座藝術的宮殿，而是要以文學的手段參與社會人生的鬥爭，促進社會人生的進步與改觀。⁵¹

大陸學者李炳銀做了如此的闡述。事實上，對報導文學文學性的認知與瞭解應該跳脫舊有的窠臼，除了形象、結構與細節外，還應該有更寬廣的角度來解析，這便要從報導文學的開放性來探討，何其芳在《報告文學縱橫談》中指出：

寫作品，不是不需要匠心，不是不可以講求技巧。但這一切都應服

⁵¹ 見李炳銀著《當代報告文學流變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頁 30。

從這樣一個原則：能使越多的讀者接受、理解、感動就越好。⁵²

何其芳的論點是對報導文學的文學特質開啟了一個更包容的心態，正由於此種以讀者閱讀需求為出發點的思維，才能讓報導文學在強調文學性特質時，有了更人性化的柔性主張，也讓報導文學不拘泥於傳統文學觀念，而有更宏觀的面向。

寫實風格是報導文學不容忽視的特點，它貼近社會的脈動，反映了現實的狀況，因此在描寫的過程中特別強調了真實性，但在敘寫的語言應用上，由於考慮到讀者的接收層面，所以力求簡潔生動，迴避了花俏誇張的筆調。報導文學所依據的是對事件確實而正確的描述，作品呈現出的是對描寫對象清楚的認知，但絕非憑藉作者本身的語言文字去修飾或主導描寫對象的一切，更不能利用作者主觀的認定而讓事實有所偏頗，進而影響讀者對事實真相的正確認識。當然，在報導文學的創作過程中會有多元的角度與對象，作者本身可以找尋一種最適合自己的寫作方式，並讓讀者易於接受，但所有的論述都必須建構在真實的基礎之上。

對事物作一種直接的評論，是報導文學的另一項文體特徵。報導文學反映了社會現況，但在另一個角度看來，它是具有絕對的批判性的，批判性與真實性正是報導文學的美感特質。李廣田在《談報告文學》中引用了巴克的一段言論：

在小說裡，人生是反映在人物（主角）的意識上。在報告文學裡，人生卻反映在報告者的意識上。小說有它自己的主要線索 - 它的主角們的生活。而報告文學的主要線索，就是主題本身。⁵³

⁵² 同上註，頁 27。

⁵³ 參見丁曉原著《20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理論批評史》，安徽大學出版社，1999

這個觀點對照報導文學的選材角度以及作者本身對事件的認知程度，是可以被接受的，因為，報導文學的主要元素在於事件的主體，以及作者的書寫手法與技巧，透過完整的表達才能讓報導文學的中心思想能夠逐一勾勒於作品之中。

報導文學的文體特徵總括來說，不脫現實性、真實性與文學性，或者可以用「真、善、美」三個字來形容，真即為真實性；善則是作品的社會責任與傳播效果；美就是筆調的運用以及寫作的技巧。探究報導文學的文學性時，我們或許可以嘗試用一種比較新穎的觀念看待，畢竟它與傳統的文學觀念所能理解的文學藝術性，還是有所差異的。報導文學因其真實性原則而使它與其它文體有明顯的區別，真實性促使了報導文學建立了屬於自己的文體特徵。在另一個層面上，作家對生活觀察的敏銳度、對事件認知的公正性以及寫作時情感的拿捏，在在都左右了報導文學作品中文學性的層次與深度。

二、 報導文學的文學定位

報導文學的特殊寫作方式，有別於傳統的記敘散文，在層次上是比較接近「新聞文學」的。所謂的「新聞文學」依據樓榕嬌所述，應為「研究我國由新聞體制的創立、演變、進化，而有各種不同類型的大眾傳播工具，所產生的一門新的文學」。⁵⁴但筆者以為新聞文學應該泛指一切研究應用於新聞文體的一種文學。胡適曾說：「文學是表達情意的工具，表得好，達的好，就是文學。」由胡適的說法加以對照，能夠將新聞文體以一種優美又完整的表達形式呈現，就可以算是好的新聞文學。

新聞文學與一般的文學究竟有何差別？何以新聞文學與報導文學的性質較為相近？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觀點。

年 12 月，頁 73、74。

⁵⁴ 見樓榕嬌編著 黃天鵬校訂《新聞文學概論》，臺灣學生書局印行，1979 年，頁 1。

或許有人會認為新聞文學與新聞寫作是同義複詞，但嚴格來說，新聞寫作僅可算是新聞文學中的一小部份，它只是新聞文體的一種形式，新聞文學包含了新聞寫作，但新聞寫作卻不能概括所有的新聞文學，畢竟新聞文學所涵蓋的層面遍及所有的新聞文體(包括因應不同傳播媒體的不同新聞屬性而衍生出的各類文體)。新聞文學的發展，是伴隨著傳播環境更替而產生變動的，從最初的報紙、廣播，進一步到電視，一直到現階段網路的普及，新聞文學自有其演進的歷程與管道。

一般而言，文學所注重的價值在於其內涵與辭藻的修飾，而新聞文學則是強調時效性。鄭明嫻在《散文修辭論》一文中，開宗明義提出：

文學作品都需要修辭，不獨散文然。因為修辭使文學語言能卓然獨立迥異於其他學科的書面文字。修辭是文學構成的基本元素，是產生文學趣味的根本。⁵⁵

一篇好的文章，並非取決於其時效性，而是重在寫作的技巧與表現的形式；但相對地，一則好新聞首重時間的掌握，其次才是寫作的流暢與否，若忽略了對即時性原則的基本要求，那新聞也不足以為新聞了。

其次，從文學的技巧與內涵來看，一般文學的寫作技巧與內涵，是多方面呈現的，可以從多種角度觀之，不論是文字語言的應用和篇章布局的鋪陳等等；但是新聞文學則是以可讀性為寫作取向，所謂的可讀性著重在如何吸引讀者，進而成為閱讀的焦點，為了因應所謂可讀性，新聞文學也就轉而走向一種比較具通俗性與趣味性的選材方向，相對地，在文字的應用與書寫的過程，也就缺少了一份傳統文學的美感；反觀一般文學，可讀性並非創作的原動力，它所強調的是文字的運用技巧，以及內容的深度，因此在走向上也顯得比較嚴謹與僵化。

⁵⁵ 見鄭明嫻，《現代散文構成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00年4月，頁1。

新聞文學由於內容包羅萬象，再加上它的通俗與趣味，所以能吸引的讀者群是多層次的，但一般文學作品，因其嚴謹的態度也讓讀者群產生若干的區隔性，因此與新聞文學的大眾化對比，一般文學則顯得較具有分眾的特質。⁵⁶新聞文學與一般文學在某部份還是有相通之處，選材的多樣性與通俗性已是一般文學發展的新趨勢。取材的對象不限於特定人、事、物，逐漸將日常生活的各類題材運用於作品，是現階段文學的取材走向，再則是通俗性，為了讓文學的因子能夠散播於各個層面，文學創作已經不再刻意於文字上做雕琢，在語言的應用上也力求流暢與淺顯易懂，避免使用過多冗長的文句或段落。經過新聞文學與一般文學的異同探討，不難發現在二者之間，隱含了報導文學的影子。

報導文學之所以趨近於新聞文學，首先在於其發表的園地多為大眾傳播媒體，應用於樓榕嬌的定義，報導文學或可歸納為廣義的新聞文學之中。另外，報導文學向新聞借火的情況不減，還加上其中所獨具的新聞性，總的來說，藉由報刊發跡的報導文學，所依附的不只是報刊的發表舞台，還有新聞事件的啟迪，因此，報導文學雖然為一獨立的文學體式，但性質上仍是無法全然擺脫「新聞文學」的範疇。

台灣的報導文學被視為缺乏相關文學理論的依據，大部份都只偏重於感性的描寫，高信疆在《試探：問題與可能》中提到：

今天的報導文學不但沒有它足可依恃的理論，也缺乏相關的方法研究。而史學研究法、社會學研究法、人類學的田野調查 都可以補充它的不足並有所發揮。⁵⁷

⁵⁶ 文學的分眾特質，反應在讀者群上的區隔，以小說與詩歌為例，小說的讀者未必能接受詩歌，同樣地，喜愛詩歌的讀者亦未必能欣賞小說。不同類型所產生的基本讀者群，是有其固定的閱讀習慣。

⁵⁷ 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印《文藝座談實錄》，收錄高信疆《試探：問題與可能》，1983年2月。

事實上，過份依循理論的基礎反而容易讓作品受到限制，向陽、須文蔚主編的《報導文學讀本》，在導論中首先提出了所謂的「鬆綁理論」，這個論點下所強調的報導文學不像純淨新聞寫作具有一定的形式，如果有必要，「新聞寫作」的常見框框應當可以打破。也就是在敘事的手法上，採用小說的書寫模式，把事實穿插連貫起來，進行情節的鋪陳，應是一種可行的手法。⁵⁸這個說法不僅可以對應高信疆前述的論點，對照於筆者前二節所提出報導文學的敘事藝術中，應包含「越界的思維」，更可以顯現出報導文學並非毫無理論基礎，而是應該以更多元的視角看待其書寫的模式。

林耀德曾經提出報導文學是「夾雜報導的文學」或「夾雜文學的報導」以及「就方法論而言，在同一文學體裁中報導語言和文學語言之間的結合顯然是一大難題」的質疑。⁵⁹這個部份或許可以從文學語言的角度來解析。新聞寫作所要求的語言重在精簡與確實，在修辭的成份上則不刻意作特殊程度的規範；相對的，文學寫作的語言則比較重視辭藻的優美與文句的協調，在修辭的層面更是不容忽視。不少文學的作品中可以看見新聞語言的應用模式，反觀新聞寫作就比較少見文學的書寫方式，因此歸究林耀德所說「夾雜報導的文學」或「夾雜文學的報導」，或許可以針對寫作的技巧再做加強，誠如鄭明嫻所云「要調和報導與文學，應該在新聞寫作上加強」。⁶⁰

報導文學是一種極為年輕的散文類型，它的來源甚廣，但不脫新聞寫作與文學寫作二者結合的方式，在主客觀間徘徊、在虛實間遊走；它也與一般的散文相同，均以真實為其基礎，不過一般的散文的個人色彩濃厚，報導文學雖然是散文特殊結構的類型，卻不能走向個人化或以自我為中心

⁵⁸ 詳見向陽、須文蔚主編《台灣現代文學教程 報導文學讀本》，台北：二魚文化，2002年8月，頁37。

⁵⁹ 見林耀德，〈臺灣報導文學的成長與危機〉，載於《文訊》雜誌第29期，1987年4月。

⁶⁰ 詳見鄭明嫻，《現代散文現象論》，收錄《新新聞與現代散文的交軌》，台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10月，頁153、154。

的散文型態中。⁶¹如何能夠在新聞與文學中取得平衡，應該是對新聞寫作的原理以及文學創作的基礎都有深厚的瞭解，才能運籌帷幄，適度的將二者結合運用。

報導文學在結構上是需要適當地裁剪的，並在其中運用修辭的技巧，才能讓作品顯出層次，但這些都不能違背真實的原則，為了避免淪為客觀的新聞報導，作品中還要適度加進作者主觀的評論，藉以反映社會的脈動，報導文學既為一個整體，就應該要從不同的角度、事件與人物中，為整個生活的變動呈現。這正符合胡適所謂「真正的文學」乃是「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⁶²。

綜合了「文學的真實」與「歷史的真實」的報導文學，⁶³並不會因為文學語言的傳遞方式而失去閱讀價值，相對的，正因其具有超越時空與擺脫歷史包袱的制約的特性，在取材上顯得較為開闊與寬廣，不會因為時效性不足而有所影響。這個被鄭明嫻比喻為「介於新聞報導與散文的次文類」，⁶⁴吸收了文學的因子，而成為一種新的文學藝術，在傳統的記敘散文與感性散文中，開闢出了一條新的道路，讓文學發展的過程中開啟了新的局面，進而推動報導文學走向文學，走向藝術的精緻化路線。

⁶¹ 同上註，頁 155。

⁶² 樓榕嬌編著、黃天鵬校訂《新聞文學概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9年9月，頁 184。

⁶³ 語出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10月，頁 254。「文學的真實」指的是透過報告者的心靈提出的詮釋與批判所構成的價值體系；「歷史的真實」所指的是報告者所掌握的資料與個人體驗的真實性。因為報導文學的本質必須兼容二者，失去「文學的真實」，便會淪為純粹的報導；失去「歷史的真實」，則缺乏客觀的特性。

⁶⁴ 參見鄭明嫻，《現代散文構成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00年4月，頁 1。

第四章 報導文學的分期

《文心雕龍·時序篇》云：「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劉勰清楚點明了文學思潮與文學風氣都會隨著社會變遷而深受影響，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孕育出不同文學作品的類型，唐詩、宋詞、元曲，在不同的時代，也產生了屬於當代的文學體式。報導文學的興起與時代背景有著密切的關係，正如劉勰所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不同時期的環境因素影響作品的發展方向與型態，報導文學亦然。

報導文學由來已久，在其發展的歷程中與社會、政治與經濟環境都有相當程度的關連。有關台灣報導文學的發展歷史分期，論述者並不多見，本章擬從歷史觀點，依據台灣的社會政經狀況，並配合台灣文學史加以考察，分期論述。

陳芳明在《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中提出：

從後殖民史觀的立場，將台灣新文學史分成日據的殖民時期，戰後的再殖民時期與解嚴迄今的後殖民時期。¹

本章之分期標準，係根據陳先生所提論點為基礎，加以歸納分為日治時代、光復以後及解嚴之後三個不同的時期。²透過不同階段的政治變動，探

¹ 詳見《聯合文學》，15卷10期，1999年8月，頁162至179。

² 有關台灣文學之分期標準，各有不同論點與分界意義。葉石濤在《台灣文學史綱》書中，將台灣新文學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搖籃期、二是成熟期、三是戰爭期。葉先生之分期標準在年代上並未有明確的分野，因此本章在論述過程中，並未採用該分期標準。陳芳明先生所提之台灣新文學史分期，雖然仍有疑義，但筆者在此借用了陳先生之分期理念，依台灣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對

究時代對文學所產生的影響，並釐析報導文學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中，所具有的特性與魅力。

第一節 日治時代之報導文學

馬關條約對台灣的社會結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報刊的發展狀況也是其中之一。傳播媒體一直是報導文學所依附的主要對象，因此本節之探討重點在於報紙的演進過程與報導文學間的關係。以民國建立為界，分民國以前與民國建立至台灣光復兩階段論述。

一、民國以前的報導文學

在傳播學的領域中，最原始的傳播方式即是口頭的訊息傳遞，也就是現在所謂的口語傳播，這樣的傳播方式完全取決於上古時代的文字記載未臻完善，一直到了文字、紙張、印刷等傳播工具發明以後，傳播的方式才從口語轉變成文字記載，也才具備「報導」的特性。

報導文學在二十世紀的崛起與時代背景息息相關，不僅因社會的動盪變遷，更重要的是適逢新聞事業的發展，造就了報導文學的興起。我國的報紙始肇於漢代，最早的是官方的《邸報》，內容全為記錄宮中帝王的生活與政府事務。³到了唐代則有《開元雜報》，這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印刷的報紙，內容不脫官方文告以及政府詔書等等。到了宋代，逐漸有了非

社會所產生的影響為分界點。因此，將本章分為日治時代、光復後至解嚴前、解嚴之後等三個階段。

如此分期方式，乃是將報導文學視為一種具時代意義的特殊文類，經由不同時期的社會狀況來回顧報導文學的發展歷程。

³ 見陳銘礪編《現實的探索》，收錄荊溪人，泛論「報導文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0年出版，頁3。

官方的報紙出版，也是當時較為市井小民接受的小報，內容記錄已日漸擺脫官方一言堂的模式。至此，傳播的功能才日趨完善。

中國報紙事業一直到了清咸豐年以後，才粗具現代化的色彩，一方面是印刷事業日漸發達，另一方面也是接收外來文化影響所致。一八五八年，由伍廷芳和英國人所合辦的第一張華文報紙《中外新報》，在香港創刊出版，為現代報業的發展開啟了序幕。其後史良才與英商在一八七二年於上海創辦《申報》，報業的發展走向多元化的競爭局面。不過，清末民初的文學思潮仍處於新舊交替之時，在語言文字的使用上雖然有著文言與白話夾雜的情形，但記事部份仍以通俗白話居多，報章上所記載的「報導文學」也多半以記錄當時之社會現況為主，所謂的「報導文學」才略具雛型。

戊戌政變後，《中外日報》在一九八九年八月曾發表一篇 康有為到吳淞 的報導，被稱做當時報導文學的代表作品：

據本報派妥友確訪云：前日順和進口，上海道派多人在怡和碼頭吊橋口守候，另派人至船上，搜拿康有為未得。至新濟到埠，又遣多人上船搜尋未見。據買辦云：康在天津，已搬行李上船，忽與同伴耳語，即乃搬行李去，云擬次日搭重慶至申。據買辦云：重慶輪接近吳淞口，忽一藍煙囪小船駛近船旁，即有二西人上船，手持照片，遍處搜尋，忽見一人像與照片相彷彿，指照片問此人，此人即點頭言是。西人即拉此人取行李上小船去，旋駛上相距二十丈之某兵船，上兵船去。⁴

此篇報導之所以被認為當時的報導文學作品，其主要原因在於具有現實狀況的描寫，同時語言文字的運用比較通俗，一般大眾接受度較高。然而，若從比較嚴謹的角度來探究此篇報導，它僅具有寫實的特性，但在文

學的藝術性則顯得不足，再加上此文是否具有值得深入探究與被報導的價值，則又令人感到疑惑，同時，在時效的掌握上也未臻新聞所應備的快速特性，因此，此篇 康有為到吳淞 以現代眼光觀之，也只能算是一篇普通的敘事性文章，尚無法稱得上報導文學作品。

由於報導文學的起源建構於新聞報導的基礎上，因此在內容的真實性則有一定程度的要求，然而，在通俗的眼光中一篇吸引讀者注意的作品，「真實」被要求的成份往往小於文字的雕琢與情節的鋪陳，這也使得當時的報導文學作品可能還夾雜著道聽塗說的猜測性，也就是說報導文學的在當時並不成熟到能夠獨立成為一個完整的文類。

大眾傳播媒體的興衰對報導文學這一文類的產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雖然在清咸豐年間陸續開辦幾份報紙，但其發行所在地並未遍及臺灣，也因此當時臺灣並未具有足以發展報導文學的條件，這也造成了臺灣在傳播事業的發展起跑點上稍有落後。

馬關條約簽訂之後，臺灣湧進了大批來自日本的新移民，在人口的比例與社會結構有了重大改變，民眾對於政治、經濟、民生等相關時事的了解日益增加，對傳播媒體的需求也相對提升，這樣的社會型態正式開啟臺灣傳播史的新頁。

二、民初的報導文學

《台灣新報》與《台灣產業雜誌》應運社會需求，陸續在一八九六年開始發行，移植自日本的傳播模式在台灣正式展開。然而，在當時殖民地的環境中，言論與思想均受到相當程度的箝制，因此，要如何能在夾縫之中求生存，儼然成為一大學問。當然，受壓迫的民眾仍有「知」的權利，部份媒體便試圖在高壓的政策管制下突破，傳遞非官方一言堂式的訊息。

這樣的傳播模式可以追溯至一九〇一年八月由台北辯護士會之主要

⁴ 同上註，頁 4、5。

成員所創刊之《台灣民報》，由於媒體的屬性有別於傳統，也因而開展了民間輿論的大門。另外，一九二二年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所創辦的第一本台灣政治運動的機關刊物《台灣青年》，其後更名為《台灣》，存在時間雖然僅有短短兩年，但卻成為文學史上所公認台灣新文學起點的作品⁵。由於清末民初的文學語言仍處於新舊交雜的混沌時代，經由這些新興媒體的出現，不僅重新莫立了新聞的白話文體，也為當代的文學運動帶來新的契機。

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時期的社會與文化的變遷正處於一個蓬勃發展的時代，不論在政治與經濟層面上，甚或在大眾傳播的方式與角度均形成一股新的力量。此時期的報導文學著重於描寫性質，由於當時的社會背景處於戰後百廢待興的局面，因此傳播媒體乃刻意對戰爭的場面與政令的宣導加以著墨。

不難想見，屬於描寫戰爭場面的作品成為當時報導文學的主流題材，以國外為例，海明威(Ernest Hemmingway)的《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lls) 則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另外，賴恩(Cornelius Ryan)的《最長的一日》(The Longest Day) 也是相當有特色的文學作品。但是這些頗受推崇的作品，在取材上固然十分忠於現實資料，不過，為了能夠更為讀者所接受，往往在表現手法上加諸部份渲染，所以在整部作品的完整性與真實性上則顯得稍有欠缺。⁶

在中國全面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就已陸續出現許多可貴的反日反帝國主義的報導文學，一直到阿英的《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出現，對後來的報導文學具有相當程度的啟發性，也引導了日後大量短篇報導文學作品的

⁵ 詳見向陽、須文蔚主編《台灣現代文學教程 報導文學讀本》，台北：二魚文化，2002年8月，頁9。

⁶ 有關報告文學名著評析可參見尹雪曼，〈報導文學與報告文學〉，《中華文化復興月刊》，22：4，1989年4月，頁49。

產生。⁷

報導文學必須忠於事實、社會責任與反映現況，這些論點不斷地被強化，在強調這些要件時，唯有透過親身的體驗與參與才能有更深刻的感受與筆觸。抗戰時期，國人對日本侵略惡行相當憤怒，不少人運用文藝作品來表達與反映當時的心境，因此提供了報導文學發展的絕佳條件。正因為報導文學的忠於事實與反映現況的特點，才能在對日抗戰期間，讓報導文學成為新興的文學運動。不過，報導文學的興盛，固然外在環境提供有利條件，最主要仍建築在民族情感的投射之上。

反觀臺灣，一九二〇年代正是政治運動相當活躍的年代，當時的文人為喚起臺灣人的民族意識與文化的復興，嘗試運用各種不同層面與層次的社會活動或政治傳播，企圖對日本的殖民文化加以反撲。這不僅是政治上的求新求變，也是反皇民化的重要思想脈絡。以一九二一年開始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代表，經過十四年的努力，加上十五次的請願活動，帶動了當時的社會運動風氣。另則，同年所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台灣工友協助會」、「台灣工友聯合會」、「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左翼文化聯盟」等諸多組織，在在激起有別於被壓迫之下的新思維與新主張⁸。如此多元的社會組織與活動，雖然帶動社會風氣的變革，不過由於此種改變並不為當時的侵略者所容忍，因此其對殖民地的管制政策轉趨高壓與官僚，試圖封鎖思變的民心；也因為高壓的政治經濟策略，連帶使得擁有變法革新的精神與行動不幸夭折。

日本殖民的高壓政策儘管在表面上看來似乎達到嚇阻的功效，但在實際上卻並未將反日的情仇完全扼殺，相反地，所有反抗的運動逐漸走入地下化。部份文藝工作者在一九三二年成立「台灣文藝研究會」與「台灣文藝協會」，這些組織的成立均是有志之士企圖從文藝的方向著手，以文字

⁷ 詳見鄭明嫻，《當代文學氣象》，台北：光復書局出版，1988年4月，頁127。

⁸ 同上註，頁9。

的感染力傳遞民族意識與政治改革的必要性⁹。

透過文藝作品來反映社會背景是日治時代相當重要的文學思潮，當中所透露的不僅是單純的文藝創作，更重要的是以文學介入社會與政治。此時期的文藝思潮便是建築在如此充滿矛盾的時空背景之中，尤其在被殖民的土地上，語言與文字往往被迫帶有異族的色彩，雖然有不少文人的作品流於風花雪月，但仍有許多具反日思想的有志之士，除了希望藉由文藝作品提供反殖民化的政治思想，另一方面，也期許能在高度的政治壓迫下為臺灣文學開創新局。

報導文學在此階段仍屬於一個尚待開發的新興領域，基於「報導」必須取決於「採訪」，而「採訪」來自於作者親身的體驗與具體事實的描寫，因此對於這類以具體觀察、並建構於描寫事件的敘事性文體也就成了最直接反應社會現況的特殊方式。報導文學在當時所處的角色並非只是傳遞訊息，另一方面，它所象徵的意義在於開啟民智以達到民族革命的最終目的。

中國的報導文學與社會現實一直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社會的演進過程都可以在報導文學作品中找到記錄，現實的變動激化與推動報導文學的創作，更鼓勵吸引不少青年投入寫作的行列。由於創作者的分佈層面廣，因此在題材選取上更顯豐富。

總括來說，當時的報導文學作品著重於強調文學的社會性，並嘗試在選材上切合現況，以避免流於空洞。一九三四年台灣作家在「台灣文藝聯盟」的大旗下，喊出了「寧作潮流先鋒隊，莫為時代落伍軍」這樣的口號。另外，楊逵則發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的《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上發表談「報導文學」；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又在《台灣新民報》發表另一篇「何謂報導文學」等短文；於六月間在《台灣新文學》雜誌發表「報導文學的問與答」¹⁰。楊逵這項新的創見為當時文壇掀起一陣漣漪，不過，由於其背負著國仇家恨的時代使命感，因此在論點多以開拓屬於台灣的新

⁹ 同上註。

¹⁰ 詳見向陽、須文蔚主編《台灣現代文學教程 報導文學讀本》，台北：二魚

文學為主。值得肯定的是，從閉門造車式的文學創作，到走出戶外記錄見聞，已是創作者的突破與轉型。

臺灣報導文學的初來乍到，可追溯至一九三〇年上海「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並號召發展「工農兵通信運動」、「創造我們的報告文學（Reportage）」¹¹，相較於二〇年代的報導文學尚未形成規範性的體式，三〇年代的左聯提出的要求與號召是有其歷史意義的。約在三〇年代，許多報導文學佳作問世，引起不小的熱潮，如《一個偉大的印象》、《包身工》、《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等，這些作品的創作型式大多是沿續著新聞報導的類型，胡仲持在《論報導文學》一文中提及：

近二十年的我國是在歷史的變革時代。生活在這一時代的文學青年對於報告文學可就似乎有著特別的喜愛。這個名詞一出現在上海，在上海的文藝雜誌上立即有不少相應的優秀作品刊載出來。比如夏衍所作的《包身工》就是發生過熱烈的反應的一篇。在抗戰初期，一般優秀的新聞記者往往採取了報告文學的形式，報導前線和後方的事實，得到一般的好評。有一為批評家甚至說，在抗戰初期，中國的新文學作品最有成績的，應當算是報告文學了。就翻譯方面來說，這些年來，各國的報告文學的作品往往比小說和劇本更受中國讀者的歡迎。¹²

從胡氏的說法裡，可以印證出當時的報導文學興盛除了外在客觀環境外，還有因應新聞寫作所衍生出的深度報導，而這也正是報導文學發展的歷史原因。

文化，2002年8月。

¹¹ 詳見馮光廉主編《中國近百年文學體式流變史（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

¹² 見《中國現代散文理論》，收錄胡仲持著《論報導文學》，台北：蘭亭書店

新聞報導 (News Reporting) 可算報導文學的起源，這是一種以新聞寫作的型態來寫所謂報導文學的方式，此種表現手法確實比一般新聞報導來的深入，不過，僅限於記者採訪當中所見所聞，至於是否能夠在架構上與手法上與傳統新聞採寫有所區隔，恐怕仍是值得討論的重點。至於台灣在三十年代的作品大多以反映台灣農村的生活型態以及各階層民眾的困苦情形為主，在藝術性與美學性缺乏深度與廣度，當然，這也成為日治時期報導文學欠缺完整性與結構性的重要因素。

在荊溪人的泛論「報導文學」一文中曾舉出一則專訪報導的例子，雖然此篇專訪僅是記者針對飛虎隊創辦人的柯克蘭的訪問稿，但因其內容夾議夾敘已超越一般新聞的範疇，因此並未將之歸類為一般性新聞，若從報導文學的角度來看，則又顯得其組織未臻嚴密，目的也不夠明確。儘管這一篇專訪仍有許多討論的空間，但或可將其視為報導文學的前身。

【本報專訪】抗日期間曾與國軍併肩作戰的美國地十四航空軍協會會員，飛虎隊創辦人柯克蘭 湯姆斯昨天說：「我認為，十四航空隊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最大的貢獻有二：一是他們成功的戰術運用，振奮了中國的民心士氣，削弱了百萬日本的氣燄，不再轟炸重慶。二是提高美國的信心，使能在太平洋上從容部署，在形勢上從珍珠港開始的頹勢，轉弱為強，扭轉了全面戰局。」

曾在羅斯福政府下擔任國家銀行法律顧問的柯克蘭，是第一位得知羅斯福總統有意組織航空隊而立即諮詢陳納德將軍，商討籌組的詳細事宜，若不是他的肝膽熱忱，積極進行，十四航空隊何時能組成就不得而知，將整個戰局的影響則不是我們今日所能預料的。

13

，1986年10月，頁322、323。

¹³ 見陳銘碇編《現實的探索》，收錄荊溪人，泛論「報導文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0年出版，頁7。

報導文學的真實性與新聞性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但它終歸是文學的一種樣式，所以在創作上仍被賦予規律性與藝術性。報導文學畢竟不同於新聞報導，它的獨特寫作方式，需要適時且適當地剪裁，方能在真實與正確中仍兼有文學的藝術美，這也正是日治時代報導文學發展的盲點。

第二節 報導文學與鄉土文學論戰

一九四五年脫離了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雖然在政治上獲得重生，但卻在報導文學的發展上產生了一段長時間的空窗期，這當中夾雜了政治與經濟等諸多因素。值此報導文學的斷層時期，僅有部份人士展開文史記錄的工作，也算為報導文學維持一絲的命脈。

戰後的台灣文學發展，隨時代潮流的變遷，呈現出波瀾壯闊的局面，或因政治、省籍、統獨及經濟型態的改變，形成了不同流派的作品。在光復後的台灣，文學發展重點在於為如何為台灣文學尋出路，也因此在此時期衍生出了鄉土文學論戰，並進而影響日後台灣報導文學的演變。本節首先對台灣光復後的文學發展狀況加以描繪，再從鄉土文學論戰與報導文學間的關係說明此時期台灣報導文學的發展過程。

一、 光復後的文學發展

光復後的台灣飽經戰爭的洗禮，不復當時的光彩，取而代之的是處處可見百廢待興的殘破景象，然而台灣民眾並未因此屈服，相反地，他們勇敢而堅毅地為重建家園辛苦耕耘。

光復初期，回歸祖國懷抱的台灣由於在政經文化上，與大陸有著相當程度的隔閡，因此在陳儀負責接收台灣時，就著手在文化政策上大力專注於去日本化以及回歸祖國，這就形成了當時所謂的文化重建。伴隨社會變遷而來的是許多文化事業的發展，尤以各種報刊雜誌的誕生最為顯著，在這些刊物之中有不少介紹大陸風俗民情、政治歷史等方面的相關訊息，這些內容不外乎是為了讓兩岸間的交流能夠更加順暢。

許多歷經征戰的知識份子在擺脫日本統治之後，亟欲完成未竟的事業，也就是為台灣文學的出路開創新局，不過在政治與社會環境的多重壓力下，原本可以步上軌道的文學發展，卻因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產生了斷層期。大約到了一九五〇年代末期，陸續出現了鍾理和、鍾肇政等作家，文學發展的進程才逐漸露出曙光。

光復之後，作家楊逵開始運用各媒體傳遞台灣新文學的香火，包括其所創刊之《台灣文學》雜誌以及擔任編務的《力行報》等，企圖藉由刊物為台灣文學開拓出一條新路來，不過皆因故而無法繼續。除了楊逵外，在文壇上具影響力的重量級人物便是吳濁流。

吳氏於一九六四年四月成立發刊《台灣文藝》，他創辦《台灣文藝》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落實在台灣這塊土地與人民身上，繼承台灣文學的精神與戰後的台灣文學。這個提供本土作家發表的園地儼然成為本土文學的一大支柱。吳濁流除在《中華日報》日文文藝欄和《新新》雜誌發表文章外，還刊行了探討台灣人命運的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這樣題材的小說，可算是擺脫高壓政策以後，較為寫實的作品¹⁴。《中華日報》的創刊對光復後的台灣文學發展產生不小的貢獻，創刊之原意在於執政黨希望

¹⁴ 詳見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96年出版，頁117。

能透過黨營模式，藉以達到政令宣導的發聲工具，於是在一九四六年二月於台南正式創刊成立。

由於創刊初期正值光復之初，特別留下日文版，以便讓尚不諳中文的台灣民眾也能接受，值得一提的是同年三月十五日開使在日文版下面，開關了一個刊登文學性作品的園地。這對當時尚在起步的台灣文學而言，不啻是件令人欣喜的消息。該版面作品內容豐富，囊括了小說、現代詩、文藝評論、論說等，發表人不乏傑出的作家，包括有龍瑛宗、吳濁流、吳瀛濤、葉石濤、王育德等人，這些優秀作家精闢的文藝作品能夠有發表空間，還須歸功於該版主編龍瑛宗。

在提供本土文學發表的園地中，《台灣新生報》「橋」副刊亦功不可沒。《台灣新生報》是《台灣新報》在陳儀接收之後改組而成，隸屬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雖然在二二八事件後《台灣新生報》面臨改組的命運，不過它的「文藝」副刊與「橋」副刊卻為台灣文壇激起了一陣漣漪。

「文藝」副刊的主編為何欣，由於其研究英美文學的背景，造就了開放性的文學觀，他主張文學不能閉關自守，必須與世界文學接軌才能有宏觀的視野，因此在版面的呈現上便開闢出介紹世界文學的新方向。另外，「橋」副刊的主編為歌雷，他是一個醉心於新現實主義的文藝工作者，在編輯的理念當中，試圖結合不同省籍的作家共同合作，期能產生新的創作火花¹⁵。在何欣與歌雷的文學新觀念下，連帶掀起了戰後初期最熱烈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相關論辯。

在這場論辯中不少作家提出「台灣文學」的路線，或許因為省籍不同，對文學的使命感與價值認定也有所區別，在不斷的論爭中的確有著相異於以往的認知。不過，當時的創作內容仍不脫描寫台灣戰後的社會現況與被壓迫的景象，這對於亟欲走出台灣新文學之路的文化人而言，還是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¹⁵ 同上註。

葉石濤在《台灣文學史綱》提到「台灣文學應有更寬廣的空間與更包容的心態以及多元的創作途徑」，¹⁶這也正是長期流於刻畫悲情歲月的文藝創作所欠缺的宏觀。事實上，台灣文學應該是反應台灣本土民情與現實生活的文學，其內容應該是多樣化且具有人文特色的精神，而非一味充斥不平等待遇的情緒投射。誠如歐陽漫岡在「關於「台灣鄉土文學選輯」一文中所述：

「台灣鄉土文學」是以發掘這裡寶貴的文學遺產；充分的表現特色的精彩的鄉土文學為內容。半世紀來的精彩的題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請讀者與作者多方面的大量的貢獻出來。我們當然十分珍視。「選輯」不是什貨攤，希望無謂的消費奢侈品不要登市，讀者倘若感到土產的可愛，待我們以事實來證明。這決不是所謂「台灣新文學」，而是中國文學的主流中的一端！¹⁷

台灣文學不應該侷限於狹隘的地域性與本土化的悲情題材，如果能夠發揮本土的原民文化以及具有傳統特色的社會現象，將文學投映在更宏觀的角度空間，反映更寬廣、更真實的社會現面向，台灣文學才能逐步走出故步自封的窠臼，逐漸與世界文學接軌，營造出兼具本土與現代的台灣新文學。

二、 報導文學的萌芽與鄉土文學論戰

台灣的報導文學在五 至六 年代之間，幾乎是呈現出一片空白。這段期間的文學發展，因政治時空背景的不同，在取材上亦有所差異，五 年代以反共文學為主力，六 年代則著重於現代文學，到了七 年代的重頭戲則是鄉土文學。報導文學在後期的發展深受七 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所

¹⁶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96年9月，頁170。

¹⁷ 見《台灣鄉土文學選集》，台北市：武陵出版社，1991年，頁1。

影響，在論戰的演進過程所引發的諸多話題，也正是日後報導文學的取材重點。

一九七一年一月，因釣魚台事件所引發的「保釣運動」，是為當時的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的力量團結，如此的社會運動事件在文學界也造成不小的衝擊，一九七二年關潔明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了〈中國現代詩的幻境〉與〈中國現代詩的困境〉兩篇文章，針對葉維廉《中國現代詩選》、張默主編《中國現代詩論選》、洛夫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論詩的部份）大加批評，指摘其缺乏現實意識，使當時的詩壇陷入困境與幻境，由美學的觀點來看，那只是一批人事先商量好一起玩的一套文學上的障眼法，是「文學殖民主義的產品」¹⁸。

繼關潔明之後，唐文標相繼發表了〈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僵斃的現代詩〉、〈詩的沒落〉和〈日之夕矣 - 《平原極目》序〉等文，為文壇投下一顆炸彈，並引起相當大的震撼，隨之引發現代詩論戰的熊熊戰火，這場論戰的戰線延伸到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點燃於報端的鄉土文學論戰其實在整個文學的思想與社會的思想上都著不同於以往的突破性，貫穿其中的中心思想則在於對現代派文學模仿西方、逃避現實、脫離民族等弊病的批評，以及希望能立足本土，落實現實。

鄉土文學運動為台灣的本土化運動打開局面，而這個本土化運動是全面性的，作家王拓在一九七七年一篇著名的文章〈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裡，大力倡導將文學的關注焦點放在「此時此地」的台灣現實環境中，並強調「文學的研究，應該把它放在當時的歷史與社會的客觀條件上加以考察」王拓憂心「鄉土文學」容易被誤導為「鄉村文學」或「鄉愁文學」，如此更容易陷入一種狹隘偏頗的認知。如此將論爭的焦距轉至台灣當時的特定歷史空間中，這讓作品的題材又有了新開拓的空

¹⁸ 引自李祖琛，〈七十年代台灣鄉土文學運動析論 - 傳播結構的觀察〉，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1月。

問。¹⁹

將鄉土文學論戰提升至報端而引起矚目的推手為《聯合報》，其刊載長達三天彭歌的「不談人性，何有文學」，對王拓、陳映真、尉天驄等人相繼提出批判，文中提到：「如果不辨善惡，祇講階級，不承認普遍的人性，哪裡還有文學？」，如此具煽動力的言論令人側目。但繼之而起的許多討論議題由於涉及作家本身的評價與地位，已非單純的文學觀問題了。經過激烈的文學論戰後，台灣文學發展仍隨政治社會變遷而不斷蛻變，這也產生了多元性寫作路線的出現，連帶影響爾後的各式文學類型。

六、七十年代在時局上已趨於穩定，揮去大時代的動亂局面，作家筆鋒轉向刻畫小人物的生活面，或描寫農村生活、或敘述社會中下階層的市井小民，有些則從政治立場書寫政治小說，其中有不少女作家致力描繪社會各階層的女性群相，如朱秀娟、曹又方等人。²⁰本土作家黃春明所著《看海的日子》描寫妓女的心路歷程、李喬《寒夜三部曲》描述客家人勤奮的發展史等，都是透過小說的型式來反應社會現況。

雖然，在文學論戰的過程中引發出對文學觀念不同的激烈探討，但是，這場論爭卻提供了讀者一個省思：在文學的場域中是否應該擁有更寬廣的空間，容納更多元的題材？在向西方文學借火的同時，是不是也應該回過頭來看一看這塊屬於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語言？這個答案是肯定的，在民族意識、社會改革的風起雲湧的社會思潮中，可以看見鄉土文學是廣為大眾所接受的。

鄉土文學與社會密切結合的特性帶來的不只是文學上的衝擊，還有政治因素的考量；一九七八年的國軍文藝大會上，時任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的王昇將軍針對鄉土文學所發表的談話，正是具有為鄉土文學論爭畫下休

¹⁹ 見張誦聖著《文學場域的變遷》，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1年6月，頁16。

²⁰ 曹、朱二人大約竄起於七十年代。曹又方著作以小說為主，如《風塵裡》、《碧海紅塵》等；朱秀娟著有《女強人》、《再春》等。這些作品內容比較著力於刻劃社會各種女性的生活群相。

止符的象徵性意義。他認為：

純正的「鄉土文學」沒有什麼不對，我們基本上應該「團結鄉土」。愛鄉土是人類的自然情感，鄉土之愛，擴大了就是國家之愛，民族之愛，這是高貴的感情，不應該反對的。就算是有些年輕的鄉土作家們偶或偏激了一點，他們要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過去流傳下來的某些不合時代的東西，反對社會上某些黑暗與不公平，這也可能是出自年輕人一種天賦的正義感，只要是動機純正的，我們就應該聽聽，應該諒解，應該善意的交換意見，應該團結這些人，不要把他們都打成左派，統統給戴上帽子。事實上我也知道有些鄉土作家並非如此的。²¹

檢視鄉土文學論戰，可以清楚發現鄉土文學是以兼具傳統文化的回歸和社會改革的雙重意義之下發展起來的。因此，其所詮釋的歷史角度以及對台灣社經體制的了解與社會關係的定位，都是從抵抗的精神、人民的立場出發，進而反應於文學運動上。這也就是鄉土文學所強調必須與社會脈動相結合，進一步啟迪民智，然後達到改造台灣社會文化的目的。

由於報導文學的書寫必須涉入社會的現實，因此台灣的報導文學發展受到鄉土文學論戰影響甚鉅，焦桐曾說指出：

通過報導文學對洪通、朱銘、侯金水、雲門舞集、雅音小集，及中國大陸抗議文學、傷痕文學等等的大量推介，肯定本土藝術家的成就和民族情感討論傳統與現代化議題。²²

²¹ 引自翁慧雯，《文學與政治 - 七十年代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6月。

²² 引自向陽、須文蔚主編《台灣現代文學教程 報導文學讀本》，台北：二魚文化，2002年8月，頁15。

此一說法反映出報導文學的寫實性與社會性，是與社會脈動息息相關的。

當時《大學雜誌》、《書評書目》、《中外文學》、《夏潮》等刊物都先後展開有關台灣文學的傳統與特質方面的座談與討論。其中《夏潮》便刊登過由古蒙仁、張良澤等人所寫的報導文學作品，甚至透過徵文的方式來吸引更多人的投入，期能藉由不同行業背景的人來觀察社會的各層面，如此方式也是報導文學的前身。

高信疆在一九七三年接掌《人間副刊》後，推出的「現實的邊緣」專欄，被視為現代報導文學的濫觴，推出初期的確造成極大的風潮，不少作品內容切入社會的角落，呈現社會各階層的內在層面，讓人耳目一新。當鄉土文學論戰沸沸揚揚之際，隨著該專欄的推出伴隨而來的是更多鄉土文學深刻的關懷。向陽曾說：

報導文學曾經在七○年代的台灣風起雲湧，創造出波瀾壯闊、勢不可擋的氣勢。當時台灣的文學家秉於一顆愛鄉愛土的鮮紅的心，上山下海、深入台灣民間，採擷民情，記述風土，蔚然成為刺激台灣社會變遷的不可忽視的力量。²³

從此觀點反觀當時的報導文學作品，確有脈絡可尋，古蒙仁的《黑色的部落》、陳銘礪的《賣血人》乃至翁台生的《麻瘋病院的世界》，這些被譽為報導文學的典範之作，都有著鄉土文學關懷吾土吾民的內涵，不難看出寫實主義在報導文學中所撒下的種子。

有鑑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引起的迴響，《聯合報》也在副刊推出了類似的單元「大特寫」、「傳真文學」等。該版主編亞弦嘗試透過不同

²³ 見劉克襄，《天空最後的英雄 - 旅次扎記》序言，台北：時報文化，1986年。

形式的表現來落實關懷鄉土，這些單元的作者與讀者同樣有著愛鄉土的心情，藉著該單元推出也讓文學與社會脈動相結合，並且能夠普及廣大閱讀群，而非淪為特定族群的園地。

《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可算是七十年代均分天下的兩大平面媒體，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的影響力不容小覷，透過兩大媒體的推波助瀾，報導文學的發展跳脫出傳統鄉土文學論戰而形成一獨立文學活動，媒體的傳播模式與功能是值得觀察肯定的。然而，另一個值得觀察的重點在於作品的「質」與「量」。

報導文學的創作數量經由兩大報所開闢的發表園地，已經有足夠發揮的舞台空間，但在「質」的層面上來看，雖然多元的寫作路線提供不少新鮮的題材，不過卻也容易流於固定的取材走向，除此之外，如何將作品更加精緻化與細膩化也是一大重點，這一部份，傳媒將文字與影像結合，讓報導文學的表現形式更趨豐富，取代傳統單一的文字敘述。

報導文學在此階段的特性受限於當時文學論爭的影響所致，呈現於作品上的批判性十分強烈，部份報導文學創作者有意藉著傳媒得力量突顯鮮為人知的社會黑暗面，在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帶中試圖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這條有別於號稱第四權的新聞路線，沒有刻板制式的思維模式，卻有更多更廣的觀察角度，對普羅大眾而言是較具吸引力的，同時透過帶有批判的筆觸，更能突顯出問題的徵結。

除了報刊媒體的推動外，文學獎的成立也為報導文學開啟了新頁，一九六六年國軍文藝金像獎首開設立報導文學獎的風氣，不過成效不彰，並未引起太大的回響，一直到《中國時報》與《聯合報》所舉辦的文學獎設立報導文學獎項，讓創作者除了固定的舞台之外，又多出了一大片空間。不過，在文學獎的評選過程中，仍未擺脫新聞報導的影子，所以在選取上也容易產生報導性與文學性不夠協調的情況。又或者因評審個人主觀的認知，造成選材上易流於迎合評審口味。²⁴

²⁴ 有關文學獎之影響層面與文學獎發展歷程，請見第五章第一節。

但是，報導文學獎項的增設也讓這個特殊的寫作方式，能夠擺脫傳統新聞寫作的模式，走向更為散文化，在內容的抒情成份也更為流暢，連帶影響日後報導文學的創作路線與表現形式。在傳播媒體以及社會刻意經營的情況下，報導文學在七十年代從萌芽到發展，展露出的不單只是純然的文學作品，在其背後所蘊藏的是對整個社會的關懷，對政治的批判，對弱勢族群的付出，文人不再只是執筆為文的書生，透過筆鋒能讓文學思潮能夠有新的昇華，也讓長期帶有濃厚悲情色彩的鄉土文學有了另一個出口。

追溯七十年代的報導文學創作者都是未經戰爭洗禮的新生代，這些成長於光復後台灣的一代，缺少了日治時代與中國大陸的生活體驗，加上諸多外在環境的改變，多元的社會正好提供了他們寫作的材料，報導文學的寫作方式讓他們有了試煉的機會，沒有舊有的包袱，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創作空間，新生代的創作者正為萌芽中的報導文學寫下新頁。

對文學工作者而言，捍衛文人的尊嚴、肩負社會責任與落實文化深耕三者是同等重要的，從鄉土文學中的歧異見解，轉變至文學作品中有著深濃的關懷與認同，報導文學為七十年代的文學現象提供了一個良好見證。

第三節 解嚴後的報導文學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五日宣佈解除戒嚴之後，台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都邁向一個新的里程碑，對文學思潮的轉變與媒體的多元化更是一大助力。從保釣運動到鄉土文學熱潮，構成了七十年代社會與文學思潮的內容，在歷經激烈的文學論戰以後，文學類型的發展有了轉折，不僅是因為社會政治的壓力，還有來自經濟起飛的變革。

本節將以鄉土文學論戰以後的台灣文學發展現象為首，進而切換至八十年代以後台灣報導文學的現況。

一、 鄉土文學論戰之後的台灣文學發展

八年代的台灣仍然繼承著七年代的危機與壓力，在外交上無法有所突破，在內政上又面臨反對勢力的興起，如此具有危機感的當頭，文學的發展有了不同的走向。雖然作家愛鄉愛土的心情仍在，但是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以及工商業社會中人性的冷漠，似乎有著相當程度的無力感。

隨著言論的開放再加上政治的參與度提高，此時期的文學作品的確有著較為豐富且多元的表現。其中以政治為題材的文學作品登場，也為當代的台灣文學開闢一條新的路徑。政治文學是一種深蘊意識型態的文學創作作品，不少作家會以小說的風貌來呈現，內容不外是反映個人對時代、對政治的想法。²⁵

政治議題向來是敏感的禁忌，國民黨當政時期政治更被視為不可侵犯的神聖圖騰，在社會言論日趨開放的情況下，政治文學的發展則使許多原本被認為忌諱的社會事件一一浮上檯面，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即是一例。這場令人震驚的政治事件，不僅反映了知識份子不甘被獨裁政府壓

²⁵ 詳見林文賢、林素玟、林淑真、周慶華、張堂錡、陳信元合著之《台灣文學》，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1年8月，頁75。

迫，求新求變的思維模式，更重要的是推動了王拓、楊青矗等在台灣文壇佔有一席之地的人文投身政治活動。風聲鶴唳的年代中，知識份子僅能單純記錄事件的發生，卻無法再有更深入的闡述，政治文學僅是文人託意的作品。

政治事件的衝擊的確實為文學潮流的轉變來影響，高天生在《新危機與新展望 - 鄉土文學論戰後台灣文壇發展的考察》一文中針對此觀點曾說：

考察論戰後迄今台灣文壇的流變和發展，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作家受到論戰的衝擊，及隨後發生於高雄的政治事件的再啟蒙，都有了新的轉向和再出發，這種創新和求變的精神已為台灣文壇帶來新希望。²⁶

鄉土文學論戰使作家清楚體認文學與政治勢力間的糾葛，對於如何重新認識台灣社會的總體經濟、文化性質與自身的社會功能性都有比較積極的取向，而且也更加確認文學的自主性應與政治有所區隔。

除了政治文學外，隨著科技發展消費型態的改變，都市人口急遽增加，相對的人際關係也在變遷的時代中漸趨疏離，這個情形下的文學作品也走向一個反思的角度，在取材上回歸到原始的風貌，遠離塵囂嚮往桃花源源的超脫，尤其重視生活環境與品質，這些都是在不安的流離心境下所衍生出的反射心理。

歷經文學論戰後，八十年代的文學作品在質量上可算是具有相當水準的，雖然在部份內容上是沿續了原有的題材，但有一部份作家仍然保有讀書人的風骨，立志為時代的良知，獨立於權力團體之外，所以這一類型的作家在取材上僅是對政治現況做客觀的描寫，然後將作品的媒材轉向日常

²⁶ 高天生，《台灣小說與小說家》，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年12月，頁257。

生活的點滴，環保議題、生態保育、教育文化等，這讓創作的空間有了更寬闊的領域。

文學作品在八〇年代的交流是嚴肅與通俗逐漸重疊，藉由報紙副刊的推動，讓一部份的作家體認到曲高和寡的純文學是無法深入民眾的，唯有讓文學走入民眾的生活才能擺脫沉重的包袱。這種情形下，文學作品的價值似乎反應於市場價值上，一九八四年以來不少文學作品被改編為電影，白先勇、黃春明、朱天文等人的作品都是電影的題材。其次是許多所謂票房作家與排行榜作家的出現，這些票房作家與排行榜作家的作品與社會責任沒有太直接的相關，反而像是透過精美包裝行銷的消費性商品。

南北派別的爭議在此時期也是討論重點，這當中牽涉到了省籍與文化的認知，也算是鄉土文學論戰的再延伸；北派認為應將台灣文學納入中國文學的主流中，南派則主張台灣文學的獨特性格，強調台灣文學的自主性。面對二種不同角度的解讀，陳若曦曾語重心長指出：

北部作家希望學習第三世界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反封建主義的經驗，與南部作家主張植根鄉土，從最眼前的事做起，這兩種不同的追求方向都應受到重視，同時，彼此也要互相尊重，不要發展出對立或互相排斥的局面來。²⁷

誠如陳若曦所言，每一個時期的文學思潮都有其歷史意義的，但文學活動應該是開放性與綜合性兼具，若僅以單方面的主觀認定做為論述的依據，恐怕易失之偏頗，如此的文學作品勢必不夠宏觀。

二、 八〇年代以後的報導文學

²⁷ 陳若曦此論點係轉引自高天生，〈新危機與新展望 - 鄉土文學論戰後台灣文壇發展的考察〉，收入《台灣小說與小說家》，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年12月。

解嚴之後社會發展更趨多元，不僅在言論上自由度增加，在文學刊物與傳播媒體的伸展空間也較之寬廣；隨著報禁的開放，平面媒體數量遽增，報刊雜誌的內容也充滿了新鮮感與綜合性，這也使一般作家賴以發表作品的文學性副刊變的不再一枝獨秀。

報紙的張數增加、版面擴充，因此傳統副刊的型態在報禁開放後有了轉變，首先是突破傳統的「忽視本土」，而以新型態的「關照本土」切入生活情境；其次則是從舊有副刊中「疏離社會」轉而「介入現實」；再其次是由原來「迴避禁忌」到勇於「試探禁忌」。²⁸副刊風格大幅度的改變，影響了八十年代以後文學界的發展，這也讓傳統的「文人圈」逐漸淡去，相對的奠基於大眾媒介的「大眾圈」卻日益顯著。²⁹

基於編輯型態的轉變，文學性副刊已漸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篇幅較小、較為通俗的大眾化論壇，這對需要較大篇幅的報導文學而言是為重大影響，這樣的結果也使得報導文學退居非主流的行列；報刊一直被視為報導文學的濫觴，受限於外在環境的不同卻讓報導文學隨著文學性副刊的沒落走入角落，這樣看來，報導文學因副刊而起，也因副刊而落。

除了副刊風格的改變以外，部份學者質疑媒體的經濟力不再支援報導文學，也是造成其沒落的原因。³⁰不過，筆者認為此一觀點有失偏頗，媒體在經濟上的支持固然有實質上的意義，但若將報導文學的式微歸咎於此，恐怕是刻意忽略外在環境的變化，甚至將報導文學定位於媒體的附屬

²⁸ 詳見林淇瀆，〈戰後台灣文學傳播困境初論：一個「文化研究」向度的觀察〉，收入《新聞學研究》第五十一集，民84年7月，頁152、153。

²⁹ 參考葉淑燕譯，（Escarpit, 1958），《文學社會學》，頁92-93。據Escarpit的定義，「文人圈」的概念是指「那些受過相當的知識培育以及美學薰陶、既有閒暇從容閱讀，手頭又足夠寬裕可以經常購買書籍，因此有能力作出個人文學判斷的人士們」所形成的交流圈；而「大眾圈」則是泛指「所受教育尚不足以掌握理性判斷與詮釋能力，僅粗具一種直覺的文學鑑賞力，而工作環境與收入也不利其從事經常性文學閱讀與購買」的民眾。

³⁰ 2002年兩岸報導（告）文學的發展與未來研討會（2002年11月8日，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10樓國際會議廳）中，有學者提出報導文學的發展，大部份取決於媒體的經濟支持，當媒體的經濟奧援不再，報導文學也將因之而衰。

產物。

除了媒體的主客觀環境改變影響所致，後現代主義的興起也是影響報導文學發展的重要因素。文學思潮的流變讓原本崇尚寫實路線的文字工作者產生了不同的思維模式，也使作品不再侷限於傳統的寫實手法，不同風格的文學創作陸續出現，書寫技巧夾雜小說型式或詩化的型態，這一種過於強調雕琢與藝術敘事手法是報導文學所不及的。

解嚴以後的報導文學在作品的風格與走向上，比起以往是有更大的空間，除了政治上的解放以外，社會的多元性也提供許多值得開發的文學題材，環保、生態、歷史、民俗等諸多面向都是有別於前期報導文學的寫作範疇，不少創作者或讀者都期待告別悲情以後的報導文學能夠開出燦爛的花朵。不過，正因為傳媒風格丕變，期待未如預期，報導文學的發展陷入瓶頸。

大眾媒介的報紙副刊由過去的「文學副刊」轉為成為大眾化的論壇，純文學性也搖身成為一般民眾接受的通俗性與消費性，改變的不只是報紙或編輯本身，而是連讀者都一併被迫接受所謂的新潮流媒體。副刊的多元論述固然為社會大眾開啟意識啟蒙的窗口，也為文化工作者開闢了更大的活動空間，但是當版面上的通俗性與消費性甚於文學性時，恐怕也是扼殺了許多文藝作品的生存空間，當然也包括了報導文學。面對逐漸起飛的八十年代報導文學來說，報禁開放的利弊得失恐怕尚難以論斷。

媒體型態轉變影響外，還有一個足以對報導文學發展造成影響的重點便是文學獎項的取消，首開風氣之先的時報文學獎自第六屆到第十三屆（1983-1990）取消了報導文學獎項，這對許多創作者而言的確是一大打擊。除了發表的空間遽減外，文學獎項的指標性意義恐怕才是文字工作者的精神支柱。如果從另一個層面探討，文學獎的重要性是否大到足以影響作品的質與量，倒是值得思考的空間。

扣除掉報章雜誌的版面限制，報導文學作品的內容在此一階段才真正落實於日常生活中，柏楊的《穿山甲人》寫患有先天性魚鱗癬症的張四妹、官鴻志所著《不孝兒英伸》寫鄒族少年湯英伸的心路歷程、廖嘉展寫下《月

亮的小孩 說明白化症兒童的處境，還有更多的作品反應了不同層面的社會狀況，同樣引起廣泛的重視與討論，如此多元、多視角的書寫風格其實是有助報導文學的發展。

報導文學的批判性一直存在於作品之中，透過批評與反思做為作品中的主題意識，不過身處快速變遷的社會裡，批判的所引起的回響能夠存在多久？在批評的同時是否也該提出具體的意見呢？就此角度來看報導文學的社會責任亦是不容忽視，至於報導文學與社會運動二者間的關係是否妥適？雖然也過有爭議，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報導文學所具備社會功能性，誠如藍博洲所言：

介於新聞報導和文學作品之間的報導文學，是一種具備改造社會功能的文學類型。³¹

反思過後的報導文學是關懷社會的為訴求取向，我們可以看見報導文學的生命力反映在許多默默用心耕耘的園丁身上。面對外來文化的衝擊，本土意識再度抬頭，但已不再是字面上或理論上的爭辯，而是落實在深耕故土、投身於歷史文化。陳映真在一九八五年所創辦的《人間》雜誌，抱持著為社會弱勢族群發聲，對社會、生活、生態環境、文化和歷史進行調查、反思、記錄和批判的方針，讓報導文學有了重新站起的機會與舞台。

回歸到報導文學的本土化路線，屬於田野與文史調查工作的方向是比較能夠彰顯深耕故土的文化關懷，一方面是為還原歷史面貌，另一方面也是重新賦與文化傳承的使命；原住民、生態環境、社區營造、雛妓問題、教育改革、民俗文化、族群認同等等，儘管部份議題類型沿襲舊有題材，但在書寫的過程中卻投入了更深的關懷，也帶入更多的感情，這也使現階

³¹ 參見藍博洲，〈人間正道是滄桑 - 一個報導文學寫作者的體驗與期待〉，載於《兩岸報導（告）文學的發展與未來研討會》大會手冊暨引言稿，2002年11月，頁53。

段的報導文學有了更柔軟的表達方式。

報導文學的影響層面不僅止於文字上的描寫，在傳播科技日新月異的今日，報紙雖然不再刊登報導文學作品，卻讓報導文學的展出舞台從原本的報紙副刊轉身至雜誌發表甚或網路世界，這是有待觀察的現象。至於電子媒體的蓬勃發展，更是讓報導文學的影響力擴及更寬的領域，部份電子媒體的「深入報導」、「關懷報導」、「調查採訪」，所走的路線帶著批判意味與關懷性質，其實都是源自於報導文學的思想內涵。

報導文學的社會性反映了時代的縮影，通過書寫者的思維與文字的表現，為歷史做了見證。從文化傳播的角度來審視，報導文學的發展過程是背負了大眾媒介與社會結構二者轉變的歷史包袱。但是，在文學思潮的改變歷程當中，報導文學的書寫方式與題材卻是帶著無比的豐富性與前瞻性；縱然潮起潮落，台灣的報導文學仍舊充滿著生命力正在繼續發芽。

第五章 報導文學的發展

任何一種文學體裁，只有在其自身的審美特質得以充份發揮時，才能有真正的繁榮。特殊的時代背景造就了報導文學的崛起，也透過傳播的途徑讓其得以蓬勃發展；報導文學的興盛是七十年代文壇上令人十分矚目的現象，這種跳脫傳統散文形式的框架的特殊文體，儼然成為與小說、詩歌、散文等文學體式相提並論的新興文學體裁。

本章將嘗試從報導文學在台灣的發展狀況探討，從輝煌時期的盛況，到沒落時期因弊病衍生引發的危機，以及如何化危機為轉機獲得重生等三方面加以論述，以期能為台灣報導文學的興衰做概括性的說明。

第一節 報導文學的輝煌時期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高信疆在其主編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正式推出「現實的邊緣」專欄，這個以揭發社會現實層面為主的專欄，為七十年代台灣報導文學的發展拉開了序幕。高信疆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三年接編《人間副刊》的十年中，為台灣的文學傳播現象帶來了新的契機，也正式開啟了台灣報導文學的輝煌時期。

一、報導文學的發展盛況

七十年代以後，台灣的經濟發展帶來了社會的文明與繁榮，但是對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而言，儘管經濟的大環境改變，他們並沒有因此獲得較大程度的改善，仍然在生活壓力的重擔之下奮鬥與掙扎。對這些生活

處於較為貧困的勞苦階層，報導文學創作者投注了相當程度的關懷，再加上受到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影響所致，¹初期的報導文學作品皆以關懷鄉土和反應社會底層的現實面為主，類似的題材大量出現，其實反映出了平常鮮為人知的社會黑暗面。

報導文學的創作者透過筆鋒，表達了對社會各階層的關注焦點，也從不同面向加以書寫他們的人生。如古蒙仁的《雞鳴早看天》，描繪的是台北大橋下人力市場的情形；陳銘礪的代表作《賣血人》，則是藉由文筆勾勒出一群為了生活被迫以賣血為生的社會邊緣人的悲哀；還有薛不全的《礦工淚》，寫的是台灣礦工慘遭壓迫與剝削的深沉哀傷。不同類型的題材，相同的是反映社會的現實，作者將筆觸伸向平常為人所忽略的社會生活層面，經由作品的誕生，充份表現出作者對整個社會與弱勢族群的關懷與同情。

在尚未解嚴的年代中，無論是對大環境改革或是對社會現實的批判，都需要承擔極大的風險，而報刊的發展與新聞自由也受到相當程度的箝制。由於傳播途徑的設限，縱然有不少社會的寫實面值得挖掘，卻也礙於戒嚴時期的諸多限制而無法一一被揭開。不過，在歷經七〇年代文學界所發生的大小事件之後，²文壇上出現了不同的轉變，報導文學經由報紙副刊的刊載，正式浮上檯面，而《人間副刊》正是將報導文學推向高峰的有力推手。

高信疆在《人間副刊》所推出的「現實的邊緣」專欄，分為域外、離島、本土三篇。「域外篇」報導海外華人的生活狀況及環境；「離島篇」則是報導台灣四周各大島嶼的人文風情與自然景觀等；「本土篇」報導的是台灣本土所發生的事件，包括不為人熟知的人、事、歷史、地理等。³這

¹ 有關報導文學與鄉土文學論戰之間的影响與關聯，請參見本論文第四章第二節。

² 所謂七〇年代文學界的大小事件包括：一九七二年由關潔明所點燃的現代詩論戰、一九七三年「龍族評論專號」的出版、唐文標事件、以及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等。

³ 詳見李瑞騰，〈從愛出發 - 近十年來臺灣的報導文學〉，載於《文藝復興月

三大範圍看似平常，其實卻深深影響後來報導文學的發展，不難發現，後來的報導文學作品幾乎脫離不出這些範圍。這位被譽為「紙上風雲第一人」的副刊主編，以其敏銳的新聞鼻與感性的文學眼為報導文學在台灣的興盛時期揭開序幕。

除了副刊專欄之外，高信疆並策畫將報導文學的範圍加以擴大，遂於一九七八年在中國時報文學獎中增設了報導文學獎項，不可否認，藉由文學獎所發揮的傳播功能，是讓報導文學快速形成新潮流的方式之一。不過，早在一九六六年國軍文藝金像獎就已設立報導文學獎，因此，中國時報文學獎並非首開先例。另外，七十年代初期《綜合月刊》也刊登不少報導文學作品，⁴不過，這些都尚未能為報導文學帶來風光的局面。一直到「現實的邊緣」專欄推出之後，寫作者切身投入發掘問題與探索的行動中，除了文字敘述以外，並配合了圖片說明，至此，報導文學才算真正掀起了高潮。

藉由《中國時報》所帶動報導文學的風潮持續延燒，一九七七年接掌《聯合報》副刊的亞弦，也不遑多讓大力提倡報導文學，而《聯合報》所主辦的聯合報文學獎也適時加設了報導文學獎，透過當時執傳播界牛耳的兩大平面媒體的推波助瀾，一時之間，台灣的報導文學蔚為風潮，儼然成為新興的文學體式。此外，除了兩大報的發表園地之外，《臺灣時報》與《台灣新生報》的副刊，也相繼推出報導文學方面的相關專欄。另一方面，各種雜誌也先後分別投入了報導文學的領域之中，如《綜合月刊》、《漢聲》、《皇冠》、《人間》與《夏潮》等，透過這些刊物的心力投注，讓報導文學的影響力更為擴大了。

在報導文學獎的助力之下，造就不少優秀的創作者，這些創作者用生命投注關懷、用心傾聽基層的聲音，他們走出傳統文藝創作的象牙塔，深

刊》，第一五八期，1984年12月，頁50、51。

⁴ 翁台生所著《癡瘋病院的世界》，台北：皇冠出版社，1980年1月，頁220。該書後記中提及：「早在目前受重視的『報導文學』流行以前，『綜合』就在這一方面做了許多鋪路工作。」

入每一個值得探索的角落，寫成了不少令人動容的作品。這些至今仍為人所熟知的優秀的報導文學創作者，包括了陳銘礪：代表作為《賣血人》、古蒙仁：代表作為《黑色的部落》、李利國：代表作《紅毛城遺事》、翁台生：代表作《痲瘋病院的世界》等。⁵這些優秀的創作者不乏記者出身，由於受過專業的新聞養成訓練，在事件報導的剖析面來說，深度與廣度會顯得比較犀利一些；而在選材的嗅覺上，他們所獨具的新聞鼻，也讓題材與社會的脈動更快速的結合。

正因為報導文學崛起，讓許多原本處於社會底層，鮮為人知議題的神秘面紗被一一揭開而浮上檯面。對長期處於「被告知」狀態下的讀者而言，不同角度寫作類型，的確令人耳目一新。報導文學所關切的焦點，與社會的變遷與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它所取材的方向包含了生態保育、教育環境、原住民等不同角度，這些題材都是值得深入考察的重點，尤其在新聞報導的篇幅不足與外在環境受限的情況之下，能夠透過副刊版面的傳播路徑加以補足，是有其可取之處的。

七年代的報導文學雖然蔚為潮流，但是它所揭露的社會黑暗面，引起了不小的震撼，這樣的書寫題材僅管為讀者打開了新的閱讀視野，卻也造成了部份認知上的偏差。大陸學者以為「台灣的報導文學太過著重於人性的描寫，甚至將人性與人生視為報導文學中一種最有意義的存在，進而將之提升到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⁶；另外，台灣報導文學的批判性質，也讓大陸方面產生了誤解，他們認為：

報導文學的宣傳功能比較直接而典型地體現在歌頌與批判的議題上。歌頌與批判，在報導文學中是一個繞不開的課題，而其中的暴露、批判則更是一個敏感的問題。所以，討論要不要批判揭露，如

⁵ 有關報導文學作家群介紹，可參見楊素芬，《台灣報導文學概論》，台北：稻田出版社，2001年9月，頁184至197。

⁶ 見丁曉原著《20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理論批評史》，安徽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頁170。

何批判揭露，這是十分有意義的。⁷

這是大陸方面學者對台灣報導文學寫作題材的觀察意見，事實上，這個論點是有相當程度偏頗的。不可否認，報導文學發展的初期，基於反映社會現實的特性與彌補一般新聞報導不足之處，在寫作的態度上，可能採取一些比較激進或是帶有批判性的方式。但是，這並不意謂所有的報導文學作品皆是如此，仍有不少作品是以人道關懷的方式來表達，這些作品被有意或無意的忽略，讓大陸學者對台灣報導文學產生價值觀的偏差，無論對台灣的報導文學創作者或讀者都是有失公允的。

在輝煌時期的報導文學，由於與社會的變遷過程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在寫作的取材上顯得相當多元，這絕非大陸單方面刻板印象中的批評甚於一切。在不同類型的題材中，可以切入的角度與層面甚廣，包含了當時最重要的各項民生議題，有社會教育、原住民問題、雜居問題及環保生態等漸受重視的相關課題等，這些都是值得關注的焦點，除了反映社會現況之外，更能帶動讀者與創作者間的全新視野。

台灣的報導文學的發展，自有其可以揮灑的空間，這絕非受限在寫作類型與取材之上。兩岸之間的政權分立，所造成的文化差異，讓相同的文類卻有不同的思維模式，以致引起部份觀點的落差，這些都是有待釐清說明，而不應讓偏差性的思考，造成兩岸學術界不必要的爭議，也該讓所有的疑慮，還原真相。

二、報導文學興盛的原因

綜觀報導文學在台灣興盛的原因，仍然脫離不出社會變遷與文學思潮的脈絡。台灣報導文學興盛可以追溯至七十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由於當時對台灣文學的諸多爭議，進而衍生出知識份子對台灣生存意識的覺醒，也

⁷ 同前註。

對台灣社會的本土關懷有了更具體的認識。

七十年代的台灣，在社會與政治局勢上是有不少變動足以影響報導文學的發展。從一九七〇年底與日本政府爭奪釣魚台主權的問題；到一九七一年，我國因抗議中共加入聯合國故憤而退出；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與中共建交，並取消了一九五二年與台灣所簽訂的中日和約；一九七三年二月，美國國務卿季辛吉訪問中國大陸，華盛頓並於五月與北京互設聯絡辦事處。這些都是發生於七十年代初期的大事記，一向與我國友好的美國、日本，紛紛變節求去，如此轉變，讓國人驚覺國際情勢的瞬息萬變，的確令人措手不及。

這些台灣史上極具衝擊力的事件，雖然曾經讓人覺得錯愕與不平，但也讓台灣人民重新認識了屬於自己的土地與民情，正由於這樣的觀念，台灣文學的發展也才有了更開闊的空間，建構於台灣文學發展基礎之上的報導文學，也因為歷史發展的軌跡而有更大的支持性力量。

反映社會現實是報導文學的重要特性，七十年代產生的社會問題與政治變革，伴隨著時代的變遷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尤其是與切身相關的各項議題，如貧富差距、色情氾濫、勞工問題、環保公害、原住民與弱勢族群等問題，都是當時報導文學取材的重要指向。透過報導文學對現實層面的書寫，不只讓大眾有了新的資訊來源管道，也讓人性關懷有了不同的出口。當然，七十年代的文學思潮與社會時事結合，也開啟文學創作多元化的新頁，報導文學的社會功能性再次被證明。

除了社會情勢的變遷，傳播媒體推波助瀾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除眾所周知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與《聯合報》之外，還有不少文學雜誌投身其中，但是報紙副刊的傳播途徑卻是最為快速且有力的。就文學的傳播特性來看，台灣報紙的副刊的確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由於報業本身的改革風氣，連帶使得副刊的編輯取向做了調整，從原本的純文藝為主，加入了更多元的題材，配合了新聞時事與生活休閒，再輔以適度的美術編輯，讓副刊的面貌有了全新的美感，對提升副刊在報業的編輯份量，與讀者心目中的比重是有加分的功用。

受過新聞專業訓練的高信疆，在設定「人間副刊」的編輯取向時，便嘗試透過副刊媒介的運作，來達到文學傳播的功用。以往傳統副刊採取的是「靜態編輯」，但在「人間副刊」則改為「動態編輯」，也就是在稿源上，可以預先做好議題的設定，然後進行邀稿的動作，運用不同角度的來稿妥善加以規劃、編輯，再以專欄方式推出，以凝聚讀者目光的焦點。⁸

「現實的邊緣」專欄，就是在如此規劃與包裝下推出，深獲好評，進而掀起了七十年代台灣報導文學的風潮。接下來報刊雜誌所跟進的報導文學作品或專欄，大多脫離不出這樣的模式，報導文學與報紙副刊的互相依存，可見一般。追溯高信疆顛覆傳統副刊的編輯方向，進而帶動報導文學的潮流，或可從其所建構出副刊論述，略窺一二：

- 一、 它必須是一扇窗戶，為我們的文學、人生和讀者開一個源頭活水，讓大家看到五光十色的思潮流變，展示不同的創作和表現。
- 二、 副刊也應該是一座橋樑，一方面是報紙和讀者之間的溝通，也是報紙和作者之間的溝通，同時也是作者和作者之間的溝通。正由於溝通的存在，報紙（副刊）才能真正地掌握它作為一種輿論工具的意義，連繫起大眾，為這時代作一個見證。
- 三、 副刊還應該是一面旗幟，它應該是一個理想的呈現。換言之，副刊編輯的理想和方針，就在於它打算為這個時代作什麼及如何表現的問題，藉以吸引讀者和作者形成一個共識體，凸出其時代個性，完成時代風格。⁹

⁸ 此觀念係引自向陽所著之「副刊學的理論建構基礎——以台灣報紙副刊之發展過程及其時代背景為場域」，該文收錄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之《文學與傳播的關係》，台北市：學生書局，1995年6月，頁208。

⁹ 詳見林淇漾，《文學傳播與社會變遷之關聯性研究——以七十年代台灣報紙副刊的媒介運作為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12月，頁145、146。

透過高信疆本人對副刊編輯理想模式的敘述，可以發現他希望能藉由副刊的傳播路徑，達到文化與社會結合，對歷史傳統與現實環境加以整合與協調，以期能夠取得理想與現實的平衡。而這種編輯的新思維，不僅帶動副刊的改革風氣，也讓報導文學有了發展的園地，對文學與傳播兩方面來說，都是革命性的作法。

報導文學興盛的原因，不只因為其切合社會脈動的特性，還有傳播功能的助力，另外一方面來自一種新文學觀念的確立，與新審美價值觀的生成。

隨著科技革命的不斷延伸，文學的樣式也隨著時代潮流而有所變化。跳脫出傳統散文寫作型態的報導文學，也是因應時代變遷所產生的新興文類，此文類的特性，除了一再被提及的真實性與文學性之外，我們嘗試用另外一個角度來解析。李炳銀曾經提到「崇實文學觀」的建立，有助打破原有的文學觀念，進而讓報導文學成為一種開放性的文學，貼近民眾的喜怒哀樂。

文學這種嚴重虛化的結果，促進了崇實文學觀念的建立，使紀實性文學被重視和推崇空前明朗和堅定。紀實性文學在全球文學領域中的興起和盛行，就是文學對這種新的崇實觀念的適應。¹⁰

所謂的「崇實文學觀念」，其實也就是真實性的建立。由於報導文學真實記錄了生活中的面貌，與民眾並沒有遙不可及的距離，再加上創作者往往將自身投入特定的議題裡，更讓報導文學的真實性顯得格外受到重視與強化。因為崇實文學觀的確立以後，讀者在文學的審美過程中，產生了新的價值取向，這個新的審美價值觀，也深深影響了報導文學的發展。

¹⁰ 見李炳銀，《當代報告文學流變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頁

讀者的文化水平不斷提升，對文學作品的品質要求也日益增高。雖然有不少小說或詩歌作品，內容不乏借助虛構手法來豐富其藝術感染力，仍然吸引不少基本讀者群眾，但是這並不意謂讀者就可以全盤接受那些在創作內容與素材乏善可陳的粗糙作品；相反地，讀者往往會將閱讀的習慣做適度的調整，轉向那些運用了真實的生活現象，透過藝術形式表現的紀實性作品，這也就是報導文學之所以能吸引人之處。真實性的特徵，不只可以挑動與誘發讀者的閱讀興趣，也讓讀者在對作品的審美判斷有了新的體認。

由於讀者的審美觀念日趨轉變，創作者以及作品所呈現的風格與題材是否能更貼近民眾生活，也就成為創作的基本要求之一。創作者要能夠在寫實的素材之中，運用藝術的手法加以表現，而非一味地以批判為主要訴求，才算得上是吸引讀者目光的要素。透過這樣的表現風格，不僅讓報導文學的開放性適時的擴展，也為它的社會性提供了更有利的條件。所謂的崇實文學觀，正是一種以真實記錄、藝術表現的文學作品的新觀念取向，而這種新的觀念取向，也是讀者審美價值與審美感興的新取向。

從社會情勢的變遷、政經生態的轉變，到傳媒的新型態以及新文學觀念的建立，在主客觀環境的條件限制下，通過不同面向的解析，不同角度的思維，可以看出報導文學的輝煌時期的風光，並分析其興盛的原因，從而明瞭報導文學為何能躍居七十年代文壇主流，成為重要的文類之一。

第二節 報導文學的弊病與危機

報導文學一直被視為沒有可以依恃的理論基礎，也缺乏相關的方法的研究。¹¹但這樣的論點是否就足以概括將其視為報導文學的弊病，尚難論斷，不過，從時代不斷變遷的脈動，可以發現報導文學在發展的過程中，所衍生出的問題以及引發的式微危機，是有探討的必要。

一、 報導文學的弊病

台灣的報導文學在經歷過風光的歲月之後，陸續出現了令人感到憂心的問題。首先是在相關理論的建構爭議，高信疆在《試探 問題與可能》一文中，提到報導文學缺乏相關理論依據，是為一大缺失，但他也同時提出可以從社會學的角度加以補充，包括田野調查、史學研究與社會學研究法等，都是可以補足且加以發揮的方法。¹²有關方法論的爭論，在向陽、須文蔚主編的《報導文學讀本》中，也曾在導論中提出了「鬆綁理論」，強調的報導文學不像純淨新聞寫作具有一定的形式，如果有必要，可以運用小說的模式加以敘述書寫。這些論點在爭議不斷的理论建構基礎上，雖然也曾引起質疑，¹³但不可否認，太過執著於文學理論的解析，反而容易讓作品處處受限；反之，用一種宏觀的視野去觀察與書寫，報導文學作品的揮灑空間將會更開闊。

樹立真正具有文學價值的報導文學作品的標準，並非易事，如果拋開理論的爭議，回歸到創作作品本身，或許可以從文本的取材與寫作類型、手法來分析報導文學在創作與發展過程中的弊端。在三、四十年代羅蔭就已率先提出報導文學的缺陷：

¹¹ 詳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印《文藝座談實錄》，收錄高信疆，《試探 問題與可能》，1983年2月6日，頁436。

¹² 同上註。

¹³ 在「2002年兩岸報導（告）文學的發展與未來研討會」中，論文發表人楊素芬曾對「鬆綁理論」提出質疑。其觀點為「報導文學的理論基礎尚稱不足，

- 第一、對於現實事件的認識不夠，分析力和理解力都還不夠充份，因而不能夠表現所報告的事件之間得矛盾的因果。
- 第二、由於上述的第一個原因，以致於作者單純的報告了一些特殊的偶然的事件，卻不能使讀者從這些特殊的偶然事件中找出它的一般性與必然性的關係。
- 第三、認為一切現象都是可以作為報告的素材，於是不加選擇的把任何事件都「客觀」的報告出來了，這結果頂多是要做原料堆棧，卻不是報告文學。使人只看到個別的片斷的敘述，卻不能使讀者從這裏取得一個完整的印象。¹⁴

羅蓀在當時就已經看見報導文學所產生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歷經時間與空間的改變後，部份缺失依然存在。尤其當創作者在對事件本身的透析力與理解力仍有未盡周延時，作品所呈現出了力度與廣度就會顯得不足，對讀者而言，吸引力也相對薄弱許多。

其次，在報導文學的「文學性」與「新聞性」能否徹底調和，也是不容輕忽的重點。不少報導文學作品，對於「文學」與「報導」之間的分寸尚難掌握，對於資料的搜集剪裁與對問題的認知程度，都影響了作品的品質內容，這又可回歸到羅蓀所說的「對於現實事件的認識不夠，分析力和理解力都還不夠充份，因而不能夠表現所報告的事件之間得矛盾的因果。」唯有在對事件本身做了相當程度的探討與分析，才能在「文學」與「報導」的領域中，運籌帷幄，書寫自如。

除了羅蓀早先提出報導文學的缺陷外，近期則有學者林燿德觀察了報導文學發展的流變之後，從實證的觀點下發現了若干缺憾，以致影響與削

何來『鬆綁』之說呢？」

¹⁴ 見《現代散文理論》所收錄之羅蓀，談報告文學，台北：蘭亭書店，1986年10月，頁288。

弱了它們的社會功能，也連帶影響了文學的創作力。林耀德所討論報導文學缺憾的重點大致可分為：（一）過度的適應性、（二）氾濫的抒情性、（三）牢固的意識型態、（四）浮誇的說教心態、（五）因襲的舊觀念、（六）難產的新生代。¹⁵

從林先生所發表的論點中，對照現今報導文學發展的狀況，可以發現這些問題的存在的確左右了寫作的方式、態度與取材。由於報導文學直接涉入社會的程度頗深，再加上應備的新聞性原則，這讓作品的選材方向有了隨波逐流的趨勢，作者的寫作熱情與對事件的觀察層面可能只會隨著新聞的熱度而起伏。另外，由於報導文學的書寫型式與表達方式多半已成固定的模式，這也會讓作品有著無法突破舊有窠臼，而淪為一種陳腔濫調。不可否認，報導文學仍有特殊的功能性存在，不過，任何一種文類如果無法自我超越，只會讓所有作品都陷入因循苟且的景況。台灣的報導文學長期處於這樣的狀況下，也是阻礙其發展的原因之一。

寫作題材的開拓與否，可算是報導文學發展到一定極限的最大盲點，在「聯合報文學獎」與「時報文學獎」的決審意見中，不只一次提到必須廣泛地汲取新題材與開拓新的視野，並反應社會的主流意見。¹⁶如此看來，當寫作的有限題材，無法滿足創作者的書寫空間，這也是對報導文學發展的一大致命傷。

除了寫作與題材產生的問題之外，傳播媒體所扮演的角色也有其影響力。部份傳播媒體為因應編輯的取向，對作品的要求有了若干限制，由於報禁解除之後，文學性副刊隨著出報張數的增加而有所改變，不少版面為取得較高的閱讀率，於是將編輯的取向放在通俗性較高或者以反應民意為主的大眾論壇之類的相關版面。現代報業的發展趨勢，以「報系集團」式

¹⁵ 有關林耀德所持論點，詳見林耀德，〈台灣報導文學的成長與危機〉，《文訊》，29期，1987年4月，頁159-162。

¹⁶ 有關「聯合報文學獎」與「時報文學獎」之決審意見，可參見楊素芬，《台灣報導文學概論》附錄，台北：稻田出版社，2001年9月。

為主，¹⁷各報雖然獨立作業，但主事者卻往往具有決定性的權力可以主導編輯的走向。因此，文學性副刊的存在價值也就容易因為閱讀率的高低與否而左右。

再者，受限在版面的框架下，副刊的選文往往以小品為多，長篇的論述吸引力相對減弱，這樣的改變，終讓台灣的報導文學除了題裁與寫作型態的缺失外，還加上受到媒體的編輯取向的影響，事實上，這些限制都是台灣報導文學發展的弊病。

二、 報導文學的危機

被視為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時報文學獎」，在一九九八年的報導文學獎項，破天荒以「得主從缺」的方式揭曉，引起不小的震撼，也引起文壇一片嘩然，不少人因此認為報導文學的風光不再，甚至逐漸走入歷史的盡頭。自從「得獎者從缺」這項引起震撼的評審結果出爐之後，對寫作者便構成了相當程度的打擊，而這樣的打擊在第二十一屆聯合報報導文學獎（1999）宣告暫停與次年的第二十三屆時報報導文學獎（2000）緊跟著畫下休止符後，更是達到一定程度重大挫折。

對於「時報文學獎」中報導文學獎項得獎從缺所引起的諸多爭議，該屆時報文學獎評審曾提出說明：由於投稿作品的內容多半侷限於已開發過的題材中打轉，未見新意，為了對這項具有優良歷史傳統的獎項表示敬意，同時秉持「寧缺毋濫」的原則，才會選擇做一隻不討喜的烏鴉。¹⁸從評審的意見中可以看出文學題材的窄化，儼然成為報導文學的一大危機。楊澤在《手槍王》的序中，曾寫道：

¹⁷ 「報系集團」係指不同報紙由相同一集團所經營，猶如財團旗下的分支機構，如「聯合報系」包括《聯合報》、《聯合晚報》、《經濟日報》、《民生報》、《星報》；「中時報系」計有：《中國時報》、《中時晚報》、《工商時報》；「自由報系」有：《自由時報》、《台北時報》等。

¹⁸ 詳見徐淑卿，〈報導文學死了嗎？〉，1998年10月8日，《中國時報》第43版。

在此資訊文化眾聲喧嘩的年代，報導文學可以了解各類次文化現象的利器，正宜往更深細周密的路子去。¹⁹

選材的深度與廣度，以及創作者本身對問題的投入程度，在在都影響了報導文學的創作觀點，當社會開放與傳播媒體型態改變，報導文學創作者更應該在作品中與時代有所呼應，而非一味地在固定的意識型態中打轉。如此一來，報導文學的創作路才不會立刻受到影響。

除了報導素材的範圍受限之外，媒體的結構變動與社會脈動的趨勢轉變也是報導文學沒落的重要原因之一。當報禁開放後，各式媒體如雨後春筍紛紛冒出頭來，中國時報與聯合報不再是唯二的強勢平面媒體，而兩大報文學獎的發表舞台遽失，讓報導文學的創作者因為發表空間緊縮，也使得不少創作者受到衝擊。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觀察文學獎項的省思，報導文學獎的徵文字數上限逐年減少，從原先的二萬八千字一直縮減到八千字上下，作品的優劣並非全然取決於字數的多寡，但是不可否認，字數的確影響了作品對事件內容深度與廣度的探索，書寫的空間遽減，連帶也使作品呈現欲振乏力的狀態。

正因如此，報導文學創作者處於一種矛盾的心態，既希望能藉由文學獎的肯定，卻也擔心無法突破自我。如何能在創作舞台與創作動力中取得平衡，不僅左右了創作者的寫作生命，也同時主導了讀者的閱讀意願。究竟是否需要憑藉文學獎來加以肯定自我？或是透過不同形式的書寫表達與傳遞「值得被深度探索與報導的事件」，不單是考驗著作者與讀者，也考驗著評審對報導文學作品的鑑賞能力。

台灣的報導文學發展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它是一種真實存在的文體，也是一種切合社會脈動的新文類。由於報導文學所強調的真實性，必

¹⁹ 參見楊澤主編《手槍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10月。

須包含「歷史的真實」與「文學的真實」，²⁰而這二者的真實又必須融入文學的因子，所以除了題材未能推陳出新的缺失外，寫作的手法也成了討論的重點。在「文學」與「報導」的灰色地帶，曾一度讓時報文學獎停辦報導文學獎。²¹而停辦的原因在於文類不清楚，當時的《人間副刊》主編金恆煒指出：

因為報導文學在文類上很難定義，因此有的作品寫得很像學術論文，有的則像報導，而主辦者也很難提出一個可以作為範式的標準，因此才做了停辦的決定。²²

報導文學所面臨的式微危機，除了文學獎項的因素與本身創作瓶頸之外，另一個重點則是媒體的奧援不再。副刊的發表空間縮減之後，報導文學不再受到編輯的青睞，在加上以報導文學為職志的《人間》雜誌停刊，更讓報導文學的發展雪上加霜。其次，是報導文學在創作的過程中，往往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與心力在觀察與分析的工作，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誘因與後援，恐怕對創作意願的影響也是不小。

基於對報導文學發展的現實問題與客觀環境的考察，可以發現台灣的報導文學在寫作與選材上，由於受到市場機制的牽引，讓作品表現出一種單純反映時事的刻板印象，對於原始的創作動力已然呈現疲態。南方朔在一九九九年時報文學獎得獎作品的決審意見中，開宗明義提出：

如同小說的寫作必須講究題材的創新，報導文學則應注重關懷面向

²⁰ 參見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10月，頁254。

²¹ 時報文學獎曾於1983年至1990年連續八年停辦報導文學獎，直到1991年才恢復該獎項。

²² 同註16。

的拓展。蓋有如此，始能免於讓報導文學在定型化之後，無法與時俱進。²³

南方朔的評審意見是針對該年度的得獎作品，由楊樹清撰文〈消失的衛星孩子 - 世紀末台灣小留學生的東西碰撞〉的評述。在該篇評論中，以「拓展了關懷面向」為題向外延伸。

楊樹清的取材方向，來自長時間對台灣小留學生議題的觀察。由於小留學日益增多，其中所產生的文化、社會與家庭等各種不同層面的問題，都相當具有深入分析與探究的價值。當大多數作品仍停留在環保、生態、原住民、教育等題材時，這篇頗具新意的作品的確有可取之處，也因為選材上的新穎，反應出了舊有題材的侷限，同時也為整個社會的關懷面向開拓了新的領域。

我們必須承認，台灣報導文學所面臨的危機，總體來說，可算是來自於「過度的應用性」。²⁴所謂「過度的應用性」，不單是面對題材的認知問題，還包括了作者的創作熱情與媒體和讀者的認同感。在報導文學最為風光的時期，有不少作品試圖以報導文學面貌呈現，以換取讀著的目光，但是，這些作品的成熟度與內容品質是否達到一定的水平，則是有待商榷的。

報導文學有如一把鋒利的劍，若能善加運用，就能為當前社會的各項議題加以切割分析。如果，創作者為了提高知名度與閱讀率，而一味地將寫作方向定位在隨波逐流的應用上，反倒將創作過程中最重要的熱忱與內涵棄之一旁，失去對自我提升的要求，恐怕這才是引發台灣報導文學危機的最大隱憂。

²³ 見《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1999年12月12日，37版。

²⁴ 林耀德在〈台灣報導文學的成長與危機〉一文中，提出報導文學的應用性使其高貴也使其墮落。見《文訊》，29期，1987年4月，頁159。

第三節 報導文學的重生

報導文學死了嗎？這是許多人的疑慮，尤其是在一九九八年時報文學獎中以「得獎從缺」，為台灣報導文學的發展投下了極大的震撼。究竟文學獎對報導文學的影響層面有多大？脫離了文學獎的羽翼之後，報導文學會以何種形式出現？新興的傳播媒體對報導文學未來的發展有無助益？本節將針對報導文學如何化危機為轉機加以闡釋說明。

一、 報導文學獎的影響探討

報導文學獎在台灣，起始於一九六六年的國軍第二屆文藝金像獎所增設，不過，真正引領風騷的要算高信疆在任職《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主編期間，於一九七八年的時報文學獎增設報導文學獎項，因為該獎項的設立，也正式宣告報導文學向文壇邁進。

藉由媒體的傳播力量的確有效加快了報導文學竄起的速度，也讓報導文學在台灣蔚為風潮。不過五年的光景，報導文學雖然仍處於方興未艾的局面，但卻也因為該文類的爭議性，於一九八三年停辦。停辦該獎項的原因不明，不過當時的 人間副刊 主編金恆煒對此曾提出說明。²⁵報導文學的種子早已撒下，因此雖然時報文學獎停辦該獎項，但是《中央日報》在一九八九年出現了唯一一次的報導文學獎，也算是為報導文學獎項延續了一絲香火。

到了一九九 年，聯合報文學獎開始了報導文學獎的徵文，而時報文學獎也隨即在一九九一年（第十四屆）恢復了停辦多年報導文獎項。當時的 人間副刊 主編楊澤，對此現象的解讀是：

報導文學獎的恢復，顯示了「人間」對目前複雜多變的現實之體認，及其介入下一波變化的決心。由今年得獎與入圍的作品的優異成績

觀之，報導文學在中文世界仍是一富潛力、衝力的寫作形式。作為一個文類，報導文學糅雜新聞與文學，不免顯得妾身不明，但其揉雜不純，夾敘夾議也正是優點。在此資訊文化眾聲喧嘩的年代，報導文學可以是了解各類次文化現象的利器，正宜往更深細周密的路子去。以往的報導文學有時不免因過份自信而陷入主觀；真相、真理不易明，不易言，充份的調查研究及主、客觀的相互檢證勢必相當重要。²⁶

楊澤此番論點為時報文學獎重啟報導文學大門做了說明。當然，報導文學獎的恢復對許多創作者來說，的確是一大鼓舞，不只是在發表舞台的增加外，也再次喚起了讀者對此文類的重視。楊素芬曾在其著作中推論，時報文學獎恢復該獎項，應該與聯合報之間的競爭有關。²⁷楊氏的論點其實是有其歷史因素的，從兩報創刊之初，便將彼此視為假想敵，不論在編輯與採訪乃至發行網路，都存在著競爭的局面，時至今日，儘管報業的主、客觀環境改變，但二者間的互動依然如昔。因此，當聯合報喚醒了讀者對報導文學的關注焦點，中國時報也隨即跟進，試圖搶回讀者關愛的眼神。筆者以為，這樣的競爭未嘗不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好事，除了刺激兩大報之間的編採水平之外，更讓創作者能夠在更多元的空間中徜徉，對讀者而言，作品的品質透過文學獎的甄選，能夠適度把關，在閱讀上將更具吸引力。

聯合報報導文學獎於第二十一屆宣告終止，而時報報導文學獎也於次年第二十三屆畫下休止符。繼兩大報相繼取消報導文學獎後，報導文學的發展趨勢也就成為眾所關注的焦點。有人質疑深具指標性意義的兩大報文

²⁵ 見本章第二節。

²⁶ 見楊澤主編《手槍王 - 第十三、十四屆時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楊澤，序，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10月，頁9。

²⁷ 詳見楊素芬，《台灣報導文學概論》，台北：稻田出版社，2001年9月，頁200。

學獎，如此大動作的異動，會為文壇掀起一陣漣漪。不過，報導文學獎的影響層面是否真有那麼大，卻也不盡然。在政府普遍提升國民的文化水平之際，各縣市的文化經費預算也相對提高，各地區的文化局，也陸續開辦了地方性的文學獎，如嘉義市的「桃城文學獎」、屏東縣的「大武山文學獎」、苗栗縣的「夢花文學獎」以及彰化縣的「璜溪文學獎」等。這些由地方政府所舉辦的文學獎徵文獎項當中，部份設有報導文學獎項，這對鼓勵全民寫作與推動報導文學的再出發，其實比兩大報文學獎更具實質的效用。不過，地方性的報導文學獎仍有未盡完善之處，其中徵文條件要求作者必須為當地居民，或作品內容必須以當地風土民情為主，這項條件限制，雖然其關懷鄉土、落實本土的立意甚佳，但卻容易作者與作品的視野淪入不夠宏觀的缺憾。

在二〇一二年時報文學獎的徵文辦法中，新增設「鄉鎮書寫」的獎項。筆者以為告別報導文學獎項之後，時報文化仍然持續對台灣本土的關懷，因此「鄉鎮書寫」，雖然強調以台灣的三九鄉鎮為書寫對象，但其實這正是另一種報導文學獎的方式呈現，或者亦可將所謂的「鄉鎮書寫」視為對各鄉鎮的深入探索，這也可以算是報導文學的變身。

不同的時代，文學作品也有不同的風貌，在報導文學的題材逐漸趨向狹隘時，回歸到文史方面的田野調查記錄，已屬必然的趨勢。新聞記者在採訪的過程中，由於接觸層面較為廣闊，因此在創作的空間與資料的來源上，佔有較大的利多因素。雖然缺少了文學獎的加持，但是報導文學關懷社會的內涵卻已落實在許多創作者的心中。近年來，有部份新聞媒體從業人員嘗試在原有的採訪工作以外，開拓另外一條創作的道路，在寫作的方向以報導文學為師，透過平日工作的內容與視野介入書寫，走向比較深度的社區關懷。²⁸

²⁸ 目前任職自由時報嘉義新聞小組的記者蔡宗勳，創作了《說庄頭》與《花跳原鄉》兩本著作，其一是以嘉義新港鄉為寫作主軸，其二則是以作者的故鄉 - 花跳魚的家鄉義竹鄉為主，這兩本作品都是以報導文學的敘寫方式表現，不過，《花跳原鄉》一書並未正式出版。

不過，值得關注的現象是，缺乏文學獎與報刊的發表空間，這些作品的知名度恐怕仍待加強，沒有媒體的強勢宣傳效果，再好的作品也會有無法施展的缺憾。此外，由於作者本身仍處於在職的狀況，對於創作的投入熱情也是影響作品內容的重要因素之一。再其次，有部份平面媒體在製作新聞專題時，會嘗試以報導文學的寫作筆法，以柔性訴求闡述嚴肅的課題，希望能在生硬的新聞報導中，加入更多文學的因子，用軟性筆調喚起讀者的認同。²⁹

出版界近期陸續出版了幾本有關愛與關懷方面的書籍，如鄧湘揚所著《愛在福爾摩沙》³⁰，內容係以描繪挪威阿公徐賓諾與阿媽紀歐惠，如何胼手胝足創建埔里基督教醫院的心路歷程為主；另外，由慈濟義工群所編寫的《一個超越天堂的淨土》³¹，內容以主人翁麻瘋病患金阿伯為第一人稱，對麻瘋病院內的生活情況與病患之間的互動狀況口述，再由慈濟的義工詳實記錄書寫。這些書籍的性質相近於報導文學作品，但是，如果以比較嚴苛的角度來審視，是否能將之歸類為報導文學作品，仍有爭議的空間。惟筆者曾以此問題請教於黃春明先生，黃先生認為所謂報導文學作品不應該拘泥於某些特定的條件，而應以宏觀的角度視之，因此，這類作品在廣義上應可視為報導文學之一。

上述的幾個面向都是台灣報導文學向下扎根與發芽的例證。對於第一代報導文學作家礙於主客觀因素，逐漸退居幕後，我們期許新生代的報導文學創作者能在有限的空間發展無限的可能，也期待因應不同時代的關注焦點，能有更開拓性的題材與作品。台灣的報導文學是否日漸式微，這個答案確是明確且毋庸置疑的，它正以不同面貌與形式展現於你我面前。

²⁹ 《中國時報》在賀伯颱風肆虐之後，面對千瘡百孔的台灣山林，於 85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 日連續三天在第二版推出「山林輓歌」專題報導，引起極大回響，讓林務局以及社會大眾重新認知濫墾濫伐所帶來的生態浩劫。該系列報導擺脫傳統新聞寫作方式，而以一種目擊現場的感性筆調真實呈現。

³⁰ 鄧湘揚著《愛在福爾摩沙》，台中：晨星出版公司，2003 年 4 月出版。

³¹ 陳美羿等著《一個超越天堂的淨土》，台北：靜思文化，2002 年出版。

二、 地方政府文學獎項的擴大影響

從文學獎項的重要性加以延伸，來探討報導文學的存在價值，許多創作者在面臨兩大報文學獎的衰退情形後，對創作的腳步顯得有些力不從心。不可否認，全國性文學獎項的徵文活動的確有其誘因存在，不只外在的名利問題，還包括了創作者本身的自我提升與期許，而這些因素都是激發作品水平的要項。

然而，在全國性的文學獎項（聯合報、中國時報、中央日報）相繼取消報導文學獎徵文之後，由各地方縣市政府文化局所舉辦的文學獎，儼然成為文學獎活動的主流。一般來說，地方性的徵文活動皆以具地理區域特性之地方文學創作手法為準則，也就是說，地方性的文學獎徵文是將著眼點放在以書寫當地之風土民情與人物、文化等各相關議題為主。這個潮流可以從近年來各縣市政府文化局普設地方文學獎，略窺一二。

地方性文學獎的推動，來自於縣市政府對文學創作的支持與鼓勵，目前所知由台灣各縣市政府文化局在預算經費許可之下，大多會秉持提升文化水平、獎勵文藝創作風氣的理念，辦理文學獎徵文活動。茲就各縣市政府所主辦文學獎徵文活動，其徵文項目類別，做成下列附表：（見下頁）

所在地	獎項 名稱	徵 文 類 別					備註
		新 詩	小 說	散 文	報導文學	其 他	
台北市	台北						87~91
新竹市	竹塹					劇本	
新竹縣	吳濁流					兒童文學	
苗栗縣	夢花						
台中市	大墩						
台中縣	中縣						88~91
南投縣	玉山						
彰化縣	璜溪						87~91
嘉義市	桃城						已停辦
台南市	府城					文學評論	
台南縣	南瀛					兒童文學	
高雄市	打狗						
高雄縣	鳳邑						已停辦
屏東縣	大武山						88~91
基隆市	海洋						
花蓮縣	花蓮						
澎湖縣	菊島						
嘉義縣							未舉辦

由上列的附表可以看，地方政府所舉辦之文學獎徵文活動獎項大多集中在小說、新詩與散文三類文體，僅有少數縣市政府對報導文學投注了關注的焦點，不過，這並不影響報導文學有意深耕地方的企圖心。在所有地區性徵文辦法中，都特別強調創作的素材必須取之於地方，這種在地文學其中就隱含了部份報導文學的因子。

各地方文學獎徵文活動多半以發揮傳統人文精神、鼓勵文學創作，進而改善藝文環境，為其主要宗旨。雖然規模不若全國性徵文活動宏大，但其對於提升在地文學創作風氣與對鄉土關懷層面，的確有著不容忽視的地位，對於有志於從事報導文學創作的人而言，此類文學獎的舉辦，不僅多了一個抒發的園地，也藉此更加落實了對地方的關愛與自我提升的契機。

檢視地方政府舉辦文學獎的過程中，可以發現「經費預算」佔了相當程度的比重。以嘉義市的「桃城文學獎」為例，受限於經費不足，僅歷時二屆便宣告腰斬，對嘉義市的文藝創作人來說，實為一大打擊；雖然目前尚有「嘉義筆會」這個組織，但因缺乏經費上的奧援終至無法發揮功能，實在令人扼腕。相較之下，由彰化縣政府文化局主辦之「璜溪文學獎」，至今已歷數載，不僅未見其有衰退情形，反見其日益蓬勃，而且歷年來文學獎得獎作品均集結成冊出版；苗栗縣「夢花文學獎」也是相當值得肯定與參考的對象。地方政府的協助與支援，除了肯定文學創作者對鄉土關懷之外，更可以藉此宣揚政府的文化政策，如此一來，不僅對創作者與讀者開發了更廣闊的書寫與閱讀空間，也讓地方政府的文化水平得以相對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二〇〇二年首次由高雄市政府、高雄縣政府與屏東縣政府所合辦的「高高屏海洋文學獎」；這是第一個結合不同地方政府所辦「跨區域」文學獎，而且是首度舉辦的主題性文學獎。³²這一個特殊的文學獎項，走出了單一地區性文學的場域，對南台灣整體的創作風氣提升具有相當的助益，從地方政府的文學獎影響來看在地文學的發展，「高高

³² 有關「高高屏海洋文學獎」資料，係參考自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之《2000年台灣文學年鑑》，台北市：文建會，2002年4月，頁30。

屏海洋文學獎」是有其值得開拓的空間。

從媒體文學獎的停辦，到地方政府文學獎接手，我們看到的是不同形式的傳承。地方文學活動的蓬勃發展，更有助報導文學在各地區生根並且深耕。雖然，部份縣市政府因故取消文學獎徵文活動，但我們仍然樂見報導文學並未消逝，而是以一種更貼近你我、更關懷本土的精神在自己的土地上重生發芽。我們期許報導文學能在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更加茁壯，以全新的面貌重新出發。

三、 新興媒體的影響

隨著報業的解禁腳步之後，電子媒體的發展更是日趨蓬勃，電台、電視台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再加上網路的普及化，電子媒體挾其迅速與方便的競爭優勢，快速引領大眾傳播的前進方向。在電子媒體發展初期，由於受到新聞時效的壓力，因此在傳播的取向上傾向於先要求快速，其次再求正確，然後才講深度與廣度。一般的閱聽人在接收訊息的時間縮短以後，往往受到新聞報導左右，忽略了對新聞事件正確與翔實的原則的基本要求。

閱聽人在選擇接收訊息來源時，常容易陷入一種情境模式，由於傳遞的管道使然，一般閱聽大眾往往會被傳播媒體所牽引而不自知。在文學傳播的途徑中，如何能夠運用強勢媒體來加強發展文學，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方向。

大眾傳播學者馬奎爾 (Denis McQuail) 曾在論及媒介作為一種「有缺陷的意義機器」(media as a defective meaning machine) 時指出，大眾傳播主要圍繞在「意義的給予和取得」，雖然最後的結果通常是無能為力的。但是，傳播本質上就具有「創造性、互動性和開放性」，因此，有「意義」的結果「通常是經過協商而來，且

無以預言」。³³

在傳播學的領域當中，所有的訊息來源都必須要有明確且無誤，在媒體釋放訊息（sender）的同時，必須要經過不斷地篩選以及過濾，才能讓接收者（receiver）適時明瞭整個訊息的正確情況。傳播的過程中，並非單方面的收與放，而是二者之間有所互動，取得協調並加以確認傳播模式。因為傳播模式的確立，必須經過雙方不斷協調與溝通，因此，閱聽大眾對傳播媒體的要求，也在不斷地修正中。

處於一個資訊快速發展的時代裏，傳統平面媒體正在逐漸衰退中，取而代之的新興媒體就是日益發達的電子媒體與網路。報導文學長期仰賴平面媒體的發表舞台，一旦面臨衰微的狀態，它還有重生的機會嗎？在路況的文章中對此問題做了解答：

就目前所能看得到的，文學重獲生機的唯一可能拼命寄生於電子傳播媒介主導的文化工業。³⁴

路況先生的論點也正是為目前報導文學所面臨的問題提出說明。當台灣的平面媒體退居弱勢以後，報導文學的發表空間相對壓縮。而電子媒體在經過多年的新聞戰之後，閱聽大眾的知識水準大幅提高，因此對新聞的取捨已然不同，他們拒絕對所有新聞照單全收，對溫馨正面的報導多了些注意力，社會風氣也隨之改變，於是執事者開始思索如何回歸新聞專業的本質，讓號稱第四權的新聞能夠兼顧起社會責任。

³³ 詳見向陽，〈三個瓶頸與兩個途徑 - 當前台灣網路文學傳播問題〉，載於《自由時報》，2003年2月16日，35版。

³⁴ 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文學與傳播的關係》，收錄路況著《從當前傳播媒體的發展看文學的困境》，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年6月，頁263。

電子媒體面對這波的轉變，編輯的取向也有了新的思維，不少新聞台為了配合新聞走向的改革，也開始為台灣這塊土地投注關懷的眼神。不論有線或無線的新聞台紛紛在特定的新聞時段中開闢新單元，利用深度報導或調查報導的方式呈現，內容不外是生態保育、教育文化、原住民等議題。³⁵這些議題都是報導文學在輝煌時期的重要題材，電子媒體運用了強烈的聲光效果，輔以感性的旁白，的確能快速吸引眾人的目光。

不可否認，電子媒體此舉正是向報導文學借火，利用了文學性與新聞性結合的特點，善加規畫與應用，這對報導文學再出發是有實質的幫助。不過，所謂的文學，仍應以文字書寫為主要敘述形式，因此，電子媒體所推出的深度報導單元，雖然為傳統文學帶來不小的衝擊，但是否能將其視為報導文學的一支，筆者以為仍有商議的空間。另外，由於電子媒體在取材與編輯的操作模式仍然以報導文學為標竿，因此似乎有意要將原屬於平面的報導文學強納入聲色效果的電子媒體之嫌，這樣的方式是否妥適，仍須考量電子媒體的表現形式與內容。

除了電子媒體之外，網路的無遠弗屆也是不容忽視的重點，網路快速而高度的互動性，讓文學傳播更趨頻繁與廣泛。網路傳播在台灣，大約起始於九〇年代中期，透過網際網路的傳播科技改變了舊有的傳播特質，傳統媒介的守門人（gatekeeper）角色，在網路時代已不復往日的權威，在網路的世界中，每個使用人都可以同時具備傳播者、接收者與分享者的角色，這個傳播模式對傳統傳播研究是具有相當程度的衝擊。

網路在傳播的速度上遠比報章雜誌為之迅速，在網路日漸普及之際，報導文學躍上網路，以網路作為其發表的舞台，不啻是一項新的創舉。網路的快速與即時的特性，與報導文學的寫作特性不謀而合，因此，或可將其視為報導文學再出發的起點。部份新興的網路族群，由於習慣於網路的訊息傳遞方式，對於傳統的平面報刊不再青睞，報導文學能夠躍然網路的舞台，其實也是切合社會的脈動。

³⁵ 如 TVBS - N 推出「大河戀」單元，以報導台灣河川之美為主軸；中天新聞

不過，網路的傳播模式還是有著待突破的瓶頸。向陽認為，一個新時代的作家，如果只在網路發表其作品，除非是在網路的社群中引起廣泛的討論與重視，否則是難以獲得傳統文學社群的認同。所以新世代作家恐怕不能免俗，必須透過投稿到報刊或出書，甚至參加文學獎等途徑，遵循舊有的文學傳播模式。³⁶這是網路文學普遍存在的現象，也是網路文學迄今尚無法獨當一面的因素之一。報導文學透過網路的傳播，不同於一般的電子媒體。在網路傳播的過程中，報導文學依舊是一個文類主體，仍然保有自身的特點，它所依循的各項準則依然存在，只是轉換了發表的空間，從平面的紙張印刷轉變成為螢幕上的文字，這與電子媒體強行以聲光效果介入表達，是有所差異的。

網路時代的來臨，文學文本與訊息透過網路的傳遞管道，提供閱聽人一個快速取用、自行掌控的方式，其實是相當具有競爭優勢的。不過，大眾對網際網路過高的期待，還是有部份盲點的存在，包括了新舊世代作家互動不足、文學社群與網路社群互動不足、本土文學傳媒與網路文學傳媒互動不足等面向。³⁷如果能夠克服這些問題，網路傳播的功用必能發揮到極致。

在平面媒介引發報導文學式微的危機後，網路的崛起讓報導文學的發展找到另一個出口，而電子媒體的推波助瀾也讓報導文學重新喚回閱聽人的重視。台灣報導文學的重生，不只借重傳統文學獎的鼓勵，也結合了社會的趨勢，融入新興的傳播科技之中。

對於台灣報導文學的發展，我們樂見其在傳統與現代中悠游，也深信透過新興媒體的傳播方式，可以讓更多新生代的創作者與閱聽大眾對此文類有更深刻的認識，並且接受與欣賞。台灣的報導文學需要更多新血輪的投入，不論是由傳統平面媒體主導，或者由新興電子媒體領軍，應該都是

台推出「台灣昆蟲筆記」，內容以台灣現有昆蟲生態習性加以介紹。

³⁶ 有關向陽所提論點，可參見 三個瓶頸與兩個途徑 - 當前台灣網路文學傳播問題，載於《自由時報》，2003年2月16日，35版。

³⁷ 同上註。

並行不悖，互為主體，唯有如此，報導文學才能在台灣持續發光。

第六章 結 論

在文學的場域中，散文是相當重要而且顯著的類型，原因在於它所具備的多元風貌與本質。建構於散文基礎上的報導文學，在台灣歷經二十年餘載的生根與發展，創造出了屬於自己的文學定位。雖然，在文學的分類標準中，報導文學只是附屬於散文所衍生出的新興文類，而且被視為介於新聞與散文間的次文類，但在台灣文學發展的過程中，仍然具有相當的份量。

報導文學的起源除了可以源自於口傳文學的傳播特性外，如果從文學史的角度來分析，大致可區分為中國古典文學、外來文學的移植與現代報刊的推動等三方面。在中國古典經籍的方面，有部份學者曾經探源的觸角可上溯至《詩經》，尤其是「采詩」與「獻詩」的功能。本論文於第二章當中曾經針對中的傳播功能性加以論述，由於「采詩」與「獻詩」是《詩經》在形成的過程之中，十分重要的特點，經由「采詩」的搜集與采錄功夫，讓民間的歌謠得以傳承。其次是「獻詩」，這是由民間彙整各地蒐羅而來的民歌，交由專人統籌處理，「獻詩」部份講究的是可讀性以及啟發性，早年君王為考察時政、體察民情，於是下令各級官員必須進獻詩章，藉此對社會風俗與民情做徹底瞭解，以做為擬訂政策的方針。從傳播角度分析《詩經》當中的「采詩」與「獻詩」，再對照於報導文學，可以發現二者間的傳播特性是有共通之處的。

再看司馬遷的《史記》，內容仍然有著報導文學的傳播特質，這可反映在採訪與實證的層面。然而，最值得報導文學作品取法的是《史記》當中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內容豐富言之有物，而且用字遣詞傾向通俗化與大眾化，讓讀者對作品的接受度相對提高。當然，除了《史記》與《詩經》，筆者嘗試用比較宏觀的角度來探討遊記文學。遊記作品如果能用洗練流暢

的筆調來真實描述記錄遊歷當中的所見所聞，未嘗不能算是報導文學作品。明代徐宏祖的《徐霞客遊記》即是一部相當具有代表性的遊記作品，其內容所錄均為歷年遍訪山川的見聞，足跡遍及大半個神州，與其將之視為遊記文學，不如視其為廣義的報導文學作品更為妥適。

立波在《談報告文學》一文裡，首先提出海涅的《旅行記》可算是報導文學在西方的發源。不過，綜觀此書內容及型態，與《徐霞客遊記》相類似，都可算是遊記文學，因此從宏觀的視野來看，是可以將其視之為報導文學的一支。至於近二十年來的報刊則是將報導文學推向高峰的主要推手，經由報紙副刊的專欄與文學雜誌的刊載，讓報導文學能有充份發揮的空間與舞台，在台灣報導文學的發展進程中，報刊的推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回顧台灣報導文學的發展脈絡，與報業的成長歷史有著密切的關連，這必須從民國以前由朝廷所辦的官方報紙《邸報》說起，《邸報》由於它的官方背景，因此報導內容多為政令宣導式的消息記錄，一直到民初時期，現代化新興報紙的出現，情況才有所改變。不過，創辦初期的報紙，不論是編輯採訪乃至寫作方式都處於起步的階段，因此仍有加強的空間。到了抗戰時期，報業的組織型態與編採模式均逐漸步上軌道，報導文學至此才有了較為明確而有可供發表的園地。

抗戰時期一度是報導文學相當興盛的年代，透過報導文學作品所記錄的戰爭場面與家國意識，引起不少的讀者的共鳴，也為報導文學的風光歲月拉開序幕。但是，當時寫作型態太過於強調事實的描述，對文學的藝術性相對忽略，這也成為當時報導文學的盲點。隨著社會風氣的開放與政治環境的變遷，脫離了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不只是在政治上獲得重生，在文學發展的流變過程中，也產生了許多新的變化。

光復後的台灣報導文學曾經有過一段時間的空窗期，這當中僅僅仰賴少部份人士的文史記錄工作，也算為台灣的報導文學維持一絲的命脈。初回祖國懷抱的台灣，嘗試為屬於本土的語言文字與文學創作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於是台灣文學的輝煌時期自此展開。伴著台灣本土文學的成長，

報刊的發展也日益蓬勃，除了報紙之外，不少文學雜誌也相繼出刊，為台灣文學的創作道路開啟了新頁，並連帶影響了日後的文學論爭。

七十年代文壇的重頭戲是由關潔明與唐文標所引發的鄉土文學論戰，這場歷時多年的鄉土文學論爭，從《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點燃戰火，延燒了七十年代的台灣文壇，它所面臨的不僅是文學上的衝擊，還包含了政治因素的考量，與社會脈動的結合。報導文學在經歷長時間的斷層之後，卻因為鄉土文學論戰當中引發的諸多話題而找到新的出路。在後期的報導文學題材類型當中，有不少作品是源自鄉土文學論戰中對本土關懷的議題。隨著解嚴以及報禁開放，不論是在取材或是發表園地上，報導文學都有了更開闊的伸展空間。至此，台灣的報導文學再度躍上舞台，重新展現於讀者面前，並且蔚為風潮。

報導文學之所以能夠形成風尚並吸引讀者，在於它獨特的社會性、文學性與新聞性。報導文學是一種介於新聞報導和文學作品之間的文體，它結合了社會的功能性與批判性，並且真實地反應事實的真相，有別於傳統文學創作往往夾雜著虛構的成份，如此的寫作風格讓報導文學在現代文壇迅速竄起。報導文學在書寫上，除了講求時效與真實之外，在寫作的技巧與語言文字的運用也有其特出之處，報導文學雖然建構在散文的寫作基礎上，但與一般散文仍有所區隔；作品結構與修辭都是傳統散文寫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報導文學為反映事實真相在語言文字的層面趨向質樸與通俗，但在寫作的技巧上卻又巧妙地結合了新聞寫作與小說的架構鋪陳，這樣特有的書寫方式讓報導文學能夠快速擷獲讀者的目光。

「昨日的新聞是今日的歷史」，由於報導文學的寫實特色，正好彌補了新聞報導為求快速卻不夠深入的缺憾；新聞報導所傳遞的訊息往往只是比較表相的事件層面，因此對於部份值得深入追蹤分析與探討的議題，經常受限於版面及時間的壓力而顯得力不從心，報導文學的出現對新聞界而言，正是令人感到喜悅的消息，除了可以補足速食新聞的深度外，還可以對新聞事件做多面向的探討。事實上，有不少報導文學創作者本身具有記者的新聞背景，這個創作的背景因素更強化了報導文學的新聞深度與廣

度。在文學的藝術性方面，李炳銀指出報導文學藝術化的過程和目的，實際上就是使真實更充份地顯現出來並說明更多的問題。在這裡，真實本身就是藝術性的基礎和終點，是文學藝術性最重要的支點。¹

對於報導文學除了文學的寫實性與藝術性以外，開放性也是吸引讀者不可或缺的要項，作品的內容除了要站在讀者閱讀的角度為出發點，也應該讓讀者能產生同理心，並且能夠以多重角度的視野看待事件的本質，如此一來，報導文學的文學特質才能不拘泥於傳統的刻板印象。

七十年代以後，報導文學的輝煌時期，培養出不少優秀的創作者，也產生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這些作品結合了傳播媒體的強勢運作機制，成為風靡一時的文學思潮。媒體對報導文學的推波助瀾不單是提供發表的版面，更重要的是文學獎項的設立，讓報導文學創作者有了更實質的鼓勵，並且擴大了此一文類的價值，進而提升作品的品質。經由文學獎的徵文活動，除了發掘更多的創作者以外，作品的水平也隨之提升，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學獎的設立的確有其正面的意義。

帶有濃厚時代色彩的報導文學經過多年的風光歲月之後，隨著社會腳步的開放逐漸開始式微。表面上看來似乎與報刊編輯取向調整相關，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質疑報導文學獎項取消也是造成此類文體沒落的主因。但是深究其中，可以發現許多創作者在寫作取材上日趨狹隘，加上對問題意識的認知不夠明確，以致讓作品產生了僵化的思維，缺乏原有的熱情與關懷，而這些問題恐怕才是引發報導文學式微的主因。另一個值得觀察的重點是文學獎的重要性被過份強調，報導文學雖然仰賴報紙副刊的發表園地以及文學獎項的滋潤，但是創作的熱情與理想並非建構於獎項的頒發，而是源自於作者本身情感的投入與對社會的關懷。因此，文學獎的影響力是否足以撼動報導文學的地位，答案是昭然若揭。

正當報導文學逐步走向沒落之際，由各縣市文化局所主辦的地方性文

¹ 見李炳銀著《當代報告文學流變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頁24。

學獎徵文活動，為此文類的廣續帶來新的契機。地方政府舉辦之文學獎由於落實在地文化的準則，因此在取材上也就更貼近地方人、地方事與地方物，這對鄉土關懷的層面是具有正面意義的；其次是地方文學獎的舉辦對提升各地的藝文創作風氣具備了鼓勵的作用。雖然，在部份地區曾遭遇挫折，但仍不減其風華。而時報文學獎在二〇〇二年新設「鄉鎮書寫」獎項，筆者大膽以為這類將書寫重點放在本土的關懷的獎項，其實可以視為對各鄉鎮的深度探索，而這也正是以不同面貌呈現出新式的報導文學，對照地方性文學獎的重要性而言，時報文學獎再度開啟了報導文學的嶄新風貌。

觀察台灣報導文學的發展脈絡，新興媒體的出現對此文類的重生產生了相當的助力。首先是電子媒體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各式新興的電子媒體從新聞的競技場上回歸深度報導的取向，於是在製作專題的過程中不斷向報導文學借火，透過聲光效果與影像結合的搭配運用，電子媒體成功地將新聞戰場移轉至以關懷為主的專題探討。雖然，專題式的深度報導並不具備文學的基本樣式，但在廣義的層面來說，它所特有的新聞性、真實性與文學的抒情性，都是報導文學的重要特質，透過畫面的呈現，閱聽人的接受度相對提高，訊息的傳遞與散佈也更為快速直接。

新興媒體快速的傳播特性，反映在網路的連結上最為顯著。傳統的文學傳播模式正逐漸被改寫當中，由於報業經營型態的調整，報導文學賴以發表的舞台——報紙副刊，其專業性與重要性在報紙版面的比重上，已漸漸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網路發展的蓬勃局面。自一九九九年開始，現有的主要報紙紛紛將報紙內容轉為網路資訊，電子報的成立與網路副刊的出現，²讓資訊的流通更加順暢與便捷。對網路社群而言，電子報與網路副刊的出現，讓閱讀的方式不再侷限於文本與紙張，螢幕上的畫面是比傳統紙

² 現有主要報紙的電子報：《中時電子報——人間副刊》（<http://www.chinatimes.com.tw>）、《聯合新聞網——聯合副刊》（<http://udnnews.com.tw>）、《自由時報電子新聞網——自由副刊》（<http://www.libertytimew.com.tw>）。

張印刷具有吸引力。對創作者來說，平面媒體的發表空間被壓縮之後，能在新興的媒介當中另闢疆土，也算是重大突破。

正如唐詩、宋詞一樣，報導文學因應時代而產生，也曾引領風騷一時。但在時不我與的情況下，如何重新站起再造新局？這已是當前值得重視的課題。報導文學的強烈現實性牽引著創作的方向，但是在情境因素排除以後，仍然必須回歸到文學創作的原點，只有文學性強而且筆觸細膩的表現手法，才能成為雋永的文學作品，報導文學作品也是如此。儘管依附於媒介而生的報導文學被賦予各種不同面貌出現，但其主體意識仍不脫真實與非虛構的原則，在此前提之下，吸收其他文類的寫作技巧與特點，將使得報導文學的豐富性更為顯著。

曾經，因為文學獎徵文獎項取消「報導文學獎」而遭到質疑，是否報導文學風光不再，日漸凋零。然而事實上，台灣的報導文學並沒有真正的消失，只是在主客觀環境的影響下，它的演進歷程曾經令人感到憂心，然而透過了不同的傳播管道，報導文學又再次展現出活力。展望台灣報導文學的前景，不必持過份悲觀的態度，因為它所具有的時代性會為自己找到新生命的出口。我們期許在新世紀的台灣報導文學能夠在人文關懷層面加注心力，為這片土地盡心耕耘，讓創作者與讀者都能以全新的眼光重新看待屬於自己的土地。報導文學的永續法則，除了將書寫重點從批判轉移至關懷之外，更要提升「質」與「量」的部份，然後針對作品內容的深度與廣度加以著墨，是為其要項。

綜觀台灣報導文學的研究面向，仍然將重心放在理論基礎之探討，反而忽略了整體的論述，是為缺憾。反觀大陸方面已陸續對報導文學理論提出說明，並且對台灣的報導文學研究概況知之甚詳，未來如能針對兩岸之間的報導（告）文學的差異性，做出分析與探討，相信對此等文類的具體研究成果將會更為豐碩。

〔參考論著〕

(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列)

【專書類】

《詩經》，十三經注疏本，台北市：藝文印書館，1979年。

《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台北市：藝文印書館，1979年。

班固，《漢書》，台北市：鼎文書局，1979年11月。

司馬遷，《史記》，台北市：鼎文書局，1979年11月。

丁曉原，《文化生態與報告文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8月。

丁曉原，《20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理論批評史》，安徽：安徽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文學與傳播的關係》，台北市：臺灣學生書局印行，1995年6月。

方祖燊，《方祖燊全集（十）散文理論叢集》，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7月。

方怡文、周慶祥，《新聞採訪理論與實務》，台北市：正中書局，1997年12月。

王明通，《漢書導論》，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

朱艷英主編《文章寫作學 - 文體理論知識部份》，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4年11月。

尹均生、楊如鵬著，《報告文學縱橫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印，《文藝座談實錄》，1983年2月。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8台灣文學年鑑》，1999年6月。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9台灣文學年鑑》，2000年10月。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0台灣文學年鑑》，2002年4月。

羊汝德主編，報學叢書第四種《採訪與報導》，台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77年1月。

向陽、須文蔚主編，《台灣現代文學教程 報導文學讀本》，台北市：二魚文化，2002年8月。

朱錦翔、呂凌柯著《中國報業史話》，河南：大象出版社，2000年8月。

朱傳譽，《先秦唐宋明清傳播事業論集》，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12月。

李炳銀，《當代報告文學流變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

李正治主編《政府遷臺以來文學研究理論及方法之探索》，台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11月。

李茂政，《當代新聞學》，台北市：正中書局，1977年9月。

李麗瑩、李先鋒，《中國現代報告文學史論》，寧夏：寧夏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

柏 楊主編，《中華民國文學年鑑 1980》，台北市：時報化出版公司，1982年11月。

余樹森 陳旭光，《中國當代散文報告文學發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8月。

呂正惠，《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市：新地文學出版社，1995年7月。

- 沈 謙，《修辭學》，國立空中大學，1990年7月。
- 何金蘭，《文學社會學》，台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8月。
- 何 欣，《當代台灣作家論》，台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83年。
- 何寄澎主編《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 5 散文批評》，台北市：正中書局，1998年3月。
- 封德屏主編《台灣文學中的社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6年6月。
- 武漢師範學院中文系、《長江文藝》編輯部 編《報告文學選》，1979年7月。
- 林文賢、林素姛、林淑真、周慶華、張堂錡、陳信元合著，《台灣文學》，台北市：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1年8月。
- 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台北市：里仁書局，1987年。
- 周鳳五編著《現代文學欣賞與創作 中冊》，國立空中大學，1991年9月。
- 周政保，《非虛構敘述型態 九十年代報告文學批評》，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年9月。
- 柯慶明，《中國文學的美感》，台北市：麥田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1月。
- 施淑，《兩岸文學論集》，台北市：新地文學出版社，1997年6月。
- 涂公遂，《文學概論》，台北市：五洲出版社，1989年8月。
- 徐 學，《台灣當代散文綜論》，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年10月。
- 高天生，《台灣小說與小說家》，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4年12月。
- 孫如陵，《報學研究》，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76年9月。
- 密蘇里新聞學院教授群著 李利國、黃淑敏譯，《當代新聞採訪與寫作》，台北市：周知文化、佛光大學 聯合出版，1997年1月。

陳芳明，《典範的追求》，台北市：聯合文學出版社，1994年。

陳孔立編《台灣研究十年》，台北市：博遠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11月。

馮光廉主編《中國近百年文學體式流變史 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

馮光廉主編《中國近百年文學體式流變史 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學系主編《第三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市：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2002年7月。

張健，《文學概論》，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年12月。

張誦聖，《文學場域的變遷》，台北市：聯合文學出版社，2001年六月。

張春寧，《中國報告文學史稿》，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7月。

張德明編，《台灣報告文學選》，湖南文藝，1998年。

尉天聰，《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80年。

華倫、韋勒克著 王夢鷗、許國衡譯《文學論》，台北市：志文出版社，1992年12月。

曹聚仁編《現代中國報告文學選 甲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參考資料，翻印本，未註出版年代。

曹聚仁編《現代中國報告文學選 乙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參考資料，翻印本，未註出版年代。

須文蔚，《臺灣數位文學論》，台北市：二魚文化，2003年4月。

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縣：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6月。

楊素芬，《台灣報導文學概論》，台北縣：稻田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9月。

黃美英，《台灣文化斷層 現象評析》，台北縣：稻鄉出版社，1996年9月。

彭家發、馮建三、蘇蘅、金溥聰 編著，《新聞學》，國立空中大學，1998年9月。

彭家發譯著，《新聞文學點 線 面》，台北市：業強出版社，1988年8月。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台北市：學生書局，1987年。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文學界雜誌社，1996年9月。

葉石濤，《台灣鄉土作家論集》，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85年。

趙遐秋，《中國現代報告文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1月。

潘家慶，《新聞媒介 社會責任》，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

魯 迅，《門外文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

董小英，《敘述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6月。

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市：大安出版社，2001年10月。

鄭明嫻，《現代散文現象論》，台北市：大安出版社，2001年10月。

鄭明嫻，《現代散文構成論》，台北市：大安出版社，2000年4月。

鄭明嫻，《當代文學氣象》，台北市：光復書局，1988年4月，。

鄭貞銘，《新聞原理》，台北市：五南出版公司，1995年11月。

樓榕嬌編著、黃天鵬校訂《新聞文學概論》，台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9月校正再版。

蔡念中等合著，《大眾傳播概論》，台北市：五南出版公司，1998年11月。

蔡文輝、蕭新煌主編，《台灣與美國社會問題》，台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85年6月。

賴光臨，《中國新聞傳播史》，台北市：三民書局，1992年。

簡宗梧編著《現代文學欣賞與創作 上冊》，國立空中大學，1991年9月。

簡宗梧等編著《現代文學欣賞與創作 下冊》，國立空中大學，1991年9月。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市：華正書局，1998年8月。

龔鵬程，《文學散步》，台北市：漢光文化公司，1988年。

龔鵬程，《文學批評的視野》，台北市：大安出版社，1998年4月。

龔鵬程，《臺灣文學在臺灣》，台北市：駱駝出版社，1997年3月。

《兩岸報導（告）文學的發展與未來研討會》大會手冊暨引言稿，2002年11月。

《第二屆全國研究生文學社會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4月。

Robert Escarpit 著 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12月。

Rene & Wellek 著 梁伯傑譯，《文學理論》，台北市：水牛出版社，1999年2月。

【一般書籍】

心 岱，《大地反撲》，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11月。

心 岱，《回首大地》，台北市：躍昇文化公司，1989年8月。

古蒙仁，《黑色的部落》，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9月。

古蒙仁，《失去的水平線》，台北市：九歌出版社，1983年1月。

台北市立圖書館編，《創作於台北的文學傳統 第三屆台北文學獎作品集》，台北市：台北市立圖書館，2000年。

柏 楊，《金三角 荒城》，台北市：躍昇文化公司，1988年11月。

- 李利國，《紅毛城遺事》，台北市：長河出版社，1977年9月。
- 李利國，《時空筆記》，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79年11月。
- 李瑞騰，《台灣文學風貌》，台北市：三民書局，1991年5月。
- 李瑞騰主編，《評論二十家》，台北市：九歌出版社，1998年3月。
- 季季主編，《時報文學獎史料索引》，台北市：中國時報社，1990年9月。
- 林清玄，《長在手上的刀》，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79年11月。
- 胡台麗，《媳婦入門》，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2年2月。
- 胡台麗，《燃燒憂鬱》，台北市：張老師出版社，1991年7月。
- 洪三雄，《烽火杜鵑城 七十年代台大學生運動》，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年9月。
- 亞弦主編，《小說潮 聯合報第十二屆小說獎暨附設報導文學獎》，聯經出版公司，1991年3月。
- 亞弦主編，《小說潮 聯合報第十三屆小說獎暨附設報導文學獎》，聯經出版公司，1992年11月。
- 亞弦主編，《小說潮 聯合報第十四屆小說獎暨附設報導文學獎》，聯經出版公司，1992年11月。
- 亞弦主編，《小說潮 聯合報第十五屆小說獎暨附設報導文學獎》，聯經出版公司，1993年11月。
- 亞弦主編，《美麗新世界》，聯經出版公司，1996年11月。
- 亞弦主編，《我寫故我在》，聯經出版公司，1995年11月。
- 亞弦主編，《飛翔之光》，聯經出版公司，1994年11月。
- 沈振中，《老鷹的故事》，台中市：晨星出版社，1993年4月。
- 邱坤良，《野臺高歌》，台北市：皇冠出版社，1980年。

高上秦主編，《時報報導文學獎》，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2年3月。

高信疆主編，《現實的邊緣》，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75年12月。

周宏昌等著，《第一屆桃城文學獎作品集》，嘉義市：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8月。

花蓮縣立文化中心編，《第一屆花蓮文學獎作品集》，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8月。

紀明宏等著，《第三屆璜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2001年6月。

施錫政等著，《變臉 第一屆台灣省文學獎報導文學類得獎作品集》，台中市：台灣省政府文化處，1999年。

吳錦發編，《願嫁山地郎 台灣山地小說選》，台中市：晨星出版社，1987年1月。

翁台生，《痲瘋病院的世界》，台北市：皇冠出版社，1976年2月。

馬以工，《幾番踏出阡陌路》，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6月。

馬以工，《尋找老台灣》，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9月。

張蒼松，《人間有情》，台北市：皇冠出版社，1993年7月。

陳映真，《孤兒的歷史 歷史的孤兒》，台北市：遠景出版公司，1986年5月。

陳其南，《文化的軌跡》，台北市：允晨文化公司，1993年9月。

陳銘礪編，《大地阡陌路》，台北市：業強出版社，1990年9月。

陳銘礪，《賣血人》，台北市：號角出版社，1979年7月。

陳銘礪編，《臺灣報導文學十家》，台北市：業強出版社，2000年9月。

- 陳銘礪編《現實的探索》，台北市：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0年。
- 陳義芝主編，《向時間下戰帖》，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97年11月。
- 陳義芝主編，《華年放異彩》，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11月。
- 陳國祥、祝萍，《台灣報業演進40年》，台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7年。
- 陳美羿等著，《一個超越天堂的淨土》，台北市：靜思文化，2002年。
- 黃重添等，《台灣新文學概觀》，台北市：稻禾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3月。
- 黃麗池、黃麗美編，《第一屆璜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9月。
- 黃麗池、廖憶鳳編，《第二屆璜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5月。
- 焦桐，《台灣文學的街頭運動》，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11月。
- 舒國治等著，《國境在遠方 第一屆華航旅行文學獎精選作品文集》，台北市：元尊文化出版，1997年。
-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1年3月。
- 路寒袖編，《探照生命裂縫的光輝 第一屆中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豐原市：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8月。
- 楊憲宏，《受傷的土地》，台北市：圓神出版社，1987年1月。
- 楊憲宏，《走過傷心地》，台北市：圓神出版社，1986年8月。
- 楊南郡，《尋訪月亮的腳印》，台中市：晨星出版社，1996年6月。
- 楊南郡，《台灣百年前的足跡》，台北市：玉山社出版公司，1996年3月。

- 楊澤主編，《手槍王》，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10月。
- 楊澤主編，《異鄉人》，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12月。
- 楊澤主編，《耶穌喜愛的小孩》，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12月。
- 楊澤主編，《送行》，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12月。
- 楊澤主編，《魚骸》，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12月。
- 楊蔚齡，《邊陲的燈火》，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94年5月。
- 楊樹清，《天堂之路》，台北市：旺角出版社，2000年1月。
- 楊樹清，《金門田野檔案》，台北市：稻田出版公司，2001年5月。
- 楊樹清，《金門島嶼邊緣》，台北市：稻田出版公司，2001年5月。
- 鄧湘揚，《愛在福爾摩沙》，台中市：晨星出版社，2003年4月。
- 廖嘉展，《老鎮新生》，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5年9月。
- 廖嘉展，《月亮的小孩》，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8月。
- 廖鴻基，《鯨生鯨世》，台中市：晨星出版社，1992年8月。
- 劉克襄，《小綠山之歌》，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8月。
- 劉克襄，《小綠山之舞》，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8月。
- 劉克襄，《小綠山之精靈》，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8月。
- 劉還月，《台灣土地傳》，台北市：臺原出版社，1989年1月。
- 劉還月，《音啞鶴鳴》，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9月。
- 劉還月，《尋訪台灣平埔族》，台北市：常民文化公司，1995年12月。
- 韓韓、馬以工，《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台北市：九歌出版社，1993年8月。
-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5月。

【學位論文】

李祖琛，《七十年代鄉土文學運動析論——傳播結構的觀察》，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民七十五年元月。

林淇漾，《文學傳播與社會變遷之關聯性研究——以七十年代台灣報紙副刊的媒介運作為例》，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12月。

林秀梅，《台灣原住民報導文學作品研究》，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何永慶，《七十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12月。

周永芳，《七十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6月。

翁慧雯，《文學與政治——七十年代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6月。

許詩萱，《戰後初期（1945.8~1949.12）台灣文學的重建——以《台灣新聞報》「橋」副刊為主要探討對象》，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7月。

楊素芬，《台灣報導文學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6月。

【報紙期刊論文】

王之樵記錄 整理， 望鄉的棄兒 李瑞騰談異域 ，《中國時報》，1995年1月15日，39版。

王之樵記錄 整理， 感性也要兼具知性 第十九屆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類評審會議記錄 ，《中國時報》，1996年10月12日至10月14日，19版。

王 拓， 瘋狂邊緣 談談洪通和他的畫 ，《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1976年3月14日至3月15日。

王 信， 告訴你真相又發人深省的照片 淺談報導攝影 ，《人間》，一期，1985年11月。

王誠之， 迷濛的松雀鷹之眼 ，《中國時報》，1997年11月24日至12月2日，27版。

尹雪曼， 報導文學與報告文學 ，《中華文藝復興月刊》，22：4，1989年4月。

包黛瑩， 家園夢的美麗代言人 ，《中國時報》，1995年12月28日，39版。

向 陽， 副刊學理論建構基礎：以台灣報紙副刊之發展過程及其時代背景為場域 ，《聯合文學》，1992年10月，96期。

向 陽， 三個瓶頸與兩個途徑 當前台灣網路文學傳播問題 ，《自由時報》，2003年2月16日，35版。

沈 謙， 精神的關照 文學的感染 評古蒙仁的報導文學集《黑色的部落》 ，《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1978年4月29日至4月30日。

李永適， 評介「鯨生鯨世」 ，《中國時報》，1997年8月28日。

李利國， 期代報導文學再出發 ，《聯合報》，1993年10月16至10月17日，25版。

李國偉， 文學的新生代 ，《中外文學》，1：12，1973年5月。

- 李瑞騰， 從愛出發 近十年來台灣的報導文學 ，《文藝復興》，1984年12月，158期。
- 林雲閣， 山鬼的怒吼 ，《中國時報》，1996年10月20日至10月24日，19版。
- 林耀德， 台灣報導文學的成長與危機 ，《文訊》，1987年4月，29期。
- 林淇漾， 戰後台灣文學傳播困境初論：一個「文化研究」向度的觀察 ，《新聞學研究》，1995年7月，51期。
- 官鴻志， 我把痛苦獻給你們 湯英伸救援行動始末 ，《人間》，1987年6月，20期。
- 周慶華， 十年來海峽兩岸文學交流的省思 ，《台灣文學觀察雜誌》，1990年6月，1期。
- 邱佩文， 有關「人物報導」的書目提要 ，《文訊》，1993年9月，95期。
- 金恆鏞， 評介「鷹兒要回家」 ，《中國時報》，1998年3月19日，42版。
- 座談會記錄， 文學與社會 ，《大學雜誌》，1972年4月，52期。
- 徐淑卿， 報導文學死了嗎？ ，《中國時報》，1998年10月8日，43版。
- 馬以工， 有怪獸！ 看報導文學的式微 ，《中國時報》，1998年12月23日，37版。
- 孫瑋芒， 來自深淵的知識 讀焦桐《在世界的邊緣》 ，《自由時報》，1995年6月12日，29版。
- 荊溪人， 新聞寫作上的爭議 ，《報學》，4：10，1972年12月。
- 陳大為記錄， 驟然消失的雷聲 第二十一屆時報報導文學獎類決審會議記錄 ，《中國時報》，1998年12月23日，37版。

- 陳光憲， 二十世紀報導文學的回顧 ，《應用語文學報》，創刊號，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1999年6月。
- 陳光憲， 史記寫作藝術與現代文學 ，《應用語文學報》，第二期，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2000年6月。
- 陳光憲， 論報導文學的樣式 ，《市立師院語文學刊》，第四期，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2000年6月。
- 陳光憲， 論報導文學的時代性 ，《語言文學之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2000年11月。
- 陳芳明， 朝向開放的台灣文學本土精神 ，《聯合報》，2002年8月1日，39版。
- 陳映真， 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 ，《人間》，1985年11月，1期。
- 陳映真， 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 ，《聯合文學》，10：3，1994年1月。
- 陳惠華記錄， 報導文學往何處去 ，《台灣新聞報》，1980年11月20日至11月21日，12版。
- 陳飛龍， 論報導文學 兼談司馬遷的史記 ，《國立政治大學學報》，1988年，40期。
- 張隆志， 腳踏文獻與田野間 ，《中國時報》，1996年4月18日，38版。
- 須文蔚， 報導文學在台灣，1949—1994 ，《新聞學研究》，1995年7月，51期。
- 須文蔚， 一九九七年文學上網的觀察 ，《文訊》，1998年5月，151期。
- 須文蔚， 新瓶中舊釀與新醅的纏綿 淺談本土網路文學的現況與隱憂 ，《文訊》，1999年4月，162期。

- 須文蔚， 數位文學的前世今生 ，《文訊》，2001年1月，183期。
- 馮景青記錄， 當代文學問題討論會 ，《文訊》，1987年4月，29期。
- 詩 影， 《史記》是報導文學初論 ，《文藝月刊》，1989年8月，170期。
- 彭瑞金， 葉石濤的台灣文學評論和文學史 ，《中外文學》，27：6，1998年11月。
- 彭小妍， 何謂鄉土？ 論文鄉土文學之建構 ，《中外文學》，27：6，1998年11月。
- 楊 照， 英雄林立、凡民少數？ ，《中國時報》，1995年3月16日，42版。
- 楊樹清、張煥宇、曾吉賢， 消逝的漁民國特 ，《中國時報》，1996年11月29日至11月30日，19版。
- 廖嘉展， 哦，請唱香楠之韻 ，《人間》，1987年2月，16期。
- 趙滋蕃， 報導文學的興起 ，《湖南文藝》，10：1，1982年1月。
- 趙衛民記錄， 為報導文學披沙揀金 記聯合報地十二屆小說獎附設報導文學獎決審會議 ，《聯合報》，1992年1月13日，25版。
- 蔡源煌， 最後的浪漫主義者 ，《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1994年3月12日。
- 蔣 勳， 起來接受更大的挑戰 ，《仙人掌》，1：2，一九七七年四月。
- 亞 弦、高信疆， 一個概念（副刊編輯）的兩面觀 ，《愛書人》，1979年12月，172期。
- 劉仁傑、高敏慧、羅敏功， 豈容良田變滄海 桃園縣濱海地區公害巡禮 ，《綜合月刊》，1980年4月，137期。
- 劉克襄， 候鳥回來 ，《中國時報》，1995年9月23日，39版。
- 劉克襄， 台灣的自然寫作初論 ，《聯合報》，1996年1月4日至1

月 5 日，34 版。

劉婉俐記錄，對周遭世界真實殷切的探望 第二十屆時報報導文學獎類
決審記錄，〈《中國時報》〉，1997 年 11 月 24 日至 11 月 29 日，
27 版。

鐘麗惠，近三十年來報導文學選集提要，〈《文訊》〉，1986 年 2 月，
22 期。

龔鵬程，漂流的世界華文文學，〈《聯合報》〉，2002 年 9 月 11 日，39
版。